

美国研究

季刊

1993年第1期

AMERICAN STUDIES

第7卷

3月5日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

陶文钊(4)

张歆海与中美关系

吴丹虹(14)

——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兼外交官的思想初探

亨利·卢斯、《时代》周刊与四十年代中美关系

许静(23)

乔治·凯南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1947-1949)

张小明(32)

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

刘绪贻(40)

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

何顺果(46)

——从特纳的“边疆假说”谈起

酒店——十七世纪马里兰社会的中心

李小雄(52)

从《曼哈顿中转站》到《美国》三部曲

朱世达(58)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

赵梅(65)

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

杨玉圣(72)

——读邓蜀生著《美国与移民》

本期责任编辑：赵梅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仰山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3.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 (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1993

Vol. 7, No. 1

CONTEN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 S. POLICY DURING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ao Wenzhao (4)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CP's U.S. policy from the end of 1935 to August 1945, dividing the whole period into four phases. The major factors causing the evolution, such as the Party's ideology,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he Comintern's directives and the Soviet influence, KMT-CCP relations, and US-Soviet rel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CHANG HSIN-HAI AND SINO-U. S. RELATIONS

Wu Danhong (14)

In his later years while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ng Hsin-Hai, a Kuomintang diplomat of the 1930's, devoted himself to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n the dark years (1950's-1960's) of Sino-U.S. relations, he contributed to improving the relations together with Li Tsungren, Edgar Snow and patriotic overseas Chinese.

HENRY LUCE, *TIME*, AND SINO-U. S. RELATIONS IN THE 1940'S

Xu Jing (23)

Henry Luce, the founder of *Time*, used the magazine to influence Sino-U.S. relations. Studying Luce's thinking on China and the tendentiousness of *Time's* articles on China in the 1940'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only when the great disparities in ideologies, value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ere skipped over could Sino-U.S. relations be successfully promoted.

GEORGE KENNAN'S VIEWS ON CHINA AND ON U. S. CHINA POLICY (1947-1949)

Zhang Xiaoming (32)

George Kennan's views on China and on China policy (1947-1949) were affected by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His proposition on China policy may be summed up as: (1) extricating from China; (2)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oviet Union; (3) U.S. occupation of Taiwan and the Penghu Islands. His views on China's situation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were influenced by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GLOBAL STRATEGY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Liu Xuyi (40)

"The New World Order" was part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global strategy. It had American values and ideals as its guidelines and American interests as its goal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it was U. S. -Soviet collaboratio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tensions among its former republics and the growing world multipolarization made Bush's New World Order a difficult task.

A THEME OF GREAT SIGNIFICANCE

He Shunguo (46)

F. J. Turner's "Frontier Hypothesis" contains a them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at is, the effect of the opening up of the West on U. S. development. While the theme is tenable, it is bogged down in the quagmire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To begin with the study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is a right approach to discovering the causes of the West's rapid develop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U. S. history.

ORDINARIES - CENTER OF THE 17TH CENTURY MARYLAND SOCIETY

Li Xiaoxiong (52)

Due to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geographic conditions and migratory pattern in early Maryland, ordinaries became centers of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entertainment there in the 17th century. They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organizations at that time and were not replaceable by any other organizations on account of their functions and importance.

FROM *MANHATTAN TRANSFER* TO *U. S. A.*

Zhu Shida (58)

I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nhattan Transfer* and *U. S. A.*, the author tries to bring into bold relief the path of John Dos Passos as a radical writer and as a literary experimentalis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radicalism-based socio-historical depth of *U. S. A.* trilogy is greater and its experimentalism broader and more systematic than *Manhattan Transfer*.

CHINESE PEASANT IN PEARL BUCK'S EYES

Zhao Mei (65)

Judging from its aesthetic value, Pearl S. Buck's *The Good Earth* is not a literary work of excellence. Rather, it is a popular novel. Its meaning lies in the fact that, while the outside world knew little about China, Buck gave in English a portrayal of Chinese peasants, whose feelings that one has to return to earth, life or death, are shared by all mankind.

READING NOTES ON DENG SHUSHENG'S *AMERICA AND IMMIGRANTS*

Yang Yusheng (72)

Deng Shusheng tries in *America and Immigrants* to portray the them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nation and foreign immigra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American studie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Deng's work is the first to analyse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angle of immigration.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

陶文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从政治路线到具体的政策策略均臻于成熟，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得到极大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外交工作的实践，积累了经验。这对中共在战后进行人民解放战争时处理与外国的关系，乃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时期中共的外交实践中，对美政策和交往占有突出地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利益的大国之中，法国很快为纳粹德国所占领；英国在这里虽有不少殖民地，但主要关注的一直是欧洲，在这里投入的力量极少；苏联起先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但后来则自顾不暇，在1941年4月至1945年4月的长时间中与中国抗战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只有美国在中国抗战的全过程中始终对这一地区给予较大注意，并投入了较多力量。中共也相应地把美国作为它开展对外交往的重点对象。关于中共开展对美民间外交的情况已经讲得很多，本文主要阐述的是，中共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和据此制订的对美政策，这种认识和政策在抗战全过程中所经历的演变，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是应该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算起的。但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时，我们却要把此前的一年半也包括在内，因为从那时起，中共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抗日战争中中共对美政策大体可以分作四个时期来叙述。

第一时期，1935年底到1939年上半年。

日本巩固了在东北的统治后积极向华北扩张，大大加剧了华北局势的危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面对德、意、日法西斯使各国人民面临战争威胁并打着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旗号掩盖其全球性侵略意图的新形势，大会提出了转变策略的问题，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统一行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反对正在挑起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肯定。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中共随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分析了日本侵华引起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和日本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会议放弃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制订了区别对待法西斯侵略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新的对外政策，主张“不放弃一切可能……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1）这样，瓦窑堡会议就为建立国内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和策略的基础。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由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新形势，中国应当“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2）中共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的确定，为中共开展对美外交提供了可能。

这一时期中共对美政策最完整最生动的表述是1936年夏毛泽东与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的多次谈话。毛泽东反复阐明了四个问题。（1）日本的侵略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损害美国在东方的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益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这些国家应该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2）“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美国可以从两方面援助中国抗战：一方面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借款，出售军需品，一方面对日本进行封锁；（3）中国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4）战后，赢得独立的中国不仅将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到那时，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3）毛泽东的谈话入情入理，明白透彻，完全没有教条主义和僵化的色彩，反映出中共清醒估计和分析了国际形势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对美政策。毛泽东的谈话实际上是他通过一位美国记者向美国人民和政府发出的建立反对日本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呼吁。稍晚，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另一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又讲道，“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善意中立”，并进而表示“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关系”。（4）1939年2月7日毛泽东在同一个叫马丁的外国人的谈话中进而说到，“如果欧洲发生战争，苏联卷入战争时，对中国的援助会减少。那时必须依靠美国的援助。”毛泽东还表示对罗斯福总统的社会的、国际的政策与劳工法，颇感兴趣，并说“非常钦佩罗斯福总统”。（5）

这一阶段中共的对美外交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的。一方面，想方设法邀请美国记者、作家、学者到西北、华北、华中苏区及抗日根据地访问，既把他们看作情报人员，以便通过他们的介绍，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共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又把他们当作外交人员对待，待以上宾之礼，力求通过他们与美、英建立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国共合作正

式建立，中共取得半合法地位后，中共长江局（武汉）和南方局（重庆）都十分重视外事工作，专门组织党内既有实践斗争经验、又熟谙国际事务的优秀干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外事工作。中共的努力对于打破中共被隔绝的封闭状态是有成效的。它既使中共能够较及时地获取关于国际形势变化发展的情报，又增进了海外人士对中共的了解，部分地消除了他们对中共的误解和敌意。

简言之，这一时期中共把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法西斯侵略阵营和反法西斯和平阵营，美国属于后者，中共的对美政策是联美抗日。

第二时期，1939年下半年至1941年5月。

这两年是中共对战争性质进行反复思考和分析，对对美政策进行不断检讨和修正的阶段，情况特别复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来说明。

第一阶段，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

在珍珠港事变前这几年中，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朝着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阵线逐渐分明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总趋势是通过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体现出来的，形势的不稳定性、多变性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中共对美国的政策自然不能不受这种变化的形势的影响。抗战初期中共对美日矛盾发展总趋势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共对这种矛盾发展的长期性、曲折性估计不足，对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又了解不多，因而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地把美国当作可以立即援华抗日的主要国家，对美国期望过高过大。当这种期望与现实发生较大差异时，中共自然产生了对美国的失望情绪。事实上，除了一笔桐油贷款，抗战头两年中美国没有多少援华抗日的实际行动。至于修改中立法，虽然罗斯福在1939年1月4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说：“我们的中立法执行起来可能不是不偏不倚、公平合理的——它可能在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而拒绝帮助被侵略者”，“我们不应让这类事情再发生了”，〔6〕但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势力十分强大，多数议员无动于衷，不想照总统的意思修改中立法。与此同时，美日贸易有增无已，美国成为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给者。1938年9月底，英、法、德、意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1939年初，英、美舆论一再宣扬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调解中日战争，国民政府也对此极感兴趣，国民党要人公开发表讲话，欢迎美国出面调停。同时，在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正面战场的压力有所减轻，国民党的限共反共活动却加剧起来。总之，1939年国内国外都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继续团结抗战的因素。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提醒全党反对国内和国际上的投降危险。毛泽东在1939年6月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指出，“产生目前投降妥协重大危险的原因是国际的压力，具体的说就是英、美、法（特别是英、美）的压力。”“英、美、法的统治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反动成份，倾向于承认日本在华的优势，与日本妥协来保持他们在华的基本利益。”他抨击英、美、法的政策是“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政策，并说，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7月24日，英日为解决天津租界的危机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使中共更加现实地感到西方大国绥靖政策的危险。中共中央在7月29日的指示中号召全党“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7〕

促使中共转变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苏联针对西方国家妄图挑动德国进攻苏联的企图，实行祸水西引，于1939年8月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了为这一行动辩解，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战争性质作了重新解释：这场战争被说成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非正义性战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无区别，交战国双方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据此，共产国际放弃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重新回到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立场。9月10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实行新政策的指示，立即表示拥护这个方针。1939年秋，毛泽东对再次来访的斯诺谈到世界形势时说：随着欧战的爆发，世界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放弃了它的反苏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这样，以

前在法西斯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划分的界限就失去了意义,不再是一种政治衡量的尺度了。所谓民主国家成了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运动的中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运动的敌人,因此,可以参加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家已经不再包括所谓民主国家里的资产阶级了。(8)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些讲演中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重分世界,就是说,为了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不论是德意日还是英美法,一切直接或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因此,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派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则是苏联、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组成的革命阵线,革命营垒。讲到美国时,他说,美帝国主义在两年的中日战争中,在中立的假面具下,已经发了一笔洋财。现在它又想在新的战争中大发其洋财,共产党员应当在人民面前,揭穿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揭穿它大发战争洋财的政策。(9)

第二阶段,1940年6月至10月。

但是上述说法与当时中美关系的现实显然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这一时期美国政策中援华制日的因素在不断增长,这一点,中共不是没有看到,而且实际时时加以肯定,及至1940年6月,中共认为,“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欧美派依赖英美法用劝和手段停止中日战争……的危险,已经没有了,或极大地减少了”,“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意日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10)两个月后,中共更进而认为,“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11)也就是说,美、英不再是要牺牲中国,压中国投降,而是要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反过来,中国则可以而且应当利用美、英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中共同时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不能加入到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中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中共既反对德、意、日同盟的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旧秩序,既反对中国成为日本的工具,也反对中国成为英、美的工具。(12)

第三阶段,1940年11月至1941年5月。

1940年11月初,中共的对美政策已在酝酿新的转变。毛泽东在11月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不仅应极力主张中英美合作与中苏合作,并应主张中英美苏之全部合作。(13)恰好这时,周恩来送来一份重要情报。11月6日,毛泽东在这份情报上批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14)虽然中共还没有根本改变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看法,但重要的是,中共放弃了中国抗战必须是独立的民族战争的主张,而赞成与美英合作了。中共还认为,当时包围压迫蒋发动反共战争的是日德和亲日亲德派,要阻止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15)

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朝野对中国局势表示严重关注,舆论普遍反对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袭击,罗斯福总统还特地派居里来华,向蒋介石表示,美国希望国共双方排除歧见,为抗战的共同目标加紧团结。居里还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会晤后致电毛泽东说:“估计居里来华是想将中国控制在美国手中,为他牵制日本,内战扩大是不赞成的,但如蒋能维持现状,他们也不会反对”,“所以他们想以一种压力加于蒋,但也怕把蒋压走”。(16)周恩来对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这种分析表明,中共这时已经把美国看作是对国民党主流派的一种制约因素。

1941年,美国为了推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便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两洋作战的准备,与日本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谈判,消息传出,中国国共双方都极为警惕。《解放日报》在5月30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西方形势的紧急,参战之必不可免和日益迫近,使得美国的统治阶级不能不考虑,怎样避免两洋作战的险恶局面。就是说,不得不复活‘绥靖’远东的‘妙计’。”社论斥责“美国张伯伦”“制造东方慕尼黑”,并对“伟大的民族抗战有被人出卖之重大危险”深表担心。(17)但是这种对美国的批评与1939年对远东慕尼黑的批评不同,因为当时,中共认为英、美是采取一种“坐山观虎斗”、“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政策,而这时美国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才会不得不寻求对日妥协的权宜之计的。因此这种批评没有影响中共对形势的总的估计和对美国的政策。

简言之,在这一时期,中共总地认为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掠夺性战争,在第一阶段,中共认为妥协投降危险主要来自英、美、法,在第二阶段,中共排除了东方慕尼黑的可能,并主张利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在第三阶段,更进而主张与英、美积极合作了。

第三时期,1941年6月至1945年3月。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为中共从根本上改变对战争性质的看法提供了契机。7月12日,中共中央在项指示中说:目前,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对于一切抗日反德意与援助苏联者均欢迎之,对亲日亲德意及反苏分子均反对之。”(18)这个指示表明,中共对战争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共已经如实地把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此后直到大战末期,中共坚定地把美国当作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成员,中国抗战的主要盟国。

为了不让国民党独占对美关系,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南方局外事组人员利用合法渠道与美国驻华政治、军事官员及各界友好人士广泛接触,努力开展“半独立的外交”。使馆官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思、庄莱德、柯乐博、武官包瑞德、助理武官德帕斯都是中共办事处的座上客。中共希望美国政府从各方面(不只是从国民党官方)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认为这是帮助美国决策者制订远东政策的主要因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正式结盟。在此之前,中共对美政策的重点是争取美国援华抗日,在此之后,政策重点转变为借助美国的影响——中共认为这种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倾向,敦促国民党实行政治民主化,从而为战后中国向着和平民主方向的发展奠定基础。这种以对外关系来促进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的“以外促内”的方针是在新形势下中共对美政策的重要发展,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一策略原则的灵活运用,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一个范例。1942年7月居里二次访华时,周恩来在给居里的信中特别提到,希望美国采取措施,使美国援华租借物资能确实用于抗日,否则,国民党可能囤积这些物资用于战后对付反对派。(19)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对美国很迷信”,他与林彪在1943年11月20日会见范宣德时再次表示,外国(显然指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可以改善局势的唯一力量。外国的反应将对国民党领导层中有远见的人士,包括蒋介石本人产生影响,他们建议,美国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对中国进行宣传时,强调美国愿意看到在中国真正民主化的发展,并对中共军队作为抗日力量的一部分表示某种承认。他们希望美国进行干涉,使国民党取消对中共的围困,使八路军得到给养,包括美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20)

中共的这些努力显然是有效果的。1943年年中,国民党顽固派借着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制造反共舆论,并增调重兵,准备分九路进攻陕甘宁地区,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2月19日,美国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亨贝克和宋子文主要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长谈。亨贝克提醒宋子文皖南事变后他们之间的谈话,并说,国务院现在的态度与那时一样,希望中国

避免内战。(21) 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官员也向国民党军政大员作了类似表示, 如代办艾切森9月11日在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吴铁城谈话中就表示, 国共的不和、中国显著发展着的法西斯倾向和民主政治的削弱使美国担心。他说, 一个强大的联合的中国一直是美国远东政策的一个基本点。因此美国对于中国人民中间任何与一个强大、联合的中国背道而驰的各种严重倾向均表关注; 尤其目前, 国共之间的分歧使那些本来应该在云南和别的抗日战场积极杀敌的中国大量优秀部队驻扎在西北, 不管是政府军还是被围困的中共军队都不能用于对日作战, 从而削弱了中国的战争努力。(22) 而中缅印战场美军司令史迪威则在9月6日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中提出了调动第十八集团军进入五台地区, 袭击平汉路以及归化、张家口地区, 并向它提供充分补给的问题。(23) 毫无疑问, 美国官员的上述表态对于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一定作用。

从1942年5月起, 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驻渝人员就不断建议美国派遣一军事代表团去延安, 到1944年7月, 这一愿望终于实现。对于中共来说, 此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 这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新闻各方面的封锁和隔离; 第二, 有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就大大减少了国民党顽固派冒险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性; 第三, 这意味着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共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实体的承认, 两者建立了准官方的关系, 几年来中共一直在谋求同美、英建立“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如今得以实现, 这是中共国际地位提高的显著标志; 第四, 中共希望以此为契机发展与美国的关系。8月18日, 中共专门为此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 其中说, “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 则中国革命的胜利, 必将增加许多便利, 这是可断言的。”(24)

这说明, 中共不是把接待观察组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 而是把它作为开展国际统战工作的一种长远可能性来对待的。《指示》没有说, 这种统一战线在抗战胜利后是否能继续下去, 但中共显然是从战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的。确实, 愈是临近抗战胜利, 中共对战后国内政治的发展前景愈是关心。中共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 制止国民党的内战企图; 一旦内战爆发, 不要片面支持国民党, 不要供给它新式武器。这正是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与谢伟思等观察组成员多次谈话的主题, 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 中共欢迎罗斯福总统个人代表赫尔利来华调处。

或许可以说, 第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经过“否定之否定”后回到了第一时期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 但第三时期的政策内容要丰富得多, 中共把运用美国影响促进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发展作为政策重点, 这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客观可能性来为中国革命的利益服务。

第四时期, 1945年4月至抗战结束。

抗战末期, 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支蒋容共抗日转变为战后的扶蒋反共, 其标志是赫尔利1945年4月2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共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第一, 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社论, 抨击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 第二, 在干部中展开教育, 使之认清美国政策已定为全力扶蒋, 消除他们对美国战后帮助中国的幻想; 第三, 鉴于苏联已于4月5日废除与日本的中立条约, 中共估计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时不远, 提出今后的任务主要是配合苏联作战, 尤其是配合苏联收复东北; 第四, 中共改变了单方面向美军提供合作的办法, 向观察组表示, 在美国未与我方确定军事合作以前, 不许美军人员再到前方去, 并拒绝了美军的如下要求: 在灵邱、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场; 在各军分区建立通讯网; 派人到山东降落; 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 在晋绥增加气象台; 在南泥湾建立对日侦察电台等等。(25) 中共中央还指示各地要警惕美蒋特务合作对根据地破坏。

但当时抗日战争毕竟尚未结束, 而且中共没有料到抗战胜利会来得这样快, 在1945年8月初仍估计战争可能延续一年时间, 而只要战争还在继续, 中美之间的盟国关系依然存在, 因此中共当时还不准备与美国决裂。相反, 中共是希望通过对美国错误政策的批评, 通过反对美国专门援蒋助长内战的危险, 促使美国觉悟, 动员美国各界有识之士积极起来纠正

赫尔利式的错误。而且中共认为中共手中仍然有着逼迫美国重新考虑其政策的杠杆，这就是为了打败日本美国需要中共的合作。因此中共在对美国进行批评时相当注意策略，矛头集中对着赫尔利，甚至在批评赫尔利的时候，对已故罗斯福总统加以褒扬。

但中共对美国改变政策没有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毛泽东在“七大”上反复告诫全党，要估计最坏的一着，警惕新的外来干涉的危险。他说，美国的政策已转变为“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独霸东方”，〔26〕中国将来可能变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抗战中国国民党就依靠美国，战后有美国的扶持，内战的危机是严重的，中国可能变成希腊，美国可能像斯科比干涉希腊事态那样干涉中国事态；中共要用各种方法防止内战，揭露内战。内战愈推迟愈好，要用各种方法避免斯科比的出现，万一发生了，要有理有利有节。及至7月底8月初，中共已经确信，战后内战无可避免，并指示中原解放区，“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27〕

总之，在这一时期，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共对美政策也相应改变为批评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并准备应付战后美国支持下的内战。

二

上面我们简单描述了从1935年底到1945年8月中共对美政策的发展轨迹。这些时期和阶段的划分都是相对的，有时在各个时期与阶段之间有重大事件作为明显的标志，如苏德战争爆发和赫尔利1945年4月初的讲话，有时则没有这样的显著标志。如果不划分时期和阶段则不容易说清问题。

应当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外交政策起源和形成期。在抗战以前，中共还没有独立地处理过与外国的关系，大革命期间实行国共合作，实际是以国民党为主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险恶斗争，无暇顾及国际问题。在那两个时期，中共只有一般的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出发的对世界、对帝国主义的看法，说不上有具体的对于某个外国的政策。日本侵略造成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迫使中共区分原先认为是一丘之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共的对美政策由是产生。

一般说来，外交关系的基础是利害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客观上是否存在共同利益；第二，决策者是否明智地判断和寻求共同利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利益在于抗日，在于国内政治的民主化。是否有利于中国抗战，是否有利于国内政治民主化是中共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的标准，也是中共对美政策的出发点。而在这两个方面，美国与中共是有共同利益的，自然在我们叙述的九年半中这种共同利益也有变化，有时增强，有时减弱，有时显著，有时隐蔽，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而对这个客观存在的认识和反映会受到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概括起来说，影响中共对美政策的主要有下列因素。

（一）意识形态的因素。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也是当时中共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在中共看来，资本主义有反动的法西斯的资本主义，有民主的资本主义，后者比前者进步些，但它仍然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它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与民主的资本主义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压迫人民忍一口气，是在面对共同敌人时斗争策略的转变，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个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另一方面，中共认为只有苏联是真心实意援助中国抗日的。在中共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中，苏联占有首要的地位。从1941年4月13日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到1945年4月5日苏联将它废除，整整四年中，苏联与中国抗日战争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但在苏联废除这一条约后，中共立即发出指示说，除中国外，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抗日和中国人

民最先的主要支援，过去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存在，在敌占区对敌伪的宣传中着重宣传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今后则应着重宣传苏联力量的强大，远东战争没有苏联参加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宣传在苏联援助下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已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可见，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对苏联与美国的政策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的：联苏的根本的、天然的、牢固的，联美则是策略性的、阶段性的、比较脆弱的。

一般地说，意识形态可以与上面说到的民族利益并行成为外交政策的另一条指导原则。从这两个原则出发作出的抉择有时是同一的，有时则有差异。有时从民族利益作出的决定可能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规范，有时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抉择可能于民族利益有损。但是归根到底，实际的利益关系是比意识形态更强有力的。当着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时候，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需求便压倒与之不符的其他一切因素了。

(二) 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这一点与第一点有联系，但有区别。第一点主要讲的是中共的主观认识，这一点是讲客观的因素。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与国际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它的对美政策基本上也是按照国际指示来制定的。苏联作为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解散后，中共仍然唯苏联马首是瞻。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则是消极的。国际“七大”对中共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了正确的指导和有力的推动，这是因为当时苏联和国际领导人对世界形势、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状况的认识是正确的，他们提出的指导方针符合各国人民、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在1939年年中，在国际形势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仅仅为了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寻找根据，苏联领导人不惜置民族利益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利益之上，于被侵略或受到侵略威胁的世界各国人民利益之上，曲解战争性质、以致于走到为法西斯德国进行辩护的地步。共产国际根据苏联领导人意图向各国共产党发出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指示，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严重脱离本国群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混乱，(28)也给中共制订对外政策带来消极影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战争的新解释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其指示在实际工作中是行不通的。从第一部分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共在第二时期的三个阶段对战争性质的看法和对美政策的变化，实际上是在实践当中不断检验、修正自己的认识，使自己的政策更加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过程。虽然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前中共没有根本改变对战争的看法，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共已经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与美、英等国的共同利益，其对美政策与1939年9月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相去甚远，而与中国抗战的具体实践愈来愈接近了。

(三) 客观形势的变化。一般说来，政策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决策者总得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修正、转变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对美政策正是对国内国际形势——首先是美国对华对日政策——变化作出的反应。1945年春的政策转变是特别明显的例子，上述第二时期的情况也是这样。1939年7月24日，英日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针对这种对日绥靖的倾向，美国立即作出反应，两天后即宣布废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中共对此表示欢迎。10月22日《新华日报》社论肯定了美国远东政策的积极变化，并提出，“进一步在外交上，加强中美关系，依据自主外交原则，积极活动，总要做到使美国停止军火输给日寇”，“能够这样，我们在远东有苏美两国亲密的友谊，慕尼黑阴谋者，也无法施其伎了”。在这里中共把美国与苏联并提，评价不可谓不高，希望不可谓不殷。欧战爆发以后，美国对日态度更趋强硬，1940年1月《日美商约》废止后，美国拒绝与日本另订新约，3月7日中美华锡借款消息公布，7月2日罗斯福发布了对日本的第一道禁运令。中共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并及时作出反应。中共在2月1日和10日的两份文件中一再指出：“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远东慕尼黑会议无迅速召开之可能。”(29)到6月，中共就排除了远东慕尼黑的可能性。正是由于中共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并能准确

地认识形势，而不是拘泥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使自己的认识僵化，才能不断校正对美政策。

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而中共尚未完全走出被封闭、被隔绝的状态，在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方面从客观上受到局限，又加上缺乏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对美国的决策过程了解不多，有时出现把十分错综复杂的日美关系、中美关系简单化的情况，这也是导致对美政策出现摇摆、反复的原因。

（四）国共关系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既要抗日，又要防共、限共、削弱中共；中共不但要抗日，还要关心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中共对美政策受到国共关系的影响极大，这种情况最突出地表现在皖南事变前夕与第四阶段。在抗日战争中，中共担心于英国的主要是对日妥协，而担心于美国的主要是支持国民党反共。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国民党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各地制造摩擦，胡宗南部队从5月开始包围陕甘宁边区，甚至准备进攻延安。国民党在酝酿发动一次反共高潮，两党关系骤趋紧张。这是1939年下半年中共改变对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1940年年中，国民党开始酝酿新的反共高潮。中共认为，这是国民党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步骤。这时中共特别强调要阻止国民党这样做，并认为这“是我党当前的严重任务”，中共甚至估计，“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莫过于美国打败日本，并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30〕中共这种假定主要是从当时国共关系的现状出发而作的。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中共对问题有了新的看法，通过皖南事变及其后中共与美国军政人员的接触，中共正确地断言，可以利用美国当时支蒋容共抗日的政策来遏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并在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可以说，在中共的潜意识中，对美国的支蒋反共的担心一直是存在的，赫尔利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唤起了这种担心，1945年春中共对美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

（五）美苏关系的影响。前面提到1941年年中尽管中共因美日谈判而批评美国，但中共并没有因此改变对美政策，这里一个主要原因是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的美苏接近。6月24日，罗斯福不顾国内反共反苏派的压力，在记者招待会上保证向苏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并且命令撤销对俄国在美国的价值3900万美元资产的冻结。翌日，他又宣布，在对美国没有严重危险的情况下，他将不履行中立法，也就是说，美国的船只仍然可以把货物运到未被占领的苏联港口。6月底，美国国务院开始考虑苏联提出的18亿美元物资援助要求。〔31〕中共无疑认为所有这些是形势好转的迹象。7月7日中共宣言中提出十条主张的第一条就是“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在五天后的一再指示中，中共特别提到，“目前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32〕

上面我们简单分析了影响中共对美政策的几个主要因素。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它们常常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自然，可能在某个时候某个因素的影响大些，而在别的时候则另外的因素显得更加突出。

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实践，中共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中共已经善于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根据实际的客观形势，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不顾某个大国的态度如何坚持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同时中共也能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来为中国利益服务。这些正是中国革命在战后几年中迅速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央档案

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10卷，第598、616—6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3）斯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谈录》，《密勒士评论报》（“Interview with Mao Tse-tung, Communist Leader”, *The China Weekly Review*），第78卷第11、12期（1936年11月14、21日），《中共与世界事务——毛泽东访谈录》，《亚美杂志》（“Chinese Communists and World Affairs. An Interview with Mao Tse-tung”, *Amerasia*），第1卷第6期（1937年8月）。

（4）毛泽东：《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与史沫特莱谈话》，1937年3月1日。

（5）《毛泽东同马丁的谈话》，1939年2月7日。

（6）谢夫编：《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外交》（Donald B. Schewe, ed.,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第2辑第13卷，第6—7页，纽约—多伦多1969年版。

（7）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13日；《中央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1939年7月29日，《选集》，第12册，第94—96页，第150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全民族动员克服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1939年6月18日《解放报》社论。

（8）斯诺：《中共与两个大陆的战争——毛泽东访谈录》，《密勒士评论报》（Edgar Snow,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Wars on Two Continents. Interviews with Mao Tse-tung”, *The China Weekly Review*），第91卷第8期（1940年1月13、20日）。

（9）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新中华报》，1939年9月19日。

（10）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在政治局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940年7月7日，《选集》，第11册，第42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11）《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选集》，第12册，第479页。

（12）《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情报第六号——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1940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2—3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13）毛泽东致周恩来，1940年11月3日。

（14）《毛泽东关于不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及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6日，《选集》，第12册，第551页。

（15）《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1940年11月7日，同上，第554页。

（16）参见马芷荪：《周恩来与抗战时期中共的对美政策》，《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7）《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1941年5月30日《解放日报》社论），《选集》，第13册，第489—491页。

（18）《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选集》，第13册，第164页。

（19）（20）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942年中国卷（*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第227页，华盛顿1956年版；1943年中国卷，第197页，华盛顿1957年版。

（21）（22）《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97—98页；

第334页。

(23) 罗曼纳斯、桑德兰:《史迪威使华》(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第368页, 华盛顿1953年版。

(24) 《选集》, 第14册, 第315页。

(25) 《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 1945年7月7日, 《选集》, 第15册, 第179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 第608页,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27) 《中央关于发展豫鄂根据地对付将来的内战危险给郑位三等的指示》, 1945年8月4日, 《选集》, 第15册, 第201页。

(28) 参见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第506—512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9)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1940年2月1日;《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 1940年2月10日, 《选集》, 第12册, 第261、283页。

(30) 《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情报第六号》, 1940年10月20日;《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 1940年10月25日, 《皖南事变》, 第32—34页。

(31) 达莱克著, 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 第406—407页,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但中译本把“未被占领的苏联港口”中的“未”字印掉了, 此处所引参照了原书。

(3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1941年7月7日;《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 1941年7月12日, 《选集》, 第13册, 第156、164页。

《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张歆海与中美关系

——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兼外交官的思想初探

吴丹虹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1840年鸦片战争, 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1) 中西文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迎头相撞,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落后了。从此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 一直纠缠和困扰着他们。如何迎接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 客观估价数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心理上的传统文化, 探索中国社会的前途, 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代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百年大课题。

在中西文化不可避免的冲突和震荡中,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必然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的话,那么他们中的外交官则更为直接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他们无时无刻都要面对中西文化碰撞这一现实。而张歆海正是这样一位集外交官、学者于一身的典型人物,这位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的30年代国民党外交官,在寓居美国的后半生中,致力于美中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及关系的缓和,并对中西文化、战争与和平、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他以他的行动和思想对百年大课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本文重点探讨张歆海50—70年代在美国的活动和思想。

一

与发现“西洋立国两千年”(2)的郭嵩焘及主张“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3)的曾纪泽相比,张歆海则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时代,他是在“五四”的启蒙和救亡思想中成长起来的。

1900年,张歆海出生于上海,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赴美留学,1923年获哈佛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和光华大学,曾任东南大学英国文学系系主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

1928年夏,张歆海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28年6月—1933年9月他任中国外交部欧洲和美洲司参事。1933年5月,张歆海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国驻葡萄牙公使,同年12月赴任就职。1934年6月又改任驻波兰公使,同时兼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1936年年底去职。(4)1941年携全家到美国定居,先后在美国长岛大学和费尔利迪金森大学任教。

40年代初期,张歆海在美国曾协助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为中国抗战做过不少工作。(5)

二

50、6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黑暗时期”。(6)

在美国国内,反共反华的气氛十分浓厚。正如保尔·伊文斯指出的那样,“50年代对于在中国训练出来的美国远东专家或在美国训练出来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都不是什么好年份。”(7)像费正清这样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几乎沉默了十年,以研究历史来回避现实,“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年代里,费正清对中国当时的发展和美国的远东政策几乎没有什么贡献,1952—1960年,他关于中国政策所写的东西总共不到75页。”(8)

张歆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参与了推进中美关系发展、捍卫中国主权的活动的。他通过著书,向美国和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促进中美之间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从而推进中美关系的和解。1956年,他出版了以赛金花为主人公的小说《传奇性的姨太太》,他在书的最后写道,他希望美国人“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能够对中国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更好的理解”。(9)两年后,他出版了《四海之内》一书,在书中他批评了美国的政策,指出美国人“并没有想到它(指中国革命)是一个主要的社会、政治事件,它规模宏大而且十分重要,在它的背后有充分的理由来让他们理解。”(10)

50、60年代,张歆海与居住在美国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过从甚密。张歆海对李宗仁的一些思想和活动起过一定的影响。他们密切合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积极发挥作用。

1960年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当时李宗仁认为“麦卡锡已经死了,国会援蒋集团

头目诺兰也不在了；在60年代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大多数是温和得多的维新派，如果肯尼迪要重新检查对华政策，是时候了。”张歆海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建议“李宗仁应当乘肯尼迪下车伊始，给他写一封信，一方面贺他就任总统，一方面促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期奠定东亚和平。李宗仁真的这样办了”，信是由张歆海起草的，“但得到的复信却不着边际，说是事关对外关系，容后缜密考虑。”（11）

1961年1月，李宗仁向美国政府领导人递交了一份由张歆海执笔的《解决中国问题备忘录》。他们在备忘录中阐述了两个中国政策缺乏基本的成功要素，只会遭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坚决反对。维持现政策只会加深中美敌对。备忘录还提出中美双方应该保持理智，建议美国首先采取和缓关系的行动。

后来，周恩来总理得知了李宗仁给肯尼迪写信一事，曾让程思运转告李宗仁，由于肯尼迪政府困难重重，不能期待其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12）

中美建交的道路是艰难而又漫长的，张歆海与李宗仁并不因此放弃努力。1964年3月12日，他们在纽约的《先驱论坛报》上联合署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以中法已经建交为例，主张美国应效法戴高乐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封长达千言的公开信，就像闪烁在晨曦前的启明星，尽管亮度有限，却在旅美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应。”（13）

60年代初期，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李宗仁立即发表声明，坚定地站在祖国一边，维护国家的利益，同时也表达了对新中国的向往。张歆海对李宗仁的行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1963年7月14日，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发表了女记者奥古斯特·玛赛丽采写的《李宗仁先生访问记》。这次会见是由张歆海担任翻译的。李宗仁明确指出：“西藏一向是受中国保护的，它是中国边界以内的一个地区。”（14）

60年代前半期，张歆海一直在撰写中美关系专著《美国与中国》，当时“虽然麦卡锡时期的恐怖已经过去，虽然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开始，但彼此的敌对与戒备心理仍十分严重。”（15）张歆海的好友，《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对此十分关心，他说，“写这个题目现在正是艰难时刻，但多年来不一直都是这样吗？”（16）他多次在信中鼓励张歆海坚定地写下去。

1965年，张歆海的《美国与中国》终于出版了。在该书再版时，斯诺为它作了序言，序言中写道：张歆海“以诚实和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关于对中国人特点、文明特征和当前分歧的背景事实的所有错误信息，来打动一些自满的美国人，他认为我们在上述方面的无知是造成误解的基本原因。”（17）

1971年，当钓鱼岛问题出现时，年逾古稀的张歆海又积极地参加了保钓运动。

1971年5、6月间，张歆海与保钓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一起，多方努力，声明立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先后给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爱德华·肯尼迪、雅各布·K·贾维茨和乔治·麦戈文写了信。他在信中指出：“关于台湾，新的问题不幸出现了。……自古以来它们（钓鱼岛）是台湾的一部分，但是它们现在要被分开，与琉球一起归还给日本……这样做是会犯严重错误的。……中国人感到，美国将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在解决时不能不认真考虑中美之间后代的友好关系。”（18）

最终，美国政府不顾舆论的反对，还是批准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归还冲绳条约，使钓鱼岛成为中日之间至今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

1972年夏天，张氏夫妇在考察东南亚的归途中到了香港。周恩来总理授意有关人员转告准备在北京接见他们。张歆海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但是，在香港他就病倒了，到广州治疗三个星期后又转到上海。1972年12月6日，张歆海带着未能北上的遗憾，在他的出生地上海病逝。

漂泊海外30年的张歆海与亲密朋友李宗仁、斯诺及爱国华侨一起，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改善中美关系以及捍卫中国主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被海外友人誉为“人民外交家”

(19)是受之无愧的。他的努力是执着的,也是艰难的。在他积极参与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

三

张歆海对中国与西方社会有着长期、深入的观察、了解与体会。他对于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文化和历史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的思想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四海之内》、《美国与中国》这两部著作中。它们大致可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及对中美关系的分析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它们最后在认识人类文明发展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得到了统一。

(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理性批判——五四以后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的历史。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还“很少有可能把西方文化当作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成果去积极地予以肯定和认识”,(20)他们的探索也只限于引进技术和改革制度。直到本世纪初,尤其是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开始真正从文化层次上进行认真的反思。他们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尖锐、彻底地批判传统文化,力图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改造中国社会。

然而,完全否定传统是否就是中国社会的出路?五四运动以后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开始了更为冷静、理智的思考。“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在五四时代孔学声名狼藉之时,以罕见的沉静独立的心态挖掘和发扬孔学的优良传统”(21),这在后来形成了新儒学。所谓“新儒学”是指:“在辛亥、五四以来的20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儒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22)张歆海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基本属于现代新儒学的范畴,贯穿于他著作中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中国文化中的道义因素具有永久价值。

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绵延五千年而不绝,它究竟有哪些不同于西方的主要特点,这是张歆海一直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是强调道义因素的作用。中国文化能够长久地生存下来有以下两方面原因:1.在中国社会有着产生过巨大凝聚力的深厚统一意识。其他民族一般都是通过政治的方式来创造统一,而在中国则完全是文化的统一体或是一种意识的统一体。2.中国的文化不仅建立在一系列的道义价值上,而且就是它们的化身。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道义的主导作用,所以道义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张歆海在研究中国早期思想时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获得好的、有效的政府,统治者必须在所有的时候都是道德行为的典范,他必须是一个无懈可击的道义人物形象,他是天的代表,天地间的必要联系。老子有段话说明了这一点:“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3)因此,对君主的要求很高,正所谓“修身,则立道;尊贤,则不惑。”(24)

如何看待上述特点,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张歆海更多的是侧重于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优良传统的一面。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些真正伟大的思想:首先,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人民和他们的幸福必须在帝国中保持首要和根本的考虑,整个社会正是为此而存在着。其次,由于人民的绝对必要性,只要统治者表明他自己不能作为人民的公仆发挥自己的作用时,那么人民有责任把他赶下台。第三,唯一能够证明一个君主能继承统治的是他的德行。第四,通过运用武力和实力不能使国家或共同体达到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积累,作为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其中渗透着道

义的精神力量，浇铸着人们的高尚品德，张歆海对此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张歆海也认识到传统文化有不足的一面，他在1958年出版的《四海之内》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它内部的应变能力。”（25）

“在中国，人们试图让社会永远忠实于道德，但这种努力并不是永远成功的。”但张歆海所强调的是，在中国社会中“目标一直存在，在社会事务的最后裁决中，很大程度上养成了更多的是道义说服的习惯，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强制行为。……这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其政治行为不是自我扩张，而是道义情感的表达。”（26）

张歆海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有两个根本的不同：1. 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是较为彻底的否定态度；张歆海则主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他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重大缺陷，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传统文化。2. 五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是截然对立的，所以才有“全盘西化论”的出现；张歆海则主张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价值观念和理想的同时，努力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

在对传统文化的思索中，张歆海比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前进了一大步。五四时期人民对西方文化过于尊崇，对传统文化过于贬斥。而包括张歆海在内的五四以后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更为理智的态度，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更为客观。他们认识到，文明的生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今天的发展必须以过去的传统为基础，此外，西方文化中缺少道义原则的意识，这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偏失，而这些道义原则正是中华文化中的精华。

应该指出的是，张歆海所推崇的道义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合理因素的精神遗产，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儒家的人道精神、人格理想等，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传统。他认为，不仅中国应该保持和发扬，同时希望它能够对整个人类有所贡献。尤其是儒家“和谐社会”的理想，有着启发人类良知、促使人们不断进取的积极一面。

然而，“历史向来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进行的，文明进步要付出道德的代价”。科技、制度、风俗习惯的渐次变迁，必然会伴随精神价值方面的相应突破。如何求取“返本”与“开新”（27）的统一，是张歆海与现代新儒学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张歆海在对传统文化的总结中，融进了自己的理想成份。但他并非迂腐的饱学之士，而有着积极的参与意识。探索中国文化本身并非意义所在，目的是要从各个不同侧面为中国社会寻求出路。张歆海没有停留在对文化的静态估价上，而是从中西文化比较出发，将目光转向战争与和平、中美关系等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二）“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家学者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回答。

在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最为人们所关注，它关系到人类的共同前途和命运，因此也成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在这方面，西方著述颇多，其中最具有实际影响的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由权力、国家利益等基本概念出发，解释战争与和平。张歆海则是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从道义原则这个侧面，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具有儒家思想特点的回答。

张歆海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文化中的道义原则对世界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张歆海在对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次数进行了统计研究之后指出，欧洲2000多年历史中，战争似乎是不断的和一再发生的现象。比起战争年代，和平的岁月实际是很少的，战争变成生活中更为正式的形式。

与西方历史相比，“中国历史上的约3000年间，战争年的百分比比欧洲任何国家的纪录都低。中国人民相应地比欧洲人民享受了长得多的和平时期。”张歆海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因素在起作用。他的中心思想是：和平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神圣的问题，而和平问题的根本又是道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除非政治对道义负有责任，否则没有和平。”

（28）

他在研究和比较之后发现,中国传统思想与古希腊政治思想有着不寻常的相似之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国家视为个人的延伸,一个好的、繁荣的国家里,个人或至少是人们当中的那部分好的个人,发展实现了一个较高的道义目的。因此,国家从未被视为与个人相分离的实体,但是人与人的联系是培养道义目的的基础。”(29)这两种思想的区别是在实践上,“古希腊思想没有机会也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实行和起作用,与此同时,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演变中获得了成功。”(30)

张歆海深切感到,在西方世界道义的敏感性和感觉被许多世纪以来的教训所削弱了,即把物质置于道义力量之上,侵略置于缓和、抑制之上,占领置于谦卑、仁爱之上。长久以来西方人的意识被获得物质的希望所统治着。他承认经济因素的重要,但认为仅有它是不够的。“人的经济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现实,然而仅有经济需求这个基础是不能为人们所满足的。把生活集中放在物质水平上就获得了对生活的充分解释,这是令人怀疑的。”(31)

在张歆海看来,孔子对共同人性的强调在今天是有重要价值的,当前世界与两千年前中国的战国时期十分相像,既然孔子的统一原则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联合的帝国,那么相似的原则能否为今天的世界创造和谐呢?他强调,重要的是孔子没有试图通过任何形式、体系或政府机器来创造这个统一体,而是贯穿文化与道义的领导。

张歆海又以道义的因素来解释战争,并在道义原则中寻求战争与和平的出路。他试图通过强调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根本的道义原则,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起维护和平的责任感,以达到“大同世界”的实现,表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未能摆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他不能无视中国落后这个现实,而是清醒地指出,在当今世界“把中国这个独特的文化奉为学习的榜样是既不实际又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却又在寻找一个失落的文化世界,确信中国文化中的道义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有影响的。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清楚:使道义的影响胜过一切。”(32)

应该指出的是,1.张歆海所极力否定的权力,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概念,但在当今现实世界中,政治与权力脱离是无法想像的。2.如果脱离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这个现实上建立起来的特定伦理道德,一切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已。但不能否认,张歆海给予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一是道义原则是国际关系现实中不可缺少但又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因素;二是如何汲取中华文化中的精华作为当今的世界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从文化与历史的深度看中美关系——观察国际关系的新视角。

作为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张歆海对中美关系极为关注。在50、60年代中美关系最为困难的年代里,人们并不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抱多少乐观的态度,而张歆海能够从历史和文化的深度来看待中美关系,对它的改善充满了信心。

1. 从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指出中美之间良好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张歆海没有把中美关系仅仅视为中美两国之间的事,而是把它看成与世界和平及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感情确实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世界不会有和平。”(33)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的利益,必须在关系进入不可预测的灾难前,下决心打破僵局。”(34)

2. 从文化、历史角度来看待新中国,提出中国与西方相互理解的必要性。

“在1949年革命后怀有敌意地与世隔绝的年代里,许多西方人既不相信又害怕中国。”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是“神秘的、郁积着闷火的红色东方巨人。”(35)

张歆海感到,西方人对中国人民及他们的心理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而很大程度上,中国与西方世界不正常的国际关系是错误地理解历史和心理的结果。

那么该如何理解中国呢?张歆海早在50年代就已指出,“只能通过耐心的研究和分析,从中国人发展的历史中去获得。”(36)

西方人为什么要反对中国?仅仅因为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吗?张歆海得到的答案是:西方

人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似乎强大的中国会伤害他们。这是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历史造成的。费子智关于“中国历史记载着文化的扩张而不是军事占领”的观察是完全正确的，“这不是从某个历史时期而是纵观国家悠久历史得出来的。并不是说军事力量不起作用，而是意味着主要强调文化和道义的说服力。”（37）

对于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变化，张歆海指出，由于中华文明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不论共产党在中国做了些什么，或近些年将做些什么，都不会损害他的人民的性格特点。这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运动，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精华结构。”（38）张歆海并不信奉共产主义，但他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大陆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他指出，新政权“尽管有许多缺点，但它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事，与被它推翻的腐败、不称职的政权形成对比。”（39）只有到了现在，“中国也许可以被称为寻找到了摆脱民族危机的道路。这个危机从1839年鸦片战争开始，受压抑的气氛十分浓重，至今才消失。”（40）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是巨大的。只有经历过旧中国、深谙中国人民在动荡的年代里所受苦难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到中国大陆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

张歆海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过于着重眼前利益，没有从长远着眼。“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他们太实际了，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燃眉之急的事，结果对所面临的事，比如它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性质、什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等一点也不了解。”（41）他们把中国视为令人担忧和不安的根源，认为它的崛起会打破世界均势，危害美国利益，因此要遏制共产党中国。美国对亚洲其他部分的政策也“取决于对中国的态度”。“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政策。”（42）

张歆海深信，只要美国调整政策，中美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友好关系的历史；第二，两国人民有许多相似之处。（43）都具有一种相同的、长期积累和形成的精神气质（Saving Quality），它使两国人民都具有宽宏、开朗、坦诚和乐观的性格，这是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关键；（44）第三，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在为和平而努力，同样中国也希望和平，而且也必须为和平而努力，她巨大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计划如果没有和平是无法实行的。”（45）最后，共产主义将不再是铁板一块。50年代后半期，张歆海预见到中苏迟早要分开，60年代中期，他清楚地意识到“所有仇视共产主义中国的谈论都是一种托词和表面的东西了，关于两大集团、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集团的谈论已经变得不再那么尖锐，共产主义的铁板已经破裂。”（46）

因此，为改善关系，美国方面进行一些根本的调整是必要的：一要长远着眼，“如果双方把他们的思想脱开眼前利益的限制，用同情和理解来看待将来，方法还是有的。”（47）二要承认新中国这个现实，中国革命“事实上是一次‘历史运动’，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它的发生。”（48）三要理智从事，“中国问题恐怕已超出了理智的范围，到了感情范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它带回到理智能够起作用的地方。”（49）

张歆海还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建议：（1）美国停止敌对中国的政策；（2）解决台湾问题，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起积极作用；（4）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通过长期贷款和技术咨询方式来帮助中国的现代化。

张歆海满怀信心地指出，“黑暗是暂时的，我愿预言，目前的对抗终将让位于双方的调解政策。”（50）历史验证了他的预言。

张歆海关于中美关系方面的思想是客观的，符合国际关系的现实及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哲学态度。他的许多具体的政策建议在当时似乎是无法想像的，而今天都已成为现实。他从文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理性和相互理解的必要性，尽管还有不够严密、系统之处，但他所提供的观察国际关系的方法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可以给予我们许多借鉴的。

四

近代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外交官对中西文化迎面相撞后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困惑这个百年大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至今仍未获得最终答案。然而,从上个世纪的“保教派”、“国粹派”到五四时期的“西化派”,直至本世纪中叶出现的“现代新儒学”,人们对中外文化的认识毕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张歆海的答案中,我们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启示:

首先,现代新儒学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回归。

存在于人们深层意识之中的传统文化并非通过人类的主观意志便能否定掉的,直到今天它仍在影响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所以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知识分子所必须回答的问题。然而,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为防止文化失范而求助于传统、为现代化的政治新生又须抛弃传统”(51),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历史与未来的夹缝中,包括张歆海在内的现代新儒学艰难地寻求着传统与现代化的统一,在对上一代知识分子反传统的理性批判基础上,他们在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上找到了自己的理想支点,即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保存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寻求传统与现代化的统一,其意义并不局限在传统文化本身有多少“优秀成份”,还在于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找到支撑点。现代新儒学比前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范围要广阔得多,确切地说,他们的选择是一种更新、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回归。这也是五四反传统思潮之后的一种历史必然。

其次,张歆海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新儒学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和观点。

张歆海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传统文化的估价与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其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传统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世界眼光和面临国际关系重大问题的现实感和责任感。

张歆海与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中国文化是他们的思想根基。寓居海外的张歆海,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依靠,他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同时与新中国又无直接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实际上被流放的人”,他精神上的主要依托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研究并不仅仅是由于远离母国而萌生的对母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还有更多的责任感。另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过西方文化及后来长年居住美国的经历,使他多少能超脱本民族文化的局限,具有更开阔的视野。

与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张歆海并非哲学家和思想家,其论述也有欠周密和严谨之处。然而,他的特点是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宣传上,而勇于把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去。

用现代新儒学观点来分析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都不免会带有民族政治文化的色彩。现代新儒学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传统,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和观点体现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来自中国文化的声音。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自身的认识。2.无论儒家思想本身带有多少理想主义的色彩,张歆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国际事务的一种方法,并且,历史发展印证了他由此方法而推出的许多结论。

如何在中国传统与世界之间寻找结合点,张歆海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通过对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的分析,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预见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未来的价值。如汤因比所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人口,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52)

最后,从中美关系的背景中看,张歆海的思想主张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执着努力和独

立人格。

人们看待事物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张歆海不附和美国国内当时的反共反华潮流，努力摆脱政治氛围给人们认识上造成的束缚，独立思考并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对中美关系的许多预见，不仅需要有一定的洞察力，还要有足够的勇气。在费正清沉默的年代里、在好友斯诺不得已移居瑞士之时，张歆海就已开始著书发表自己的见解。

张歆海的思想有很超脱的一面，他把中国的前途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用开放的视野来比较中外文化，不仅探寻它们的差异，也寻找它们的结合点；他不赞成共产主义，但能客观地看待新中国。他深深懂得学者的价值，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学者受到尊重并非因为他有更多的知识，而是因为从那些知识出发，他发展了坚强的个性及对他所认为适当、正确的事物的坚定不移的忠诚，他坚持他的信念而不顾后果是什么。”（53）张歆海正是这样做的。

综上所述，张歆海在50至70年代初的活动和思想，其目的可以归为两点：1. 推进中美两大民族的融合；2. 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的“努力是公正的，也是坦诚的，某种程度上显然是痛苦的”（54），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一直在为中国文化这个“既世俗又超脱”的百年课题寻求着答案。

注释：

（1）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2）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第11卷，《伦敦致李伯相》。

（3）钟叔河：《走向世界》第279页，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

（4）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5）1943年张歆海曾任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驻华盛顿特别助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下简称胡佛档案。

（6）（7）（8）保尔·艾文斯：《费正清与美国对现代中国的理解》第339，135，184页。（Paul. M. Evens, *John King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Basil Blackwell, 1988.）

（9）张歆海：《传奇性的姨太太》（Chang Hsin-hai, *The Fabulous Concubine*, simon and Schuster, 1956）。

（10）（25）（26）（28）（29）（30）（31）（32）（36）（41）（53）张歆海：《四海之内》第95—96，190，117，60，153，155，80，179，96，95，193—194页（Chang Hsin-hai, *Within the Four Seas*, United Printing Service, 1958）。

（11）（12）（14）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72，17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13）（19）郭蕊：“天涯赤子情——献给张歆海、韩湘眉教授的一束雏菊花”，《人物》1986年第3期。

（15）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美国研究》1989年第1期。

（16）（17）（54）1963年10月27日斯诺致张歆海函，胡佛档案；同上，前言。（33）（37）（38）（39）（40）（42）（44）（45）（46）（48）（50）张歆海：《美国与中国》第16，22，13—14，15，16，153，74—75，89，89，73，135页（Chang Hsin-hai, *America and China*, simon and Schuster, 1965）。

（18）1971年5月27、28日张歆海分别致富布赖特、爱德华·肯尼迪、雅各布·K·贾

维茨、乔治·麦戈文函，胡佛档案。

(20) 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第1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21) 郑也夫：“理性地批判与选择”，《读书》1989年第4期。

(22)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56—266页。

(23) 《道德经》。

(24) 《中庸》。

(27) 黄万盛：《危机与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309页。

(34)〔43〕〔47〕〔49〕张歆海：“解决中国问题备忘录”，胡佛档案。

(35)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长征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

(51) 萧功秦：“文化失范与现代化的困厄”，《读书》1988年第10期。

(52)《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94页。

《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亨利·卢斯、《时代》周刊 与四十年代中美关系

许 静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亨利·卢斯(Henry R. Luce, 1898-1967)是本世纪美国新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首创了新闻杂志形式，创办了《时代》、《生活》、《幸福》等许多著名刊物，成立了在当时美国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时代》公司。《20世纪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卢斯“是美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时代》周刊所创造的词语已成为当今美国英语的一部分”，“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的教育制度。”〔1〕

在美国人眼中，亨利·卢斯的名字又是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卢斯在中国生长了14年。在40年代，他是美国上层少数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之一，许多美国人正是通过他的杂志和电影纪录片了解了抗战中的中国。但由于卢斯本人具有强烈的政治偏见和反共情绪，因而在援蒋反共的活动中充当急先锋，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作为一个纯粹的美国人，卢斯的思想 and 行为在一部分美国人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他的《时代》周刊在40年代曾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然而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本文试图剖析卢斯的思想行为，并对《时代》倾向性新闻报道手法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个侧面。

卢斯是美国资产阶级中上层的代表。他借助《时代》周刊,仅五年时间即成为百万富翁,当时他还不到30岁,这在美国新闻出版界实为罕见。获得商业成功的卢斯笃信资本主义制度,他称赞商人是社会道德的表率,单是1929年《时代》封面就刊登了梅隆、杜邦等16位“大亨”照片,他的《幸福》杂志就是为工商界上层创办的,著名的《生活》画刊也竭力宣扬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他的杂志带有保守的上流社会特点。既反映了也影响着中上层人士的思想。

作为一名成功的出版商,卢斯还热心于政治。他利用他所控制的杂志反映他的整套价值观,利用杂志为共和党做宣传,影响选民。他被称为“美国第一批真正的全国性宣传家之一。他就全国性向全国讲话,他一个人拥有一家在全国发行,用一个声音讲话的杂志。”〔2〕从1940年大选起,他的杂志就成为共和党的喉舌,并逐渐成为美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和中间派力量代表。

卢斯有一套完整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左右了他的行为,并通过他的杂志传播出去,因此有必要进行剖析。

1. 极端的宗教观

卢斯父亲是参加19世纪末“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受家庭影响,卢斯从小就表现出对宗教的极端虔诚。美国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加尔文教是美国最主要的宗教,它的教义是“上帝选择”和“命运注定”。上帝为每个人安排职业及成功的品质,追求成功之路即是赎罪之路。“个人财富和利润的增长,乃是一种神佑的明显标记。”〔3〕视职业为天职的思想又使基督教道德在于责任的完成。

既追求财富,又讲求责任这一美国文化的特点在卢斯身上典型地体现出来。商业成功使他自视受神恩宠,同时又把他的职业视为神的感召,强调新闻应教育大众,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他自命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捍卫者,称自己的杂志为既成体制的代表(The Establishment),他经常利用杂志宣讲上帝的真理,实际上却有许多是他本人的极端看法。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分析时说,卢斯杂志总是“站在上帝的观察高度,谨慎地推动精密组织的社会政治生活”。〔4〕

卢斯的宗教观带有简单化和极端色彩,他没有对基督教义全面深刻地把握,而是局限于对圣经中善恶斗争,上帝拯救以及简单机械的宇宙观的肤浅认识,虔诚又把这些肤浅认识推向极端。尽管卢斯的极端性带有个性特点,但也反映许多美国人的通病,过分讲求实用,更乐于接受或进行对事物的简单的解释。作为一名新闻业人员,卢斯知道简单的解释总是更容易说服大多数读者。一名美国官员说:“这就是美国方式,事情不是黑即是白,没有灰的。”〔5〕

2. 极端的反共意识

如果说关心政治是基督徒社会责任的表现,那么反共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极端的宗教的必然反应。宗教的价值标准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越是固守这一标准,对与之相反的意识形态就越无法容忍。在美国社会中,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仇视是一种普遍情绪。卢斯对宗教的极端虔诚态度和对美国制度及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笃信使他把反共意识形态推向极端。他曾一直主张从政治经济上孤立苏联,反对美国承认苏联。早在1943年美苏两国为反法西斯而友好合作时,他的杂志就小心地摆出冷战姿态。他总是要求手下记者从道义角度看待全部斗争。二战后,他的杂志又率先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笼制造舆论空气,从卢斯思想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文化思想的一种矛盾,即宗教价值观导致的判断标准唯一性与民主自由提倡的宽容精神相矛盾。

3. 民族主义与美国世纪

卢斯反苏立场除了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反感外,还有对苏联将成为未来美国主要对手的恐

惧。这源于他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

和许多传教士的后代一样，卢斯对美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忠诚。但他对美国的热爱不仅是对祖国的眷恋，而且是对美国制度和美国文化优越性的坚信不疑。

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意识得自于历史。第一批到达美洲定居的，是为躲避迫害而来的清教徒。他们历尽艰辛终于得到生存发展，因而视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潘恩等人又宣传“美国有权利重新开创世界”。〔6〕主张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理想世界。美国人习惯视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用美国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并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民主推到全球。这就是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当美国实力不够强大时，“孤立主义”主张做到内部巩固，为欧洲做出榜样。当美国实力足够强大时，它的义务范围就越出国门，不断扩大，实行实际上的扩张主义。

尽管美国对外政策中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大传统，但在文化观念上，却都是为了保存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和理想。〔7〕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说：“美国人是理想主义者，美国是由理想主义者组成的民族。”〔8〕

卢斯是生活在美国实力迅速上升，向海外扩张愿望急剧增强的时代。卢斯最崇拜的英雄是西奥多·罗斯福。后者正是马汉民族主义理论的忠实信徒，并利用一切机会为美国推行有力的帝国外交政策，其“靠近法西斯主义的边缘足以与美国历史上任何显耀人物相比”。卢斯对于一战中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也特别赞同。正是这位总统提出“最后确定作为一种明确义务的美国使命是要把美国的原则和制度扩展到整个世界”。〔9〕

在大学毕业演说词中，卢斯就要求美国担负起世界领袖和国际警察的责任。二战爆发后，美国参战前，他就掀起一场“美国世纪”的宣传活动。其中心思想是美国出于道德责任应武力干涉欧洲，战后建立由美国统治的世界新秩序，美国应成为战后世界大家庭中“慷慨仁慈的兄长”。在卢斯眼中，美国不仅要充当道德领袖，还要扩张经济，充当世界警察。他一方面主张向世界各地派传教士，向经济落后地区派技术专家，一方面又主张通过增强军事实力保证海洋自由，扩大世界贸易。〔10〕

尽管卢斯言论在当时被开明人士指责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但却是继承了自“门户开放”以来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并预示出美国后来政策的基本走向。此后不久，美国参加二次大战，并取得空前胜利，“美国世纪”的说法在报刊上逐渐流行，战后美国在处理一切外交事务中都表现出一种“美国万能”的意识。1953年艾森豪威尔称“天命已将领导自由世界的大任降于我国”。〔11〕

4. 对中国的“多情的帝国主义”

卢斯对中国的态度是传教士式的，是诚挚的感情与美国式的理想相结合的产物。1830年第一位美国新传教士裨治文（Flijah Coleman Bridgeman, 1801-1861）到达中国。很快，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西方各国中居领先地位，对华精神输出远远超过商品输出。〔12〕“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是通过传教士的眼睛来观察亚洲的。”〔13〕

除美国之外，中国是卢斯最爱的国家。同行们说：“只要跟卢斯长久相处，就无法不感觉到他对中国亲人一般的关心。”〔14〕但是这种感情只是加强了他按美国方式改造中国的愿望。他真诚地相信温和的中国人最能接受美国的文化，他认为“在地球上所有民族中，中国最崇拜和相信美国人民，认为美国人民最能接近他们自己所祈盼的自由发展的境地。”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不仅能实现美国民主理想，而且能实现商业梦想。卢斯在《美国世纪》中强调，“亚洲将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几亿，而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卢斯的理想就是：使中国基督教化，打败日本和消除共产主义威胁，使中国成为美国世纪的一部分。从卢斯身上体现出的正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传统对华态度。正如1983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生动地指出：“从美国的观点看，我们的19世纪多情的帝国主义分子”形成了一个传统。美国人将奉天承运地横渡太平洋西去，把“进步”和“文化”带给地球上最大的国家，而施主也将因

此而洋洋得意。(15)

美国传统对华思想是传教使命与商业理想的结合。这一想法既源于美国本身理想主义,又与近代以来中美关系交往中美国单向输出的特点有关,在中国人民面前,美国自封为当然的“救世主”,有一种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态度,这导致了他们看待中国问题的“主观主义”。费正清指出:“中国,有时是一面镜子,美国从中看到的不是中国的现实,倒是美国自己。主观主义使美国趋向于按照自己的经历来看中国。”(16)

美国对于中国的主观主义立场自“门户开放”以来一直未受到挑战,反而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到错误的映证。乔治·凯南批评说:“在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照会的这段插曲中,美国大力维护了美国原则在国际社会中的胜利——美国为美国观而战斗。”(17)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卢斯数次访华,接触的是少数上层人物。1932年访华与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联系,1941年和1945、1946年的访问都得到蒋介石政府国宾一般的接待。这只是因为蒋确切认识到他作为一名有势力的美国人的重要性。《新民晚报》曾评论说,“卢斯既没有与普通百姓交往,亦与大众日常生活无关,如果他凭借他的观察在他的杂志上讨论中国问题,则仅仅有助于为中美关系增加一些误解。”(18)美国人这种“主观主义”不仅使他们无视中国现实,而且视干涉为当然的道义责任。

30年代始,蒋介石成了卢斯理想的代表。他的反共行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都赢得卢斯的好感。蒋介石被视为美国文明培养的结果和未来的希望,是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而又不破坏旧有文化的第一人。

与卢斯同时代的还有另一批关心中国的美国人,如记者斯诺、白修德,军方及外交界人士史迪威、谢伟思、戴维斯等,和他们相比,卢斯对中国社会明显缺乏一种现实感,一种对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走向现代化的愿望的真正的理解和同情。他站在美国立场,以美国方式看中国,他越是固守它的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立场,他离中国现实就越远,一旦现实发展违背他的理想,便走入另一极端。

作为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卢斯的思想还代表了共和党内“亚洲第一”派的观点。在美国政界一直存在“亚洲第一”还是“欧洲第一”的争论。在共和党内部保守派中一直有一些人主张在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的同时,积极干涉亚洲事务。(19)这些人在国会中以周以德为代表,在军方以麦克阿瑟、德雷福斯特等为代表。

二

《时代》是卢斯创办最早,影响力量最大的杂志,也是卢斯帝国的一件政治工具。

《时代》影响力首先在于它有一个广大的遍及全国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读者群。《时代》创刊伊始即瞄准美国“一百万大学毕业生”,卢斯强调《时代》“是为来自印地安那州的绅士写的”。40年代,其订户达200万,这些人是美国社会的中坚,具有一定地位。《时代》不仅能影响他们,还能通过他们影响更多的人。

其次,《时代》周刊忠实地反映了卢斯的思想观点。卢斯首创了群体新闻学,记者只写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决定一切。整个《时代》杂志则是围绕卢斯思想转动的机器。卢斯认为这个世界只是他的记者和杂志对偶然事件的观察进行证实的固定模式。

第三,《时代》具有极为高超的宣传手法。《时代》首创的解释性新闻(Interpretative News)报道,一方面,内容丰富,手法生动,新闻变成故事一样吸引人;另一方面还能寓理于事,以事明理,点破事件意义,缩小或扩大事件影响,它不靠改变新闻,而是利用各种手段改变新闻意义,发表无形意见,使对整个新闻解释符合它的观点,从而引导读者在不自觉中赞同它的立场、观点,起到正面宣传所起不到的作用。卢斯公开宣称其倾向性,强调报刊应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这在强调“客观性”的新闻同行中受到攻击。

40年代,《时代》周刊对中国报道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恐怕是美国任何报刊无法比拟的,其报道的倾向性也尤为突出。笔者曾对国内现存的1941—1949年出版的400多份《时代》周刊进行粗略的统计和分析。

从统计资料看,《时代》对华报道连续性强(平均每期1.2篇,90%登在国外新闻(Foreign News)的中国(China)栏中);覆盖面广(以深度报道为主,内容广泛涉及政治(42%)、军事(18%)、外交(10%)、经济(6%),在7%的人物报道中也以政界尤其国民党中人物为主);观点前后一致,倾向性强。纵观其对华报道,可从中清楚地看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但是这些历史事实却是为编辑观点包装过的。其手法归纳起来有三种:一是随真实新闻同时公开发表的略欠真实的观点;二是隐藏在新闻背后的清楚的观点;三是通过夸大事实,有意选择及隐瞒歪曲新闻而发表观点。现择要分析如下。

《时代》宣称没有社论专页,但它以新闻形式发表与其编辑观点一致的重要人物的长篇讲话,实际上起社论作用。

1945年6月18日《时代》全文发表众议员周以德国会讲话。周以德是当时议会中少数几个亲蒋分子之一,《时代》称之为“现任官员中最了解远东的议员”。该文大肆为蒋介石辩护,指责中共是武装叛乱,不抗日,行动上与苏联一致,还采用希特勒似的宣传。与此同时还指责美国国务院中一些人支持反蒋宣传。

1947年10月13日《时代》又转载《生活》杂志上的布利特报告。这位前驻苏大使在以《生活》杂志特派记者身份到中国一访后,即在报告中以防止中国落入苏联之手为由,要求美国制订一个三年援华13亿美元计划,派麦克阿瑟以总统代表身份到中国协助蒋介石作战。这两篇报告集中体现了编辑思想,起到统一立场,引导舆论的作用。

另一方面,1943—1944年中,重庆记者团中大部分人对延安政权有好感,斯诺以及《时代》记者白修德等人做了许多客观报道,迪克西使团报告中也赞扬中共民主气氛浓厚,抗日积极。《时代》没有客观介绍这一派观点,却指责说:“中共及其同情者只称赞延安土地改革,劳动联盟,军队食物充足,游击战术有效,却不报道延安新闻检查制度(比重庆还严),铁的党纪,叛徒集中营,秘密警察制度及其他独裁特征。”(20)

《时代》在对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解释性说明时已渗入编辑观点,从而使读者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接受到编辑思想。在报道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时,《时代》如此报道:“中共曾威胁说若蒋介石占领张家口,红军将要在民族分裂的情况下投入内战……在此之前,尽管蒋介石认识到只有通过军事胜利才能实现有效统一,但仍默许马歇尔的十天停火建议,这一建议可能挽救张家口……但周恩来拒绝停火,终于导致张家口。”(21)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描述这一段历史时说,马歇尔对蒋介石明显的口是心非极为愤怒,威胁说如不停火,便要求政府将他召回,蒋便提出十天停火建议。两相对比,《时代》的报道对事情进行了符合编辑观点的解释。从《时代》对历史的描述中,读者容易得出蒋介石有实力却一心维护和平,中共却不愿和平的印象。

提供在量背景材料是《时代》报道的一大特色。利用背景材料反映编辑观点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时代》在报道中惯于把并无关联的材料放在一起,诱使读者看出其中“内在联系”。如1945年2月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周恩来飞回延安。在这段新闻之下,附加一段“本周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回应了周将军,莫斯科《真理报》咆哮说:重庆近来政府改革‘仅仅是重新洗牌’。中国战争努力松懈是因为蒋介石不能解决‘内部政治危机’和‘使国家民主化’”。(22)这两段分开来看并无关联。实际上二次大战中苏联没有给中共任何物质援助和政治指导,前面所说的周以德报告中也确认这一事实。《时代》在两个实际不相关的新闻之间加上一句解释性导语,便使人觉出中共有苏联支持。

巧妙地借助评论发表编辑的看法是《时代》报道又一特色。用评论性导语将新闻限制在某一框架内,如“二次大战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占领满洲,使满洲工业化。美国胜利一大战

果是使满洲回归中国……来自红区报告表明……满洲成为苏联又一个卫星国。”下面报道东北成立民主政府，与苏签约，和发展经济计划。（23）这样就把实际新闻变为编辑观点的证明。

在报道之前加上引导性解释：如在1946年6月10日发表国统区经济恶化、通货膨胀长篇报道时，在文章前加一段说明：“中国陷入经济灾难和政治混乱，原因：（1）共产主义叛乱；（2）美国没有给予足够的立即援助；（3）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24）这段话实际上把读者纳入编辑思想框架。

为示客观，《时代》经常借别人之口发表自己的观点。借《纽约先驱报》之口称“中共是想夺取政权的阴谋集团”，（25）借一个百姓之口要求美国出于道义助蒋介石内战。借议员克拉克之口要求美国政府用全面援助挽救颓势中的国民党。（26）有时冠之以“知名人士”，有时则是一个医生、一位警察、甚至是“大多数人”、“有些人”，但所说的话与《时代》立场相左者实属罕见。

《时代》的倾向性立场尤其表现在人物新闻上。卢斯认为“人名创造新闻”（name makes news），大量生动的人物新闻是《时代》特色。蒋介石是《时代》竭力塑造的媒介人物（media figure）。蒋介石像曾六次登上《时代》封面，同一时期在报道中也经常出现蒋在各种场合穿着各种服装的照片。蒋的生平被数次长篇介绍，极富传奇色彩。此外，在新闻报道中，综述和背景介绍中运用各种写作手法把蒋介石塑造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中华文化和孙中山思想的捍卫者，抗战英雄，反共排头兵，得到部下和广大人民拥护，人民“怨气只是对腐败的下属官僚”。（27）

与之对应的，《时代》称毛泽东为共产主义头子（“Communist Bose”），顽固的、个性化的、沉默寡言的内战专家，资深的共产国际分子。（28）对中共方面著名人物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没有生平介绍，只对毛泽东家庭有简略介绍。

《时代》立场观点还可以通过新闻选择上表现出来。它对国民党报道全面、详尽、连续，占各部报道中的比重大，褒多于贬。而关于中共的报道则零散、片面，占全部报道比重小。大量有关国民党报道集中于民主改革、经济改革，尤其是对国民党宪法选举和总统选举更是从多角度、多侧面长篇报道。似乎国民党正按美国方式改造中国。关于中共报道常选一些特例，如报道一位有16年党龄的人逃离延安，（29）中共占领的一家火柴厂雇用童工（30），报道解放区传教士受冷遇，（31）甚至报道福建一老妇向孔子幽灵控诉共产党杀了她的丈夫、儿子，“苛政猛于虎”。把历史典故改造成新闻。（32）竭力调动美国人的道德情感，宗教心理。这其中有用个别体现一般，有用部分事实代替整体事实，由于版面限制，读者从有限的报道中容易得出错误的印象。

《时代》倾向性也表现在报道用词上，如用于中共则是“恶吼”（ugly cried）、咆哮（growled）、怒喝（thunder）。国民党则是平静地说（Calmly say）、宣称（acknowledge）、建议（Suggest）等等。称国民党军是政府军，人民解放军为“红军”（the Reds），用Reds是想调动读者恐共恐红心理。

编辑在新闻安排上，标题应用上也颇有考虑。几次以“蒋即中国”（Chiang is China）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以上只是一些粗漏的概括，但已经可以从中看出，《时代》明显反映出编辑的片面又失之客观的看法，这些看法又以报道新闻的方式传递给读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

作为一名有势力的出版商和共和党要人，卢斯还不断利用其财力和政治影响进行援蒋活动：

1. 在人力物力上给蒋以大力支持

为使蒋在美国有更多活动据点，他曾为中国赴美留学生购买寓所，并成立美中协会（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后又把协会正式登记为国民党在美事务的代理机构，卢斯兼任董事。

抗日战争中他出钱出人帮助组建救济中国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为支持这一组织倡议的对华捐款，卢斯曾亲自写信给《时代》订户，获得捐资24万美元，成为援华个人捐款典型。

二战后他派驻中国的记者谢普利（James R. Shepley）和贝尔（John R. Beal）分别担任马歇尔和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帮助二者了解华府意图和美国公众舆论。

他派《时代》公司司库斯蒂尔曼（Charles Stillman）参加中美经济合作委员会（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前往中国规划和执行美国对华援助。

2. 利用舆论工具大做宣传

日本侵华没有引起美国公众舆论重视，在许多大报不愿向中国派记者的情况下，卢斯派了几名记者到中国，其中之一是著名的白修德。

1944年宋美龄访美，卢斯利用他所控制的新闻工具，采用新闻报道，广播讲话，拍纪录片，公众集会等各种方式大做宣传。卢斯组织的“欢迎蒋夫人公民委员会”由小洛克菲勒担任主席，其中包括270名纽约知名人士。从而使蒋介石夫妇一下子从默默无闻转变为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

3. 利用个人影响进行游说，干预决策

卢斯与政府及各界知名人士有密切联系。《时代》封面每期刊登一位知名人士画像，然后将画像以复制品送给本人，这一做法保留至今，极具影响力。

1941年卢斯访华回国后，曾先后会见了总统助理柯里（Lauchlin Currie）（此人负责对华援助）、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总裁琼斯（Josse Jones）、国务卿胡尔（Hull）、海军参谋长诺克斯（Frank Knox）、财政部长摩根索、战争部长斯蒂姆逊（Henry L. Stimson）等重要人物，为国民党争取援助。

卢斯与共和党元首，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是至交。他本人也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1948年总统大选中他曾组织推举范登堡为共和党候选人，并希望自任国务卿。此举引起蒋介石本人及蒋驻美使馆的极大兴趣。在国会通过援华法案过程中，范登堡曾突然撤出外交委员会指责蒋政府的言辞激烈的报告，而换之以经修改后批评较温和的报告，据说卢斯曾对此事起作用。

1948年大选杜威被推举为共和党候选人，卢斯的杂志不遗余力地为共和党宣传，批评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使对华政策成为两党争论的焦点。

卢斯的上述活动是与40年代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配合一致的。卢斯的夫人曾任院外援华集团的重要组织——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会长。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已为大家所熟知，这里要指出的是，卢斯所代表的一批人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出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的原因才支持蒋，有些甚至仅借中国问题达到反对杜鲁门政府和民主党的目的。在美国那些关心中国的人中，经济考虑始终不居主导地位。

四

整个40年代，正是中国人民抵御外族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也是中美关系经历历史性转变的时代，卢斯及他的杂志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卢斯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激起了美国人民广泛的关注与同情。但美国人民在了解中国的同时又不能不受卢斯错误思想的影响。《时代》对华报道为美国人民描绘了一

幅关于中国历史的近于完整的图画，但这幅图画却由于编辑本人的思想、立场而失去某种真实性。中国抗战努力被夸大宣传，蒋介石形象被过分美化，他的实际地位和政策效力被过高估计，他统治的虚弱被忽视。中共被贴上苏联代理人的标签，它实际所拥有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得不到反映，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国人民渴望改变旧的生活方式的欲望被错误估计和判断。当中国革命超出卢斯的设想，也使美国人民感到震惊时，《时代》就提出一个简单的符合逻辑的解释：共产主义扩散，美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于“上面的愚蠢和下面的叛卖”。如果接受了卢斯的立场观点，也势必会接受这一逻辑解释。

报刊不会创造历史，但是，它们能够记载和报道历史事件，其记录和报道方式能够影响历史发展的方向。当这类报道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曲解，或是未能消除人们对历史的谬见时，更是如此。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早在1922年出版的《舆论》一书中就指出报刊的描述具有欺骗性，使人产生误解，在我们的头脑中制造有关“外部世界”的歪曲图像甚至虚构的图像。

卢斯及其《时代》周刊在美国人心目中树立的中国“形象”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影响。而在当时，卢斯杂志与《读者文摘》、赫斯特—霍华德报系等构成新闻界右翼，并与《中国月刊》、美国对华政策委员会等机构的宣传活动配合一致，形成强大的援蒋舆论，使一些真实的声音被淹没。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受卢斯支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之后曾出访中国，回国后写了一本与卢斯观点一致，颂扬蒋介石的书——《世界一体》，这本没有多少真实性的书在美国有上百万读者，而同一时期谢伟思发回国的真正的外交材料却无人问津。（33）

这种舆论力量最终影响了国会和杜鲁门政府的行动，直接促成了对华新的援助计划的通过。

一般公众对美国国外事务不太关心，只有大约25%的美国人对外政策感兴趣，这些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能出国旅游，或出于职业原因对国际问题感兴趣，如记者、编辑、商人、劳工领袖、知识分子、各种利益集团成员。他们形成外交事务上的舆论。由于他们一般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故其意见往往能传给更多的人。构成“舆论精英”。在美国一直有“谁调动了精英，谁就调动了大众”之说。（34）从前面对《时代》读者的分析看出，它的读者群正属于“舆论精英”和“意见领袖”的范围。议员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主要源于报刊和他人影响，因而国会往往成为反映舆论的场所。

杜鲁门政府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作为决策依据。外交官报告很多不同于《时代》观点，杜鲁门曾对部下说“别太在乎卢斯的杂志”。明显的例子是，《时代》及其他一些院外宣传主张武力干涉中国，却没有为杜鲁门政府采纳。另一方面，舆论又成为决策的限制因素。由于舆论作用，使中国问题深深卷入美国政治。杜鲁门为避免大选失分太多，也为了使援欧方案顺利通过，屈从舆论压力，通过新的对华援助方案。舆论作用，就在于对政府决策形成持续不断的压力，促使政策偏向。

就其效果来看，《时代》及援蒋院外集团的宣传无疑是“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公众的倾向性心理。关于倾向性与宣传效果的关系，许多传播学者都进行了研究。“真实若想取胜，就必须是一种符合个人倾向性的真实而且确凿可信；谬误要想占优势，只要能迎合其所针对的听众的心理状态而且不能被立即驳倒。”（35）卢斯的思想及《时代》周刊的编辑立场是以美国对华传统思想为依据的，这一思想从一开始就存有谬误但却能为许多美国人所接受。二战后美国普遍感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增强，这就导致了公众的紧张情绪上升，从而使接受最极端解释的倾向性增长。也许美国人民本可以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解，但由于历史和时代的背景，最后被接受的解释是美国公众和院外援华集团相互需要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卢斯及院外援蒋集团加紧了反共反华宣传。促使美国对华政策检讨在一

种混乱、激烈而又令人沮丧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没有对整个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深刻的历史的和哲学的反思，而是简单地归之于共产主义阴谋。使国内一大批有才华的亚洲问题专家及外交官受迫害、受打击，亚洲问题无人敢问津。对外政策上，随着共和党艾豪森威尔上台，另一个狂热的共和党人，与卢斯同为长老会教徒的杜勒斯更加主张道义原则，把遏制政策进一步扩大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中国成为这一政策的一大目标。

白修德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新闻界的作用和卢斯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如果卢斯承认蒋介石政权的垮台的话，如果他愿意接受和说明它失败原因的话，那么后来美国的政局就可能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对这些事件采取开诚布公的和谅解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冷淡的和错误的态度的话，那么就能使我们自己免遭两场可怕的战争。……对于任何要使美国的亚洲政策重新具有现实性的人来说，卢斯的刊物是个重大障碍。”

亨利·卢斯已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中美关系经过曲折发展，越来越多的对中国友好的人士认识到，从“单方面，易走极端地，扭曲地看中国，不会导致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感，而只会是一种轻蔑感。”“只有超越了中美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差异，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巨大不同”（36），才能真正促进两国关系发展。

注释：

(1) William H. Taft, *Encyclopedia of Twentieth-Century Journalist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6)

p. 214.

(2) 哈尔伯斯坦：《无冕之王》，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3) (4) (英) 弗兰克·帕金，谢维和等译：

《马克思·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走向未来丛书”，第60页；第243页。

(5) Thomas G. Paterson, "Presidential Foreign Policy, Public Opinion and Congress: The Truman Years," *Foreign Affairs*, 1981, Spring.

(6)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9.

(7) Arthur Schlesingers, Jr.,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1986), p. 53; 又见, 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 载《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8) 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19页。

(9) Robert L. Beisener,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1865-1900*, N. Y. 1975, p. 9.

(10) Henry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N. Y. 1941).

(11) 王缉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 载袁明、(美) 哈里·哈丁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460页。

(12)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20页。

(13)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第474页。

(14) James L. Banghman, *Henry R. Luc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Mass Media*, G. K. Hall & Co. 1987, p. 196.

(15)《美中关系未来十年: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对华政策论文集: 1983—199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3页。

- (16) 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载《美国研究》,1989年第1期。
- (17) 乔治·F·凯南:《美国外交,1900—1950》,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讲座,芝加哥大学1951年,第37页。
- (18) “新民晚报”,1945年10月23日。
- (19) 张也白:《“孤立主义”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载《美国研究》1991,3。
- (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 *Time*, 1944, 10, 16; 1946, 6, 24; 1945, 2, 26; 1949, 9, 12; 1946, 6, 10; 1945, 8, 27; 1945, 11, 19; 1948, 4, 26; 1945, 9, 3; 1944, 11, 13; 1946, 2, 11; 1947, 12, 8; 1948, 2, 2。
- (33) (美)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 (34) Almond,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p. 138, 转引自同(5)。
- (35) 袁明:“从1947—1948年美国国会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
- (36) 黄华:第五届埃德加·斯诺研讨会开幕词。

《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乔治·凯南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 (1947—1949)

张小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标志着美国在中国调停计划的破产。此后,随着中国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美国政府陷入对华政策艰难选择的困境之中,有关机构及官员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建议。本文主要分析美国著名的苏联通、1947年至1949年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简称PPS)主任的乔治·凯南之对华认识及对华政策主张,试图从一个侧面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乔治·凯南的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受制于他本人的经历、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归纳起来说,有三方面的因素影响凯南在1947至1949年间的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

一是苏联的因素。众所周知,乔治·凯南是一位苏联通,长期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供职,他的名字是同战后杜鲁门政府对苏“遏制”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凯南长期研究苏联问题,这使他习惯于从对苏的角度看待与分析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包括中国。同时,由于战

后美苏两极对立的基本格局,对苏战略是美国对外战备的核心,这决定了美国政府官员(不管是否负责苏联事务)以美苏关系为中心,分析与处理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另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和较长期的关系,战后年代美国决策人在考虑对华政策时,很难摆脱笼罩在他们心中的一块阴影即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美国朝野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即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仆从或工具。(1) 尽管凯南一再声称苏联不可能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内部会出现“铁托主义”倾向,他在战后初期也认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受莫斯科的“鼓动与操纵”。(2)

二是“西方中心”观念。凯南出身于具有盎格鲁—萨克逊血统的中产阶级家庭,在美国东部的名牌大学(普林斯顿)接受教育,西方价值观念在他的脑中是根深蒂固的,时常表露出某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凯南在其著名的“八千字电报”与“X文章”中都强调指出,俄国文明同西方文明相比要落后得多,因此俄国统治者及苏联领导人在同西方打交道时具有很强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为了使其政权得到巩固,他们要努力搞乱西方社会的内部和谐与传统的生活方式。(3) 另外,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凯南认识到美国力量的限度,认为美国无力插手世界各个角落的事务。上述文化优越感及对美国力量限度的认识,使得凯南主要关注西方发达地区,轻视世界其他地区。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的重点是保护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地区及对西方安全攸关的交通线和其他战略要地。虽然凯南对“遏制”重点地区的划定前后时期有所不同,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十分确定的,即西方发达地区。1948年8月,凯南写道,美国要努力使以下对美国安全攸关的地区不落入敌对势力的手中:(1) 大西洋共同体的国家与地区;(2) 地中海国家以及东至伊朗的中东国家;(3) 日本和菲律宾。(4) 一个月之后,凯南在国防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的一次演讲中重新界定了“遏制”的重点地区。他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只有五个工业—军事中心对我们很重要”,即:美国,英国,德国及中欧,苏联,日本。因为只有上述地区具有发展两栖力量并严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气候、工业力量、人口及传统等必备的条件。(5) 在凯南的心目中,中国等亚非拉广大地区没有什么重大的战略地位。

三是中国通特别是约翰·P·戴维斯的影响。战时,美国有一批谙熟中国语言、文化的职业外交官,如戴维斯、谢伟思等。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局势作了较客观的分析与报告,被美国一些当权者认为有“通共”之嫌,纷纷被调离中国。(6) 其中戴维斯1945年初被派到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充当负责使馆行政事务的公使衔参赞乔治·凯南的部属,并深受他的赞赏。凯南称戴维斯为驻苏使馆中“最了解中国事务”的人。(7) 戴维斯也把凯南看作是“天才的同事、老师与朋友。”(8) 凯南经常同戴维斯研究中国及远东问题,并认为自己对苏联远东政策性质的认识主要得益于戴维斯。(9) 1984年10月凯南对一位采访他的历史学家说,他对亚洲的了解都来自戴维斯的指教。(10) 所以当1947年初凯南受命筹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并出任该机构的首脑时,把戴维斯拉进了政策计划室,成为他关于中国及亚洲事务的主要顾问与助手。戴维斯二战期间在史迪威手下工作,通过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他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活力,主张美国政府直接同中共交往,并采取措施防止出现亲俄反美的共产党政权。1944年秋,戴维斯考察了延安解放区,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他在从延安给华盛顿发出的报告中严厉指责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士气低落,同时高度评价了中共的力量,认为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十年内战和七年日本侵略并且得到发展与壮大,它之所以有活力和力量是因为群众积极支持与参与,“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享有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11) 因此,戴维斯和谢伟思等人都认为中共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主张美国政府不应把赌注押在一个衰败的政权上,应当促成建立联合政府,向中共提供军援。关于中共同苏联的关系,戴维斯认为,中共内部独立倾向与民族主义力量会促使中共同苏联产生矛盾,美国应鼓励中共同苏联闹独

立。(12) 尽管凯南并不完全接受戴维斯等中国通对中国的分析, 他们对国民党政权腐败没落、美国对中国局势发展无能为力以及中共独立于莫斯科等等的认识, 则为凯南所赞同。

(13)

二

在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基础上, 凯南形成了对华基本认识及对华政策主张。它们集中反映在1947年至1949年间凯南给美国国务卿的几份备忘录以及他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室的对华政策研究报告中。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 政策计划室研究报告大多是凯南本人亲手起草的, 而且所有报告在上交有关机构与官员阅读之前都需征得他的首肯, 所以政策计划室的报告代表凯南个人的观点。(14) 为了叙述与分析的方便, 笔者把凯南1947—1949年间对华认识和对华政策主张结合起来阐述。

1. 美国从中国脱身。凯南一再建议美国政府尽早从中国脱身。这是基于以下的分析:

(1) 蒋介石政权势力正在衰败, 他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它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所以, 继续无条件地向蒋介石承担义务对美国不利, 束缚了美国的手脚。(15) (2) 美国对中国局势之发展无能为力。因为中国目前局势的产生是其内部原因使然,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美国人无法左右。况且如果全面支持蒋介石(即不仅出枪、出钱, 而且出兵), 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要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他认为美国不应拿自己的信誉和资源去赌博。(16) 同时, 凯南也反对国际调停, 认为这无济于事。(17) (3) 中国的“陷落”对美国的利益不会构成太大的危害。凯南认为, 在可见的将来, 中国将为人口压力、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下、不满情绪与动乱等等所困扰, 处于混乱与专制交替的恶性循环之中。他指出, 即使中国共产党掌权, 中国也摆脱不了这一可悲的命运。与此同时, 凯南认为, 由于民族主义力量的作用, 中共内部会出现“铁托主义”倾向, 苏联很难控制中共和把它当作自己的工具。因此, 虽然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会加强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政治攻势, 但不至于对美国的利益造成灾难性的影响。(18) 总之, 凯南认为美国不应指望通过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改变中国事态发展的进程; 美国对华政策要依据形势的变化进行灵活的调整, 逐步减少和停止对蒋援助, 但在蒋政权垮台之前要继续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 向美国公众说明美中关系的背景。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美国从中国脱身。

2. 在中共与苏联之间打进“楔子”。关于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凯南在1947年春出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之前对此作过分析。1945年4月13日, 当时任美驻苏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给在华盛顿的哈里曼发了一个电报, 评论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关于他同斯大林会晤的报告。他认为美国不应相信斯大林会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对华政策, 采取行动使中共的武装力量统一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 因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可接受的条件下, 统一实际上才可能实现。”(19) 1946年初, 凯南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莫斯科和延安的关系如何,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一个问题为转移的, 但是至今没有材料证明或者否定中共受苏联控制。他认为, 从历史上看, 中共没有理由感谢莫斯科, 而有种种理由显示对莫斯科“惊人的独立性”; 但尽管如此, 延安在对外关系上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因此事态的发展会迫使延安不脱离莫斯科的轨道, 在决定性时刻莫斯科可以对它施加有效影响, 这显然不是取决于延安共产党人的主观愿望。(20) 总之, 在1947年以前, 凯南认为, 中共既受苏联的影响又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这一认识体现在1947—1949年间他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分析之中, 但在后一个时期, 凯南比较关注中共的独立性, 这同苏南关系破裂有很大联系。

1947年以后, 凯南领导的政策计划室集中力量研究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其基本结论是, 中共对苏联有明显的独立性, 美国可以在中共与苏联之间打进“楔子”。

1948年9月7日的PPS 39号文件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中苏关系。该文件说,苏联出于获得满洲和华北的自然资源和通过政治手段扩张其影响之目的,要努力影响、控制中国,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工具”。但是,中共可能同南斯拉夫一样对待苏联,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莫斯科在试图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人时就会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即使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毛泽东掌权的时间是铁托的将近10倍”。PPS 39认为,即使中共机构中的其他人是受莫斯科控制的,而且毛“极为忠诚”,但是“莫斯科还是不会对此满意的。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即使毛及其同志们最终不能获得它的全部——这种诱惑力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大了,特别是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上会是在民族主义狂热中取得政权。”(21) 1948年11月23日的PPS 39/1号文件所得出的结论同PPS 39类似:“……无疑,受到承认的政府在国内冲突中迅速地输给主要受莫斯科鼓动与控制的力量,这是令人遗憾的,也是有损美国利益的。但另一方面,这一进程在导致共产党人完全控制中国的同时而不会促进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强大的‘铁托主义’倾向,是令人怀疑的。同时,共产党人控制了那么大块地方后会以严重危害这个国家安全利益之方式开发与利用其资源,这样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共力量的壮大在我们看来是个严重的政治事态和亚洲形势的剧烈恶化,但不可能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灾难性的危害。”(22) PPS 39/1继续分析道:“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又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莫斯科的援助。莫斯科的道义支持与意识形态鼓励比援助还重要,但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人胜利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弱点与腐败。”(23) 政策计划室上述两个文件对中共与苏联关系所作的分析,实际上是向美国决策人暗示美国可以在中共与苏联之间打进“楔子”,分裂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为实现美国的利益服务。但是在蒋介石政权垮台和中国局势完全明朗之前,美国政府在静观局势的发展,等待“尘埃落定”,凯南在1947—1949年担任政策计划室主任期间,没能提出分裂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具体方案。

3. 美国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1949年夏天,蒋介石政权的灭亡已成定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退守台湾、澎湖列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南于1949年6、7月间力主美国出兵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其基本理由是:(1)从目前局势来看,台湾很可能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凯南认为,“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的形势正在恶化,很可能在两、三年或几个月内落入中共的控制之中。”(24) (2)只有美国出兵占领台、澎,才能使它们不落入中共控制之中。他指出:“现在看来很清楚,唯一合理的、能使福摩萨、澎湖列岛不落入共产党控制并使这些岛屿同大陆隔开的办法是把现在国民党在台、澎的政权推翻。”为此,他认为美国应当出兵占领台、澎,建立“临时的国际或美国的管理机构”,根据“公民投票”最后决定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蒋介石如果愿意留在台湾,可以给予“政治难民”的待遇。(25) 显而易见,凯南的主张是同1943年《开罗宣言》关于台、澎地位的规定相违背的。但他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美国可以不受《开罗宣言》所束缚。(26) 两年之后,凯南在回顾自己在1949年夏提出的对台、澎政策主张时说:“我从来就看不到把福摩萨归还中国以及中国陷入内战以后我们继续承担义务的正当理由;我在1949年建议,我们应当重新恢复盟军最高司令部(即麦克阿瑟司令部)对该岛的控制,直至能够做出满意的安排。”(27)

为什么声称中国的命运是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不应插手中国事务的乔治·凯南公然主张美国不顾《开罗宣言》的精神,出兵占领台湾和澎湖,以及提出台湾“地位待定”的论调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台湾、澎湖列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同美国的利益密切相关。美国军方领导人一致认为,台湾对美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1949年初,他们对台湾的战略地位作了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1)鉴于台湾战时可以作为战略空军行动和控制附近运输线之基地,在丧失中国大陆战略要地之后,它的战略价值将大大增强;(2)敌对力量控制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将可以在战争中控制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以及

有能力控制琉球群岛和菲律宾；（3）台湾可以向日本提供食品与其他物品，可能是决定在战争中日本是包袱还是财富的重要因素，如果它落入敌人的手中，将危及美国的安全。（28）凯南同军方在对华政策包括对台、澎政策上有较大分歧，但是对台、澎战略地位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他在主张美国占领台、澎的备忘录中强调台湾十分“靠近美国在琉球群岛的军事基地和菲律宾”。笔者在前面提到，凯南“遏制”战略的重点地区是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及对西方安全攸关的交通线与战略要地，由于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凯南至少是在1949年夏把它及澎湖列岛纳入了“遏制”的重点地区。另外，凯南是美国政府中对蒋介石极为反感的人，主张美国出兵占领台湾、澎湖列岛，推翻蒋介石政权对这些岛屿的统治。1951年9月，凯南在一份备忘录中这么写道：“我认为同蒋介石政权的关系没有好结果，应当立即终止，如果需要的话不惜冒国内政治摊牌的风险”，因此美国既不要让中共得到台湾，也不让蒋介石控制它。（29）

三

乔治·凯南虽然是个“苏联通”，但却积极参加美国1947—1949年间对华政策的制订，他的对华认识及对华政策主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尽管我们很难精确地判断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杜鲁门的对华政策。笔者只能从下面几个方面略作分析。

首先让我们看看凯南1947至1949年间在政府中的地位。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凯南在官场最得志、对美国政府对外决策施加最大影响的阶段。二战前及二战中，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外交官，不为罗斯福政府所重用。1946年2月22日凯南从莫斯科拍发的“八千字电报”使他时来运转，成了“说话算数”的人。（30）1947年4月底，国务卿马歇尔授权他筹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凯南亲手组建并在1947—1949年间担任首脑的政策计划室，在战后初期是美国政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智囊机构，参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制订，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研究与起草者，也参加了对华政策的制定工作。1947至1948年底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期间，凯南的办公室就在马歇尔办公室的隔壁，凯南可以通过连接两个办公室的边门经常地进入马歇尔办公室，并享有直接向他递交报告的特权。（31）1947年10月，凯南被任命为国务院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代表。根据1947年由杜鲁门建议和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而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政府的决策机构，其政策建议一旦经总统批准，即成为官方政策。凯南领导的政策计划室1948年9月提出的关于对华政策的39号文件（PPS 39）即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34号文件（NSC 34）。虽然1948年底、1949年初艾奇逊出任国务卿，开始冷落凯南，两人在对华政策方面分歧很大，最后导致凯南辞职，但在对华关系方面艾奇逊与凯南认识比较一致。所以1949年7月20日，艾奇逊在致驻英大使道格拉斯的备忘录中，向道格拉斯说明美对华政策，并且要求他在同凯南（当时正在英国）谈话时要注意凯南提出的观点。（32）总之，凯南在1947—1949年间，是美国政府中说话有份量的人物，他的对华认识与主张可以影响政府决策。

另外，凯南积极参与了对华政策的研究，他领导的政策计划室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实际上代表了国务院的看法，不少建议被采纳。凯南本人多次参加国务院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如1947年10月21日由马歇尔召集的讨论对华援助问题的会议，（33）1949年10月26日艾奇逊召开的国务院远东部门官员与顾问的会议（该会议达成对华政策的决定，凯南以顾问的身份参加）。（34）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如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Butterworth）及该司中国处处长并后任司长的斯普劳斯（Sprouse）多次同凯南讨论对华政策或向他提出分析与建议。（35）如前所述，凯南赞赏“中国通”的观点，并且同戴维斯

有深交，戴维斯是政策计划室的核心成员之一，主要协助凯南起草对华关系的研究报告。所有这些实际上使得凯南的对华认识与主张反映了国务院的基本看法。因为，解决中国问题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乃是国务院官员的共识。（36）凯南提出的美国逐步从中国脱身之建议实际上为杜鲁门政府所采纳。政策计划室报告中提出的美国应注意与鼓励中共与苏联矛盾与分歧的主张，也为杜鲁门政府认真考虑并且付诸实施。（37）凯南组织起草的政策计划室39号文件（PPS39，1948年9月8日）是美国政府第一份详尽的全面阐述“脱身”政策的种种依据的政策文件。（38）它于当年10月13日正式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号文件（NSC34），印发各部门讨论。1949年2月4日，即北平解放的第三天，杜鲁门批准了落实NSC34的行动建议书（NSC34/1），把中国的重要性排在其他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地区之后，肯定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目标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39）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34/2文件（NSC34/2）指出今后美国在中国将和苏联变换角色，苏联影响会增强。它指出美国目前应该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与中国各种成分保持最广泛的联系；在谨慎避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政治、经济摩擦；等等。（40）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辩护的白皮书之出笼同凯南也有极大的关系。早在1948年11月26日，凯南在致国务卿的备忘录（PPS45）中，就建议政府向公众提供关于美中关系的背景材料，以消除公众对美国对华政策之混乱认识，说明中国政府之弊病，取得美国民众的信任。他认为国务院应当率先准备这样的材料。（41）但马歇尔当时认为这样做会损害蒋介石的威信，主张把这项工作推迟。（42）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乔治·凯南是白皮书（1949年8月发表）的始作俑者。另外，1949年美国也考虑过采取手段把台湾、澎湖列岛同中国大陆隔开等等，但主张以政治、经济手段，反对出兵占领。（43）

如上所述，1947—1949年间凯南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关系，尽管它不是影响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唯一因素（实际上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国局势的分析和政策主张是多种多样的）。（44）这实际上反映了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苏联通”参与对华政策的制订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特点我们不难理解，因为如前所述，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之核心是对苏战略，美国政府倾向于从对苏关系的角度对待与处理同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由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苏联因素在美国制订对华政策时显得尤其重要。正是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服务于对苏战略，凯南这位国务院头号“苏联通”的对华认识与政策主张就更易于为美国决策人所考虑和接受。

凯南1947至1949年间对中国局势及中共与苏联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已为事实所证明；凯南提出美国应尽早从中国“脱身”的主张也是很现实的、明智的。但是，凯南同美国政府大多数官员一样，由于对苏联及共产主义的敌视和避免美国在道义上受损害，尽管认识到蒋介石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却不敢提出美国立即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并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所以，他在1949年1月还谴责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受到承认的合法政府”。（45）另外，当1949年6月司徒雷登向国务院询问他能否接受黄华的邀请访问北平时，凯南的主要助手戴维斯给凯南写了一份备忘录，反对司徒雷登去北平，认为这只会为中共所利用并且引起国内强烈反应。凯南只是把这个备忘录转给副国务卿腊斯克，没有证据表明凯南支持司徒雷登去北平同中共领导人接触。（46）这就是说，凯南这位冷静、现实的政治家，在1947至1949年间的对华认识和对华政策主张也受到意识形态与道义因素之影响。同时，凯南是带着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以及对苏关系优先的观念来认识中国的，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无足轻重，因而忽视发展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他的这种思想至今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注释：

- (1) 参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第34—36页。
- (2) Memorandum by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PPS 39/1), Nov. 23, 1948, *FRUS, 1948*, VIII, p. 208.
- (3) George F. Kennan, "Moscow Embassy Telegram No. 511," Feb. 22, 1946, *FRUS, 1946*, VI, pp. 696-709;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pp. 566-582.
- (4) Kennan, "Comments on the General Trend of U. S. Foreign Policy," August, 1948, *Kennan Papers*, Box 23, 转引自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0.
- (5)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30-31.
- (6)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8，203，216，219页。
- (7) 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7), p. 237, 239.
- (8) John Paton Davies, Jr., *Dragon by the Tai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2), p. 184.
- (9) 同(7)。
- (10) Walter L.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3.
- (11) (12)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 197-198; pp. 198-203.
- (13) (14)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pp. 155-165; p. 52.
- (15) Memorandum by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The Problem to Review and Defin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PPS 39), Sept. 7, 1948, *FRUS, 1948*, VIII, pp. 146-155.
- (16) 同上以及 Memorandum by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U. S. Policy Toward China" (PPS 39/1), Nov. 23, 1948, *FRUS, 1948*, VIII, pp. 208-211.
- (17)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Kennan), Jan. 10, 1949, *FRUS, 1949*, VIII, pp. 26-27.
- (18) 参见 PPS 39 和 PPS 39 / 1。
- (19)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第161—16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
- (20) (21) (22) (23) *FRUS, 1946*, IX, pp. 116-119; 1948, VIII, p. 148; p. 208; p. 209.
- (24)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Kenna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PPS 53), July 6, 1949, *FRUS, 1949*, IX, pp. 356-359.
- (25) 同(24)及 Draft Memorandum Prepared in Policy Planning Staff: "A Possible Course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June 23, 1949, *FRUS, 1949*, IX, pp. 359-364.
- (26) *FRUS, 1949*, IX, pp. 361-362.

- (2 7) Kennan, *Memoirs 1950-196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2), p. 54.
- (2 8)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NSC 37), Dec. 1, 1948, *FRUS, 1949*, IX, pp. 261-262;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NSC37/3) Feb. 11, 1949, *ibid.*, pp. 284-286;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Johnson)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ouers), April 2, 1949, *ibid.*, pp. 307-308.
- (2 9) 同 (2 7)。
- (3 0)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p. 294-295.
- (3 1)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 345;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nconoclast*, p. 51.
- (3 2) (3 3) (3 4) *FRUS, 1949*, IX, pp. 50-52; 1947, VII, pp. 899-900; 1949, IX, pp. 160-162.
- (3 5) *FRUS, 1947*, VII, pp. 899-900; *FRUS, 1948*, VIII, p. 312, p. 461, p. 659, p. 662; *FRUS, 1949*, VIII, pp. 29-30.
- (3 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3 1 3 页。
- (3 7) 详见约翰·加迪斯的文章:《美国的政策与看法: 1 9 4 9 — 1 9 5 0 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 载于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 2 4 7 — 2 8 6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3 8)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1 9 4 5 — 1 9 5 0)》第 1 9 3 页。
- (3 9) (4 0) *FRUS, 1949*, IX, pp. 474-475; pp. 492-494.
- (4 1) (4 2)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U. S. Policy Toward China in the Ligh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PPS 45) *FRUS, 1949*, VIII, pp. 214-215; p. 215 note.
- (4 3) 参见:《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 2 8 9 — 2 9 1 页以及 *FRUS, 1949*, IX, p. 356 的注释。
- (4 4) 参见: Ernest R. Ma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49* (N. Y. J. B. Company 1975)。
- (4 5)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Kennan), *FRUS, 1949*, VIII, pp. 26-27.
- (4 6) Memorandum by Mr. John P. Davie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to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Kennan), June 30, 1949, *FRUS, 1949*, VIII, pp. 768-769.

《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

刘绪贻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系

一、布什的外交政策思想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是英格兰移民后裔，出生于一个信仰新教的共和党人家庭。弗雷德里克·西格尔说，新教共和党人重视美国建国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梦想，即认为美国社会应是一种“未受官僚主义污染的、自治的个人组成的大体无政府的社会”（1），美国是“上帝的选国，是一块没有沾染旧世界罪恶的圣土，是一座照耀所有国家的正义灯塔。”（2）在国内，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因而也反对罗斯福“新政”；在国外，他们反对卷入国外特别是欧洲事务。二次世界大战前，围绕干预国外事务问题，共和党人分为两派。战后，他们一方演化为老牌孤立主义者，反对美国对国外主要是西欧承担义务；另一方支持北大西洋公约同盟，认为美国应承担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必须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布什是属于后者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他在国内政策上反对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但赞成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在自传《注视未来》中说，我的政治哲学“在海外，它表现为履行我们对于朋友和盟国所承担的义务，实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以维护美国的利益。”（3）1981—1988年任副总统期间，根据罗纳德·里根总统说法，布什和他在外交政策上遵循的原则是：“维护人类的自由，主张全面实现对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的自由权利。为了维护自由，使之展现在全世界千百万渴望自由的人们面前，我们绝不逃避我们的责任。

“我们相信，要实现和平，只能靠实力……。”（4）

1988年4月15日，布什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的演说中指出：“任何一个美国的首要责任，是维护美国的安全和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保持美国强大并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我们就不仅能在拉美、亚洲、非洲和全世界成为别人的榜样和启示，还能成为促进改革与自由的力量”；“自由与民主的进程正在全世界发展，集权主义在退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鼓励这种趋势。”（5）同年11月9日，布什在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的两项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和维护世界和平。

布什以上的这些言论，如果按我们的理解加以阐释就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全世界最优越的经济、政治制度，美国应不断增强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以保护这种制度；同时，还要鼓励全世界人民争取摆脱其他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学习和实行美国的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只要是赞成美国的这种全球战略的，就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国，美国就应对它们承担义务。

布什的这种外交政策思想，在他就任总统后数月的一次美洲国家理事会上的演说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新的伙伴关系首先要扎根于实行民主政治，提倡广泛民主和民选政府，反对极右和极左的破坏自由的敌人。其次，这种伙伴关系的目的，是保证市场经济生存、发

展和昌盛。”〔6〕

二、里根政府全球战略

里根政府时期的世界仍然是两极的世界,因此,里根政府的全球战略,必定仍然是以“与苏争霸”为中心内容。大体上说,可分为两个阶段。里根初上台时,为了恢复越战和伊朗危机前美国享有的领导地位,他积极重建日益相对削弱的美国经济、军事实力,俾能以实力遏制苏联扩张,从苏联手中夺回世界霸权。里根的这种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到1986年,美国已将70年代苏攻美守的局面,逐渐转变为双方互有攻守以至美攻多于守苏守多于攻的局面。这个阶段的美苏关系是一种冷战关系。不过,到80年代中期,疯狂的军备竞赛已使美、苏两国困难重重,难以为继。于是,为改变自己“好战之鹰”的形象,以便在1984年大选中捞更多的选票,调整与不愿和苏联对抗的西欧盟国的关系,从1984年初起,里根就对苏联展开一场微笑外交,表示要与苏联举行“认真和建设性对话”。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提出外交新思维,认为要“改变当前世界局势,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暴力和仇恨、恐惧和猜疑的世界”。而且,由于“美国和苏联集中了大量的武器,其中包括核武器,这就使我们两国对全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7〕这样,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中断6年之久的美、苏首脑会谈,终于在1985年11月19日至21日在日内瓦举行。这种势头继续着,到1987年,“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总的来说都已认识到它们的经济能力所受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已开始影响它们的军事政策。”〔8〕是年12月8日,两国首脑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程导弹条约。虽然中程导弹在双方核武器库中只占3—4%,但是,美、苏军控谈判由以往只涉及限制军备进一步发展,转为彻底销毁中程和中短程陆基导弹和巡航导弹,总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转变。而且,这次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称: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并决定加速进行销毁50%战略核武器的谈判;美、苏分歧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双方不谋求军事优势,并防止发生任何战争;双方同意加紧对话并进行建设性合作。双方这种公开承担的义务,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1987年是美国战后一次调整对外政策战略的一年,〔9〕美苏关系由冷战阶段转入了以对话与缓和为主的阶段。

1988年是美苏继续对话的一年。5月29日至6月2日,两国首脑又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双方交换了关于中导条约的批准书,签署了两个次要的监督军控的协议,缔结了7项关于文化交流等协定,还就地区冲突和人权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有的美国评论说,“目前的趋势正在破坏美苏两国战后40年交恶的基础。这种趋势若继续下去,可能会带来冷战的终结,而对两国及其各自的全球性联盟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强有力的影响。”〔10〕

三、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逐渐形成和发展

(1)“超越遏制”新战略的提出。以上就是1989年1月上台的乔治·布什政府面临的世界局势。美国《外交》季刊1988—1989年冬季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新总统布什今后4年任期中的任务是,必须设法确定美国在一个与以前迥异的世界中的地位。经过数月全面审议对苏政策之后,虽然审议报告主持人、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伯特·盖茨对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仍持怀疑态度,主张对苏谨慎,不能放松遏制,但这种态度已不能成为主流、成为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础。4月14日,布什密友、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华盛顿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的演说中,试探性地提出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贝克说,“现在……我们国境以外的世界已成为一个比较令人放心的地方。苏联军队已撤出阿富汗。苏联的干预行动所触发的其他地区性冲突,也……逐渐趋于解决。民主制度又一次在向前进。我们又重新肯定了我们的价值观。”接着,他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原则:维护

美国领导的必要性；了解世界运作的方式，而且运用这种了解，以美国的价值观为指导来改造世界；两党合作。然后，贝克提出了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领导世界的工作程序：首先是加强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系；其次是引导中美洲“走向民主与经济进步”；再次是缓和与中东紧张局势，促进阿、以对话；第四是促进东方国家转变，改善东西方关系；最后是加强美国与盟国的合作关系。（11）5月12日，布什在得克萨斯大学发表演说，虽然仍认为不能忘记苏联的军事实力，美国仍应保持强大，但也认为现在已到了跨越“遏制政策”、走向90年代新政策的时候。29日，他还采取实际行动。在苏联一再采取主动（包括裁军50万）、西欧盟国要求裁军呼声日益高涨的压力下，他在布鲁塞尔北约首脑会议上提出4项裁军建议，调整了美国原来的顽固立场，既满足了西德要求美、苏尽早举行短导谈判的愿望，又同意将军队人员和作战飞机纳入裁军范围，使东西方裁军立场进一步接近，增强了关于常规军备谈判达成协议的希望。6月2日，布什又向《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现在苏联可能在一种“根本变化状态中”，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应再将遏制苏联作为它们的基本原则；随着苏联的变化，我们自己的作用也将发生变化，从把重点放在威慑力量上转向把重点放在经济上。

布什政府的这种“超越遏制”的新战略，其基本构想是：美国在保持军事实力以防止苏联扩张的同时，抓住苏联从事改革的有利时机，扩大与苏联的联系与合作，运用美国当时优势，采取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手段，特别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促使苏联逐步向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最后将苏联融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其具体内容是：在外交政策上，要求苏联尊重东欧地区国家自决权，明确地抛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支持东欧改革，以便实现布什提出的建立一个“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在军事上，要求苏联将军事力量削减到对西方无威胁的程度，真正实现“防御战略”的水平，以便美、苏双方保持尽可能低水平上的军事力量均势；在地区争端上，要求苏联继续作出妥协和让步，与美国共同努力解决遍布全球的危险地区性冲突、特别是中美洲、中东等“热点”问题；在政治上，要求苏联向美国“核心价值观”如民主、自决、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等靠拢，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在经济上，要求苏联在美国的帮助下向市场经济过渡。

（2）积极推行“超越遏制”新战略。布什政府的这种“超越遏制”的新战略是有收获的。1989年9月下旬，贝克国务卿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美国会晤，苏联作出了重大让步，放弃以往长期坚持的立场，同意战略核武器与“星球大战”计划脱钩，海基巡航导弹与战略武器分开处理，并承诺单方面拆除有争议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型雷达站。因此，双方在战略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等军控谈判中取得很大进展，还同意就政治解决地区冲突和改善双边关系问题进一步磋商。与此同时，在苏联的放任甚至影响下，以匈牙利、波兰为首的东欧诸国局势日益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因此，美对苏看法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布什总统……迅速打消了对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怀疑，得出了苏联的改革符合美国的利益和现在应采取一定步骤以确保其改革成功的结论。布什及其对外政策高级助手现在强调：有必要利用莫斯科明显希望减少与西方对抗和愿意让东方盟国进行民主和自由市场实验的心情。”（12）为此，布什打破原定在1990年春末夏初与戈尔巴乔夫会晤的计划，于12月初前往马尔他举行美苏首脑非正式会谈。会谈第一天，布什就提出16项改善苏美关系的建议，特别是给予苏联关税最惠国待遇的承诺，使戈尔巴乔夫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苏联美加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德罗维奇评论道：“马尔他会议根本上改变了布什政府对苏联的立场，从消极观望变为推动、促成早日成功。……白宫认识到应关心苏联的改革，因为它关系到美国的利益。”（13）

1990年更是布什政府积极推行“超越遏制”新战略的一年，也是世界局势发生剧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布什和戈尔巴乔夫5月底6月初在华盛顿、9月初在赫尔辛基、11月中旬在巴黎进行了3次会晤。8月初海湾危机爆发，美苏外长立即进行紧急磋商，谴责伊

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11月中旬,美苏两国都参加签署了东西方第一个削减欧洲常规武器的条约,和包括欧洲和北美34个国家在内的《巴黎新欧洲宪章》。虽然仍不免有矛盾,但双方都公开声称美苏关系是一种合作的伙伴关系。1990年11月19—21日,第2次34国欧安会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北约、华约发表“22国联合声明”: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不再是敌人,将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表示互相友好。战后源于雅尔塔体系的两极冷战格局结束了。

随着两极世界格局的结束,多极化趋势日益加强。日本、欧洲共同体特别是西德不独经济实力日益接近美国,而且它们经济发展速度还高于美国。在此基础上,它们日益要求发挥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的作用。与此同时,第三世界也发生变化。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形成一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危险局面,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则逐渐增长,有18个已拥有弹道导弹,其中有极少数国家还萌发谋求地区霸权的野心,成为不安定因素。

面对这种形势,布什政府又提出新的全球战略。

(3) 布什政府的又一新全球战略——世界新秩序。据美国报刊报道,布什是1990年9月11日就海湾危机对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时,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他说,“今天我们处于一个独特的非常时刻。尽管波斯湾的危机很严重,但也提供了一个朝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时期前进的少有机会。这种动荡时期过后,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第5个目标——世界新秩序,即一个新纪元,一个少受恐怖的威胁、在寻求公正中变得更强大、在寻求和平中变得更安全的新纪元,一个世界各国,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北方还是南方,都能繁荣富强与和谐生活的新纪元。”(14)此后,布什又在各种场合对他的世界新秩序进行解释和补充。10月1日,布什在对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中表示,“我们想建立起一种超越冷战的新的国家伙伴联盟,一种基于磋商、合作和集体行动……一种按照原则和法治统一起来的、并得到公平地分担责任和义务这一原则支持的伙伴关系,一种目的是为了加强民主、促进繁荣、增进和平和减少武器的伙伴关系。”这样一个新世界不仅是欧洲,而且是整个世界——“完整而自由的世界”。1991年1月29日,布什在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说,建立世界新秩序是将“不同国家吸引到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实现人类共同愿望: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又说,“在当今千变万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3月6日,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谈海湾战争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时,又提到世界新秩序。他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已在出现……在这个世界里,摆脱了冷战思想的联合国正在实现其创建人的有历史远见的理想。”4月13日,他在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大学生讲话中,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四原则:和平解决争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减少和控制武器;公正对待所有国家的人民。同时,他还指出,是美、苏合作加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8月13日,布什在向国会递交的《1991年国家的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90年代的基本利益与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盛行的世界。”他还在同时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强调:“《报告》是在历史上罕见的时刻提出的,我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我们的责任不仅是保护我们的人民和利益,而且还要帮助建立一个新世界,使我们的理想不但能生存,而且还能开花结果。这正是我们国家战略的根本所在。”

世界新秩序虽是在海湾危机后正式提出的,但如前所说,这种全球战略思想早就含蕴在布什的外交政策思想之中,含蕴在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战略之中。1989年下半年“超越遏制”战略初见成效时,布什在9月25日对联大的讲话中满怀希望地说,“一个新的自由世界的到来已为期不远了……现在存在着建立在共同利益与理想基础上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到1990年,东欧、苏联巨变,华约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日本、西德的迅速崛起虽使美国地位相对下降,但比起来它仍然处于有利地位;海湾事件又

使它在世界上的影响与声望上升。这样,布什政府才觉得这是它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大好时机,因而才提出这种新的全球战略。这种新战略是:在美国领导下,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发挥联合国应有的作用,同盟国建立“公平分担责任与义务”的伙伴关系,也同苏联合作,在全世界实现“和平与安全、自由和法治”,建立一个“完整而自由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与市场经济的世界。

为了建立这种世界新秩序,布什政府最为重视的是建立北美西欧泛大西洋共同体。1991年6月18日贝克在柏林阿斯彭学会讲话中指出,在东欧变色后,美国的目标首先是建立一个“完整而自由的欧洲”,然后将北美、西欧这个泛大西洋共同体延伸到中、东欧和苏联,建立一个从加拿大的温哥华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或如布什所说,建立一个“以构成我们共同价值观的共同原则为基础的新的自由联邦”。然后“我们的自由联邦必须向日本和亚洲、向拉丁美洲、向非洲进一步伸出援助之手”。〔15〕其次是在太平洋地区通过加强经济一体化、促进民主化和确立新的防务结构等方式,建立“稳定、繁荣的太平洋共同体”结构。1991年11月11日,贝克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演讲中,将美国介入太平洋地区结构比喻为一把打开的扇子,基轴在美国,向西辐射,骨干线是美日同盟,其他3条射线位于骨干线两侧,分别由美国与南朝鲜、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的联盟构成。而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亚太经济合作进程,是将骨干线和各条射线有机地联接起来的纤维组织。与美国以往亚太战略不同的是,“扇形结构理论”的关键是强调从经济上介入以领导亚太地区。

在美洲,布什政府在正式提出世界新秩序以前,1990年6月27日,布什就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宣布了“开创美洲事业倡议”,提出将同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伙伴关系。布什说,他的“美洲事业倡议”有三个支柱:一是实现自由公平的贸易,巩固自由市场发展趋势,最终实现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二是改善在拉美的投资条件;三是减轻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后,这一倡议自然就成为世界新秩序中美洲新秩序的内容。

从布什政府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这些具体计划看,没有提到非洲,即使提到“美洲事业倡议”,但首先还是着重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足见布什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是重视不够的。

1991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际形势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美国为实现其新的全球战略,建立世界新秩序,其所采取的措施是:调整同盟国的关系,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集体参与”机制,使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费用,以弥补美国国力的不足,并改善同盟国的关系;帮助独联体国家度过难关,以防止不利于美国的事变;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美国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在实现“美洲事业倡议”前加快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对付欧洲共同体和日本挑战;调整核武器和常规兵力部署,加强机动能力,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充分发挥联合国、北约、欧安会等国际组织的作用。〔16〕

四、布什政府新全球战略——世界新秩序的前景

布什政府虽然认为现在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大好时机,并认为有信心取得成功,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布什政府新的全球战略——建立世界新秩序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为指导,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利益为目标。然而,当今的世界是个多样化的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在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世界里,要把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经济模式强加于所有国家自然是不现实的。何况,美国的这种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全球战略主要是为了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利益,这就免不了要减少和损害别国的利益,当然这是行不通的。如果美国硬要这样做,就必然会引起国家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冲突,制造紧张的国际关系。这不独与布什

政府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之一——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相矛盾，也是美国的国力难以胜任的。海湾战争的胜利，没有日、德及阿拉伯国家经济支持，没有苏联合作，没有联合国的作用，是不可能的；海湾战争后美国无力解决中东问题，都是实例。

其次是美国盟国不再信服美国的领导，也不真正支持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日本首相海部早在1990年1月9日致布什的信中说，“必须以日美欧三级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同年10月23日，日本《经济新闻》毫不客气的指出：美国所谓“自由国家共同体”，说穿了就是借助盟国的经济实力谋求美国的世界霸权，所谓“领导地位”乃是美国霸权的另一种说法。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表示，世界新秩序不能把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强加于人，他积极主张建立“欧洲邦联”，发挥欧洲这一级的独立作用。1991年3月，法国外长迪马也表示，“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应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而不是由某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来主宰国际事务。”迪马还主张联合国安理会在确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德国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国的类似。1991年初，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接受日本“共同社”的独家采访时说：日、德两国对于保护资源、解决人口问题和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等问题方面，应起到“领导作用”。

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虽然一直保持着同美国传统的特殊关系，一般都支持美国立场，但也不完全赞成美国提出的世界新秩序。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曾指出：“谁也不能宣称一个国家可以决定一切，无论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还是大西洋统治下的和平，都是不现实的。”他还警告美国人“不要一时冲动按照在华盛顿、伦敦或其他欧洲国家首都预先构想的模式去建立海湾战后秩序。”1991年1月29日，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毫不含糊地指出：“布什总统想把他选择的秩序强加于世界，那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既然是帝国主义，当然在现世界不会有前途。

第三，美苏合作是布什提出世界新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再不能保证所有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合作；而且，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现在既有国家利益矛盾，又不断发生民族冲突，本身就是造成不稳定因素，对建立稳定与和平的世界也是不利的。

最后，如前所说，布什政府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计划很少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然而，在这样一个科技高度发达、交通信息日益灵通的世界里，贫富悬殊的现象是容易刺激人心的，贫穷与落后是难以被人长期容忍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决不会长期受布什政府世界新秩序的束缚。

注释：

(1) (2) 弗雷德里克·西格尔：《多难的旅程：从珍珠港事变到罗纳德·里根》，纽约：希尔与王公司，1984年，绪言，第Xi页；第5页。

(3) 乔治·布什：《注视未来》（中译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79—180页。

(4) 见罗纳德·里根1988年8月15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 以上引文，俱见“布什外交政策主要原则”，美国新闻总署：1988年总统候选人关于外交及其他国际问题的观点汇编。

(6) “布什阐述其美洲政策，主张建立新伙伴关系”，《人民日报》，1989年5月5日。

(7) 以上两段引文，见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第6页。

(8) 约瑟夫·哈施：“回顾1987年”，载1987年12月24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 (9) 参阅刘绪贻：“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四次战略调整”，《兰州学刊》，1990年第1期。
- (10) 唐·奥伯多弗：“没有先例的对话时代开始了”，《华盛顿邮报》，1988年5月29日。
- (11) 以上所引贝克这篇演说内容，见《美国政策资料》第6号，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1989年版。
- (12) 沃伦·斯特罗贝尔：“苏联人改变了布什政府官员的观点”，《华盛顿邮报》，1989年10月26日。
- (13) 亨里克·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战的结束，而不是历史的终结”，美国《华盛顿季刊》，1990年春季号。
- (14) 转引自潘同文：“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初探”，《国际问题研究》，1991年第4期。
- (15) 以上所引贝克讲演内容，俱见美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出版《外交政策背景资料》（1991年7月22日）：贝克在阿斯彭学会的讲话。
- (16) 张宝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趋向”，《人民日报》，1992年6月18日。

《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

——从特纳的“边疆假说”谈起

【注释】本文为作者所著《美国边疆史》一书的导论，现略经修改后发表。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注尾】

何顺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如果从“西进运动”入手，探索西部得以迅速开发的原因，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民愈自由，受农权制残余的压迫愈少，他们的土地整个说来就愈有保障，而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场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因为美国的西部边疆作为辽阔的处女地，在那里没有任何封建残余的压迫和束缚，移民们得以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开发和利用其土地，从而建立起一种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或曰：“西部开发模式”。

—

此处为何要从“西进运动”入手，而不是从别的例如特纳所说的“边疆”入手，来开始我们的探索工作呢？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边疆”(frontier)主要是一个地理(包括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概念；而“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作为一个大规

模的人口迁徙运动,既涉及到西部也涉及到东部、既涉及到地理也涉及到人文、既涉及到经济也涉及到政治,远远超出了地理的范围。因此,从“西进运动”入手,便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对西部进行透视,唯物地和辩证地考察“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地理决定论”泥潭。为此,这就要从特纳的“边疆假说”谈起,当然也就不能不提及特纳其人。

弗雷德里克·J·特纳(Frederick J. Turner, 1861-1932),生于美国威斯康星的波特奇(Portage)。该村庄位于福克斯河和威斯康星河之间,曾是古老的皮货贸易商道的必经之地。威斯康星的真正开发始于19世纪30年代,1840年时该领地也只有三万来人,到1860年恰好走过一个世代。事实上,连“威斯康星”(Wisconsin)这一名称的拼法,也是在1845年才由该领地立法机关加以统一的,在此之前它曾有过好几种拼法:Meskousing、Miskonsing、Quisconsin、Wisconsin,等等。(1)由此可知,特纳出世之时,这个地方只不过刚刚走出了“拓荒时代”,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时代。正如一位历史家所描述的,此时的波特奇“宛如一个边疆村庄,照管着一片拓荒者仍然与印第安人群杂居的地区”(2)。这种背景和环境,对特纳以后的学术生涯,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纳的大学生活,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度过的

。1887年,他在这所大学获硕士学位。之后,他转到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学位,受教于赫伯特·B·亚当斯。1890年,当他拿到博士学位后仍返回他的母校威斯康星大学,在那里从事边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直至1910年。其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1910-1924年),他应聘执教于哈佛。特纳的研究工作,不仅受到他的生活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他的历史观的支配。1891年,特纳在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历史的意义》中声称:“每个时代都要根据当时最主要的条件重新撰写过去的历史。”(3)

1893年他写出了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并于同年7月12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

在文章中,特纳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这一假说认为:“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4)在特纳一生之中,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不下47种,还不包括大量的书评和报刊文章,以及数以万计的信函,笔记和未发表的讲稿。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部:《新西部的兴起》(1906年)、《美国历史上的边疆》(1920年)、《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1932年)以及《1830-1850年的美国:这个国家及其地域》(1935年)(5)。尽管如此,所有这些著作和文章,其重要性都超过他的那篇著名论文,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章都是围绕着“边疆假说”展开的。正因为如此,查尔斯·A·比尔德认为,特纳提出“边疆假说”的那篇论文,“比关于这一题目所写过的任何其他文章或书都有更深远意义的影响”(6)。

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期间,特纳一直讲授有关《西部历史》的专题课,由此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弟子和再传弟子。这些人后来散布于美国各地,在许多大学和机构从事教学或研究,热心传播特纳关于“边疆假说”的观点。形成所谓“边疆学派”。这里,除了特纳本人而外,还有两位学者值得一提:一位是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 1887-1977年),他早年著有一本关于“天定命运”的书,晚年又写出了大部头的《西进运动史》(1978年发表),是特纳的助手和弟子;另一位是雷·A·毕林顿(Ray A. Billington, 1903-1972年),他先后著有《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1949年)、《远西部边疆:1830-1860年》等书,是默克的弟子(他的《向西部扩张》一书就是“献给F·默克”的),也就是特纳的再传弟子。这三位学者是一脉相承,但又各有千秋。

特纳以“边疆”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地域”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是与前者同时提出来的,但直到30年后才着手将其“地域”理论系统化。毕林顿对所有关于边疆史的

重大主题都极为重视,但在他的早期研究工作中似乎更强调“地域”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其名著《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的头几版既探讨了“区域主义的出现”问题、也研究了“地方主义的经济” (7)。而且,他在写作大主题的时候很注意照顾细节上的严谨,这使他的讨论和阐述显得更为深入精到,在风格上也与特纳的描述性笔法颇为不同。默克虽然是毕林顿的老师,但他的《西进运动史》的出版晚于毕林顿的《向西部扩张》差不多30年,因而有可能并吸收战后美国学者有关边疆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其书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并给予制度史以应有的重视。

二

从美国史学发展的角度看,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需要有很大的“反潮流”的勇气,因为当时在美国史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制度史学派”。这个学派以所谓欧洲“生源论”(germ tleery)来解释美国制度和文化的起源,以为美国早期的历史只不过是这种“生源”在美洲环境中的发展而已,而对美国史中的美洲因素和特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与之相反,特纳却认为,“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并郑重地提出了“把边疆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一个领域来认真研究”的任务。他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就是为实现这一任务而作出的重大努力。

特纳的“边疆假说”,在一些学者中间一直争论不休,常常被指责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当然是不无根据的,美国的民主“来自美国的森林”(8),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实际上特纳并不完全否认美国制度和文化中的欧洲根源,因为他说过“边疆”的不断地向西推进,只有“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9),而不是根本否认这种影响。他认为,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们“过分注意”了寻找日耳曼根源的问题,而对美国本身的因素注意得“十分不够”。他说,虽然欧洲生活方式已经“打进这个大陆”,但美国也“改变和发展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反过来给欧洲以影响。(10)与此同时,特纳也不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完全是由西部产生的,因为他在提出“边疆假说”时就给自己的论点加了两个很重要的限定词:一是“直到现在为止”(up to our own day),即在时间上是指1893年以前的美国史;二是说“在很大程度上”(in a large degree),而不包括全部的美国史(11),从而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如果仔细读一下他的有关论述,特别是他的那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就不难发现他也曾企图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至少在主观上是如此。例如,在谈及“各类不同的边疆及其推进的方式”对东部和旧世界的影响时,他列举了如下几点他认为“比较重大”的影响:(1)“促进了美国人民的一种混合民族性的形成”;(2)“减少了我们对英国的依赖”;(3)“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4)“从边疆生活的条件中出现了极其重要的思想”(12)。特纳在这里先后使用了“促进了”和“减少了”两词,显然都是为了避免把这些影响绝对化,特纳的“边疆假说”中的这种矛盾现象,反映了这一“假说”的不成熟性。

应该说,不管对特纳的“边疆假说”的看法如何分歧,但在这个假说中却包含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这就是西部的拓殖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关于这一主题,特纳曾用“西部问题只不过是美国发展的问题”(13)一语给予高度概括。并在提出“边疆假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就及时予以点明,开宗明义地提出这一假说就是为了“说明美国的发展”(14)。

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一主题都是可以成立的:首先,从时间的延续上看,移民向西部的推进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这个时期从18世纪末开始到19世纪末为止,正是美国历史上的所谓“成年时期”,是美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世纪的美国史大半都是在“西进”的影响下度过的;第二,从空间的扩张上看,向西部

的推进涉及到从阿利根尼山脉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地域，其面积相当于美国最初 13 州的 7.5 倍；即使以密西西比河为界计，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全部领土，也超过了 1783 年建国时美国领土的 2.6 倍。美国人在这样广阔的领土上展开的历史性活动，对任何一个对美国史感兴趣的人来说，当然是绝对不应当被忽视的；第三，从行政区划上看，在美国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先后创建了 31 个新州（不包括佛罗里达），如果加上佛罗里达则是 32 个新州。由于在原 13 州的版图内后来又分化出 3 个新州（缅因、佛蒙特和西弗吉尼亚），西部新建的州数正好等于东部州数的两倍。因此，可以说，不了解这些新州的形成的过程，就不能了解今日美国及其发展的历史；第四，从经济发展上来看，由于移民以其罕见的规模和速度在西部展开的开发活动，迅速地带动了与之相关的各行各业的发展，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由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并最终实现工业化的强大动力。甚至在美国政府宣布“边疆”结束之后多少年内，这种作用在美国历史的发展中仍然依稀可见。在上述诸端之中，最基本的当然还是那个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领土的扩张可看作是这个运动在地理方面的结果，新州的组建则可看作是这个运动在社会方面的结果，而经济上的发展便是它们的综合体现。总之，西部的拓殖在美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我想它也是“边疆问题”在美国史研究中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尽管特纳“边疆学派”衰落了，确定这一主题应是特纳假说中合理的内核。

关于这一主题，在特纳之前或同时代的不少人，如德国的黑格尔和英国的亚当·斯密，意大利的 A. 罗利亚和法国的 A. 托克维尔，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涉及过，但他们的议论常常是从非科学的立场出发的。例如，A. 罗利亚就认为，美国从东部到西部的历史，每一页都能找到社会进化的记载，进而断言：“欧洲枉费了好几个世纪的功夫去寻找一把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原来这把钥匙在美国，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光辉地揭示了世界史的进程。”（15）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仅不只一次地在他们的著作、文章和书信中提及美国的西部及其“自由土地”问题，而且科学地揭示了西部的拓殖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一主题。在 1878 年 11 月 25 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在谈到当时令“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美国时，恩格斯首先写到：“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化，在这里只有几年就发生了。”接下来他就向学者们提出：“但是研究者的注意力不应当放在比较老的、大西洋沿岸的各州上，而应当放在比较新的（俄亥俄是最显著的例子）和最新的（例如加利福尼亚）各州上。”（16）这就不仅提出了美国经济和历史发展的速度问题，也提出了西部的拓殖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特纳在“边疆假说”中所提出的主题，并不是毫无根据，毫无意义的，其结论应该是相反。

不过，特纳所提出的这一主题还有另一层意义。从近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特点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中都有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般来说是与由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联系在一起。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历史现象，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从商业资本主义逐步成长起来的，而商业资本主义一般来说又首先兴起于沿海及河口地带。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又主要有两个：第一，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在此之前的一切时代，社会的分工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的，因此民族之间的分工往往比国内的分工更为发达，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在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第二，由于“水道开拓了比陆路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都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海沿河口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17）

所有这些情况和趋势，我们都可以从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历史中找到，美国只不过是又一个更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特纳所提出的主题，从世界史研究的角度看，也是值得重视的。

三

在“边疆假说”中，特纳虽然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但却未能找到一种正确回答这一问题的方法，以致他提出的主题最终被他的方法所扭曲和掩盖，这是因为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地理决定论”的泥潭，尽管他一再否认自己是一个“极端环境论者”，声称“决定的因素不是一个”。〔18〕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特纳究竟是怎样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潭的呢？这就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他提出的基本范畴。为了“说明美国的发展”，特纳给自己提出了两个范畴：一个是所谓“边疆”(frontier)概念，另一个就是所谓“地域”(section)概念，并把它们看成是“美国历史中两个最基本因素”。特纳正是在使用这两个范畴来说明美国的发展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潭的〔19〕。

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使用“边疆”这一概念，而在于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关于“边疆”这一概念，在1890年的美国人口调查报告中，被定义为每平方英里两人或两人以上六人以下这样一个人口密度的定居地。很明显，“边疆”在这里是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概念，而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地理学的概念，更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学的概念。然而，特纳却认为在使用“边疆”这一概念之前“并不需要明确的界定”，这就为他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混乱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特纳在论证“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时，有时把它看作小于“西部”的区域，也就是把“边疆”当作一个自然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有时又把它划分为“农业边疆”、“商业边疆”或“矿业边疆”，也就是把“边疆”当作一个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有时还把它称作是“野蛮与文明的交汇处”，也就是把“边疆”当作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当他把“边疆”当作一个自然地理或经济地理概念来使用，并企图用它来解释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时，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潭。

与“边疆”这一概念不一样，特纳没有赋予他的“地域”概念以多方面的含义，便径直用它来解释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现象。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美国人向西移殖的原因，便把它看作是人们为了“摆脱一些已经确立的阶级的统治”，而西部也就仅仅被看作是“一个避难所”；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美国的两党制及其矛盾，则宣称：“无论是党派代表大会，还是国会审议的结果都酷似地域间的条约”，并预言“地域利益的冲突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定居而更加剧烈”；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联邦与州权之间的矛盾，便以为这种矛盾也是“由规模各不相同的地域而产生的”，因为美国就好比是一个与欧洲差不多的“一些潜在的国家联邦”；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美国的“内战”史，便认定美国“内战只不过是地域的最激烈的、最悲剧性的表现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北两个竞争的社会一道向西部未被占用的土地推进这一实际情况决定的。最后，他声称：“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欧洲国家的模糊形象。”〔20〕换言之，一部美国史乃是各地域斗争的历史。

从形式上看，在特纳的“边疆假说”中，“边疆”和“地域”是用来解释美国发展的不同范畴，但在二者之间实际上却贯串着一种“地理决定论”的哲学。这种哲学可以在他为我们提供的如下的逻辑中看到：第一，他认为，“边疆”和“地域”是美国历史中“两个最基本的因素”；第二，他认为，边疆与地域密不可分，“边疆是活动的地域”；第三，他认为，各地域的特点“在奠定地理基础的时代就部分地确定了”。〔21〕在这里，关键在于“边疆是活动的地域”这一公式，通过这个公式他把美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与地域直接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特纳曾极力否认自己是一个“极端环境论者”，但他在“地理决定论”的泥潭里陷得是那样深，以致他的一只脚还没从“地理决定论”的泥潭里拔出来，另一只脚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踏进了另一个泥潭。这是因为，他的否认或辩解，并不是从辩证唯

物论出发,而是从形而上学的多元论出发的。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的上下文就清楚了。他说:“决定的因素不是一个。人们不是完全受气候、地理、土壤或经济利益的支配。他们出生的血统的影响,遗传下来的理想以及精神因素,往往胜于物质利益。还有个性的影响。”〔22〕在他看来,气候、地理、经济和精神,这些因素在历史上本是并列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它们并不具有本源与从属的关系。所以当他在否认自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时候,恰恰又露出了自己“多元论”的破绽,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四

特纳的悲剧说明,为了正确地说明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必须从根本上抛弃特纳所提供的方法论而采用科学的方法论,这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我们在研究美国边疆史时,之所以要从“西进运动”入手,就是因为它便于我们借助这种科学的方法论。

我们从“西进运动”入手,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可以从多角度进行透视的综合体,还在于它涉及到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根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当美国劳动力的分布随着“西进运动”的兴起和扩大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意味着生产和经济的新发展,所以伴随着“西进运动”而来的,必然是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运动。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西进运动和边疆历史上的意义。当然还需要补充和说明。

因此,“边疆”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或经济地理概念,而且同时也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它将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讨论有关的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移民活动的空间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东部和西部、政治和经济,以及各种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全面阐述边疆和西部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我们之所以依然采用“边疆”这一概念,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人口调查局关于“边疆”的官方定义本身已属历史,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人向西推进和拓殖的过程,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我们所研究的范围,虽然对不同的地域而言其历史的进程也有所不同,但对西部的大部分地方来说都还未摆脱“拓荒时代”的痕迹,或者只是刚刚走出“拓荒时代”,即大体属于“边疆史”的范围。这时的西部边境,主要还是作为一个已经或正在开发的农业区,而与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相对立而存在的。

然而,把“边疆”和“西部”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来加以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又能不受到限制。因为,当交通运输尚不发达或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特别是在铁路网还未建立起来之前,人们的各种经济活动和交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地理条件的制约,而“西部”和“边疆”也就有了较大的独特性和个性,区域关系也就有了较大的历史意义。而当交通运输业已经相当发达,特别在全国性的铁路网建立起来后,随着统一市场在美国的最后形成,以往不平衡的区域关系便被打破了,过去那种具有独特性的区域问题也便开始失去它的历史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再把西部或边疆作为一个典型的地域来研究,就失去了历史的依据,这一点决定了本书的研究范围的有限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后的区域问题不再存在了,但那是新条件下的区域问题,其含义是不同的。

注释:

(1) R. 科伦特:《威斯康星州史》(R. Current, Wisconsin: *A Bicentennial History*), 纽约 1977 年版,第 5 页。

(2) (3) (6) (15) (18) (22)

杨生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2页；第234页；第225页；第13页；第181页；第181页。

(4) F. 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F.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20年版，第1页。

(5) 该书是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

(7) 参见 R. 毕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R. Billington, *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纽约1960年版。本书的第四版和第五版有较大修改，第一版出版于1949年，第二版出版于1960年，第三版出版于1967年，第四版出版于1974年，最后一版出版于1982年。

(8) (9) (10) (11) (12) (13) (14) F. 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293页，第5页，第4页，第1页，第22—26页，第205页，第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3—334页。

(17)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页。

(19) 关于特纳的“边疆学说”和“地域理论”，丁则民教授有准确而详细的分析，见丁则民：《美国“自由土地”与特纳的边疆学说》、《吉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8年，第3期，第13—24页。《特纳的“地域理论”评介》，《吉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9年，第53—64页；《“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政策》，《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

(20) F. 特纳：《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F.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Section in American History*)，马萨诸塞1959年版，第51页。

(21) F. 特纳：《地域在美国历史的意义》，第183、316页。

《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酒店——十七世纪马里兰社会的中心

李小雄

作者单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马里兰是最老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之一。从其1634年创立到17世纪末的初创时期。早期移民经历了一个从欧洲旧世界向北美新世界的转变、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从一个复杂、成熟的社会来到一个陌生而简单的社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诸多问题，旧有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生活方式，以及其他方面都不得不加以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酒店起到了特殊作用。早期马里兰的社会、经济、地理状况以及移民模式使得酒店成为当时无法取代的社会中心。酒店的特点和作用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状况。

在第一批移民到达马里兰不久,酒店便出现在该地区。虽然第一家酒店何时建立已无据可考,但至少在一六四一年,马里兰行政当局已开始颁发酒店执照,(1)当时马里兰仅有约七〇〇人。(2)酒店的出现和成长是与该殖民地自身的出现和成长同步进行的。

根据当时的各种记录,包括日记、书信和官方文件等,早期马里兰移民与酒关系密切。饮酒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行(3)。除了有英国人的饮酒传统外,马里兰的现实状况也对这些移民的饮酒习惯有很大影响(4)。首先,早期移民面对茫茫荒野,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需要用酒来恢复体力,刺激工作;其二,早期移民以年轻男性为主,社会男女性比例极不平衡,正常家庭生活无法建立。同时移民分布于零散、隔离的庄园,缺乏娱乐活动,生活十分单调、孤独。再加上早期该地区很高的死亡率和不稳定的前景,移民也需要用酒来充实、调剂生活和逃避现实;第三,当时没有别的饮料可代替酒。咖啡、茶、可可几乎没有,牛奶难以保存并不易得到,当地水源被认为不干净,同时人们也认为水没有营养,用水款待客人更不礼貌。所有这些使得酒成为17世纪马里兰移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为来往客商提供食宿、酒和其他服务是酒店的基本功能之一。这在早期马里兰尤其重要。在经历了一天长途跋涉之后,客商们迫切需要安顿之处。除了好客的居民不时提供食宿外,酒店是唯一可提供食宿之处,它的服务满足了过往行人的需要。

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酒店也提供了一个娱乐和交流的地方,而这在当时是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法提供的。与今天存在各种各样娱乐活动和娱乐场所不同,早期马里兰不存在这类场所。缺乏娱乐生活和渴望摆脱枯燥、孤独的生活使当地居民汇集酒馆。在这里,他们可开怀畅饮,玩各种游戏,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在公共活动日,他们更时常集聚酒店,结交新朋友,加强老朋友之间的友情和联系。

早期马里兰酒店同时又是公共活动和政治中心,这也是它与其他酒店的不同之处。早期马里兰酒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与权力当局关系密切。根据17世纪马里兰法院和议会档案,绝大多数酒店位于或靠近各级法院和主要行政机构。说得更准确一点,这些法院和行政机构通常都设在酒馆里,在很多情况下,17世纪马里兰酒店和法院由同一人照管和维修,他常常也是酒店和法院的修造者和所有者。(5)

酒店通常是省和县的会议及活动中心。根据当时档案记载,各种各样的会议常在酒店举行,包括殖民地议会会议,各种行政会议,各级法院审判,陪审团会议,等等。(6)各种问题在这里提出和讨论,最后形成决议。可以说,酒店真正是省和县的政治活动、司法机构和行政事务中心。

从早期马里兰殖民地的行政开销记录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酒店与殖民地当局的紧密关系。早期殖民地当局开销的很大比例是用于支付酒店的花费,包括议员及各种行政官员的食宿费用和他们从酒店所得到的各种服务。例如,根据1675年马里兰省议会的一个法案,该年大约50%的行政开销用于支付酒店开支。(7)根据1676年省议员的一个法案,该年马里兰行政开销的55%支付给了14位酒店店主。(8)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早期马里兰殖民当局的大量活动是在酒店中进行的。

除了官方会议,其他活动也常常在酒店举行。如地方选举活动。每逢选举日,选民们从各地来到预先指定的酒店参加选举。当局指定酒店作为选举点不仅因为酒店常常位于该地区的中心,便于选民参加选举,也因为酒店可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如人们所喜爱的各种酒类和食宿,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活动。

早期酒店通常位于交通要道。因为早期马里兰移民主要是沿切萨皮克(Chesapeake)海湾及其主要支流四散垦殖,水路成为其主要交通通道,主要渡口因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酒店通常建在这些地方以满足当地居民和来往客商的需要。殖民地当局不仅要求店主为这些人提供充足的食宿服务,也要求店主承担起渡口管理人的责任并提供渡船。既是酒店店主又是

渡口管理人在17世纪马里兰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9)当局制定各种措施鼓励店主承担这一责任。在有的地方,当局以免除酒店执照费来鼓励店主承担渡口管理责任。(10)

在马里兰地区,移民居住分散,在该殖民地建立44年以后,殖民地业主巴尔地摩爵士于1678年在给伦敦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马里兰地区“30英里内没有50户人家”。其首府圣玛利城(St. Mary City)“不足30户人家,且彼此之间相隔很远。”(11)这种情况导致马里兰殖民地的酒店少于新英格兰地区。但马里兰酒店数量较少并不表明它们在早期马里兰社会中不具有重要地位,恰恰相反,正是这种移民模式所导致的缺少人口中心使得酒店在马里兰起着更为重要的社会作用。

作为重要的活动中心,酒店为各种经济活动提供了场所。在早期马里兰,对商人来说,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酒店更适合、更方便来作为交易场所。其地点适中,气氛自由,又可提供食宿和其他服务,且可融生意与娱乐为一体。难怪许多商人都把酒店作为理想的交易地点,不少生意都是在酒店里谈判,讨价还价和拍板成交。同时不少酒店老板本人就是商人,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利用其酒店作为交易场所。有些酒店还提供各种日用杂货。他们出售盐、糖等其他日用杂品。有时酒店也被用于货物转运点或仓库。这些例子从当时的档案记录中时常可查到。(12)它表明酒店在经济交流中也起到一定作用。

酒店同时又是早期马里兰地方消息传播中心。酒店与殖民地当局的紧密联系,与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接触以及过往行人所带来的各种新闻和小道消息,使得它成为当时一般人民的消息来源中心。在那时缺乏大众媒介、也无报纸的情况下,消息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人员之间的接触交流而完成的,而酒店是早期马里兰殖民地人员交流最频繁的地方。各类消息从外部通过酒店在移民中传播。对许多相对与世隔绝的移民来说,酒店不仅是他们了解对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也是他们看自己社区的一面镜子。

早期马里兰酒店也为当地居民和官方提供邮政服务。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马里兰不存在正式的邮政服务。在这一方面,酒店起了重要作用。当商船从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来到马里兰时,他们常常将新邮件放在某个酒店,当邮件主人或认识的人来到酒店时,便会将邮件取走。同样,当地居民也时常将邮件留在酒店,由店主将邮件交给商船带走。这样酒店便承担了邮局的基本功能:接收和传递邮件的作用。从17世纪末起,当殖民当局开始正式建立邮政系统时,他们也常常指定酒店作为邮政点。例如,1695年有关方面建立了一条从费城到马里兰的邮线,在这个邮线上的几个邮点中,至少有两个邮点是酒店。(13)

在早期马里兰档案材料中,酒店常常与监狱一并提到。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位于同一房子并由同一人建造和管理。在监狱尚未建立起来的地方,酒店常常被用作临时监狱。早期马里兰法院记录中多次提到,犯人在受审之前,常常关在酒店,直到押往别处或受审。(14)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早期马里兰殖民地各县。

早期马里兰酒店有时也具有医院和救济所的功能。殖民当局常常要求酒店承担起照顾病人和不能自立者的责任。在早期法院的案例记录中,不少酒店店主向法院起诉,指控一些病人拒绝支付他们因病住在酒店期间的医疗花销和其他日用开支。(15)有时法院甚至指令店主向穷人或残疾人提供临时食宿并答应由当局支付这笔费用。(16)这一情况也反映出当时马里兰的社会现实。当时马里兰殖民地刚刚建立,缺乏医院、社会救济机构等设施。除了好客的种植园主和当地居民不时向这些处于困境的人提供帮助外,酒店是唯一能提供这种服务的少数公共设施之一。

从上面所提到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早期马里兰酒店位于当时社会的中心。它不仅提供了酒和食宿等服务,它同时也是商业、司法、立法、行政和娱乐活动的中心,具有邮局、医院等功能。通过提供这些服务,酒店把分散和相对隔绝的种植园及早期移民联系在一起。

在新英格兰地区,教会组织完善,并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但在马里兰地区,没有任何

一个机构像酒店那样具有如此众多的功能和广泛的社会联系。甚至教会的影响和作用也没有酒店那样广泛。由于早期马里兰的移民模式，目的及组织形式都与新英格兰地区不同，教会的作用远不如新英格兰清教教会的影响大。加之社会简单，生活条件艰苦，直到17世纪末，英国国教在马里兰殖民地影响不大，教堂和教士很少，有组织的教会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未起到重大作用。同时因为早期马里兰殖民当局奉行宗教宽容政策，马里兰是一个多种教派并存的社会。每个教派的影响有限。而酒店情况则不同，它为各类人提供服务，各种会议及社会活动都可以在酒店举行，任何自由人都可以随意光顾酒店。

二

早期马里兰酒店与当时英国酒店相比有其自身特点。在17世纪的英国，因为社会复杂，等级划分明显，不同的酒店应运而生，向不同的阶层提供不同的服务。与之相适应，政府也颁发了不同的规章和要求来管理这些不同档次的酒店。大体说来，英国当时的酒店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Inn，其数量很少，价格昂贵，大多位于城市中心，向绅士和富人提供豪华服务。第二类为Tavern，主要为中层以上人士服务。第三类为Alehouse，其数量众多，遍布大街小巷，为广大下层人民提供简单和基本的服务，其设备简单，所能提供的酒类单一。

(17) 17世纪马里兰酒店不存在等级之分。除了被称为Ordinary外，人们也称酒店为Inn, Tavern, Public House, Entertainment House等，虽然这些名称在英国是指不同的酒店并具有不同的含义，在马里兰它们被用于称呼同一酒店。考虑到绝大部分17世纪马里兰殖民地居民是熟悉英国情况的移民，这种不加区别的使用这些名称显然不是疏忽。这是与马里兰殖民地当时的社会现状和物质环境紧密相关的。首先，早期马里兰殖民地艰苦的物质条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限制了酒店的规模 and 标准，从而使得马里兰不可能出现英国酒店那样的等级划分。直到17世纪末，除了殖民地首府酒店条件稍好一点外，酒店的规模很小，设备也十分简陋，通常只有两三间小屋和一些最基本的用具。这种简陋的条件加上整个17世纪当地普遍低下的生活水平，使早期马里兰不存在给酒店划分等级的物质条件，虽然此时马里兰酒店也存在一些差别，但这种差别不至于大得可以将酒店划成几种等级。所有这些都表明，马里兰此时尚未进入广泛消费的时代，这也限制了酒店的发展。

其次，对自由白人移民而言，早期马里兰是一简单、阶级区划不严和相对平等的社会，没有必要将酒店划分等级。由于早期马里兰很高的死亡率和很不平衡的性比例构成，稳定的家庭和社会结构很难建立，传统的统治阶层很难形成。加之四散的移民模式，许多英国社会传统的因素难以完整地移植过来，新世界的现实条件阻止或延缓了旧世界等级制度的发展。虽然从一开始马里兰就存在着穷人和富人、绅士和一般百姓的区别，但与英国相比，17世纪马里兰社会仍然简单得多，也相对平等得多。同时，对一般自由白人来说，凭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也比英国大得多。即使是白人契约奴，只要能熬过几年的契约期，成为独立的土地所有者的机会也相当大。(18)

17世纪马里兰酒店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店主和顾客的构成与当时的英国及18—19世纪的马里兰明显不同。酒店的性质和当时马里兰的社会现实使酒店店主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大部分店主来自社会中上层，他们中许多人拥有一般人不能拥有的“绅士”头衔。他们多数家底殷实，是其实区或更大范围内的知名人物。他们有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联系，并从事其他各种职业。例如，早期圣玛利城酒店店主丹尼尔(Daniel Jenifer)是当时马里兰殖民地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不仅在殖民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也是首府圣玛利城的行政负责人。他也是一个大种植园主并拥有商船。1688年，他一次就卖给一个伦敦商人一千英亩土地。他同时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律师之一。(19) 另一个酒店店主雅可布(Jacob Lumbroso)除了经营大庄园和开设其他店铺外，也从事律师和医生职业。(20) 这类例子在酒店店主中时

常可见。从《马里兰档案汇编》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从1650年至1680年,圣玛利县33%的酒店店主拥有“绅士”头衔,17%兼任律师,其余多为商人或庄园主。查尔斯县(Charles County)和卡弗尔特县(Calvert County)的情况与圣玛利县情况相似。从1650年到1680年,近50%的马里兰酒店店主拥有“绅士”头衔或从事律师职业。(21)

这一状况与英国酒店店主构成情况正好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社会下层,他们从事这一职业主要是为养家糊口。(22)以英国肯特郡(Kent)为例,从1590年到1619年,在该郡农村的酒店店主中,只有0.2%的店主有“绅士”头衔;在该郡城市中,有1.3%的店主拥有这一头衔。没有任何专业人员诸如医生、律师从事这一职业。约90%的酒店店主由工匠、劳工、自耕农等组成。(23)

这种不同的酒店店主构成情况显示出当时马里兰与英国的不同社会状况。在英国,由于人口增长,就业机会相对减少且不均等,在穷街陋巷开设廉价酒店成为穷人为数不多的谋生手段之一。在马里兰,情况则不同。首先,由于酒店在早期马里兰有重要的功能和社会作用,统治当局对其颇为重视。为了加强对这些酒店的控制和管理,马里兰当局多次颁布法令和公告,规定只有“够资格”的人才能发给营业执照,同时还要有地方官员“推荐”。酒店店主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要保持和维护社会秩序,(24)这就限制了下层人民从事这一职业的机会。在当局看来,建立酒店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而不是一种谋取个人经济利益的手段;第二,由于执照费很高,加上各种保证金和最初的开业费用,创立一个酒店开销较大,一般人感到难以支付。同时由于早期马里兰人口稀少并居住分散,来往客商不多,除了公共假日和诸如法院开庭(Court Days)等公众聚会日子,生意清淡,当局在酒店的各种活动和开销是酒店最主要的收入之一。而一般民众缺乏与当局的密切联系,难以吸引当局光顾,这也使一般人难以从事这一行业;第三,与英国不同,早期马里兰地区地广人稀,土地便宜,存在各种发展机会。如果一般人有一笔足够交纳执照费和开酒店的钱,他完全可以买一大块土地,经营烟草种植园,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经营酒店并非最佳选择。

与同期英国相比,马里兰酒店的顾客构成也大不一样。在英国,绝大多数酒店顾客来自社会下层。(25)他们或是劳工,一天劳累之后,到酒店寻求片刻欢乐;或是无业游民,到酒店互通消息,寻找就业机会,或自暴自弃,借酒浇愁。难怪有人说酒店是“穷人俱乐部”(Poor men's Club)。在17世纪马里兰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从当时一些酒店债务人构成情况看,虽然酒店顾客来自自由白人社会中各阶层,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中层,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上层。劳工比例很小,黑奴和白人契约奴则没有。(26)如果再加上来自官方的顾客,中上层阶层的比例则更高。

17世纪马里兰很少有无业游民和穷人聚集酒店。其原因有三:第一,17世纪马里兰地广人稀,对劳动力需求大,因而工资相对较高。只要有劳动能力,很容易找到工作,因此无业人员很少;第二,当时酒店中酒价较高,(27)一般劳工也不可能经常光顾。再加上政府对穷人饮酒赊账有限制,(28)这更使穷人难以经常上酒馆。第三,由于早期马里兰缺乏城镇,人们居住在相对隔绝的种植园内,相聚的机会不多,劳工更不可能经常到位于交通要道的酒店去。这些都使得穷人和劳工较少光顾酒店。除了白人劳工和穷人之外,马里兰社会大体上分为两大社会集团:黑奴和白人契约奴;大小奴隶主和大小土地所有者。第一部分人受其主人和法律约束,不能、也没有经济能力随意光顾酒店。因此,主要由社会中上层组成的第二部分人便成了酒店的主要顾客。这种顾客结构反映出当时马里兰的社会现实。

由于马里兰酒店的作用不同,酒店店主和顾客的构成不同,其性质也与当时英国绝大多数酒店不同。在17世纪英国,酒店通常是社会下层聚集之处。虽然它们也提供了某种社会服务,但在当局和统治阶级眼里,酒店是社会动乱的温床,这里妓女出没,赌博、酗酒、械斗不断。因此当局制定各种严刑厉法,来管理这些遍布各地的酒店。17世纪马里兰酒店情况则大不相同。虽然不时也有暴力事件或影响社会秩序的现象发生,但基本上说来,这些酒

店不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相反,它们被公认是早期殖民地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心,是不可缺少的社会机构。

综上所述,17世纪马里兰酒店的情况是与当时马里兰的物质条件,地理状况,移民模式,社会现实紧密相联的。从马里兰酒店的特点、作用,及其店主和顾客构成情况可以看出,尽管移民们力图建立起一个与英国类似的社会,新世界的现实使他们难以将英国模式完整地移植过来。从17世纪末起,随着初创时期的过去,人口增多、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各种新机构出现,酒店也日益发生变化。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也逐步降低,与英国酒店的差距也日益缩小,这一过程反映出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的演变过程。

注释:

- (1) 威廉·布朗主编:《马里兰档案汇编》,第3卷,第99页(此后简称《档案汇编》)。(William Browne, ed., *Archives of Maryland*, Baltimore, 1883-, Vol.3:99.)
- (2) 拉塞尔·门纳德:《17世纪马里兰的人口、经济和社会》(Russell Menard, "Pop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Maryland"),载于《马里兰历史杂志》第79卷,第72页(*Maryland Historical Magazine*, 79:72)。
- (3) 参见笔者博士论文《17世纪马里兰的酒和酒店》("Liquor and Ordinari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1),第一章,第12—20页。
- (4) 马里兰当时情况参见沙德·特德等编著的《17世纪的切萨比克地区》一书(Thad Tate, *The Chesapeak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apel Hill, 1979)。
- (5) 《档案汇编》,第1卷,第455—456页,第538—539页;第3卷,第465页;第10卷,第410页;第49卷,第157页。
- (6) 参见《档案汇编》中17世纪各卷。
- (7) (8) 《档案汇编》第2卷,第470—486页;第551—554页。
- (9) 同上书,第15卷,第54—55页,第93页;第54卷,第424页;第67卷,第139页。
- (10) (11) (12) 同上书,第19卷,第538页;第5卷,第266页;第67卷,第9页。
- (13) 同上书,第20卷,第246页;第19卷,第538页;第70卷,第462页,第465页。
- (14) 同上书,第8卷,第120—121页,第67卷,第421页,第68卷,第39—40页。
- (15) 同上书,第65卷,第548—549页,第635—636页;第60卷,第248、547页。
- (16) 同上书,第29卷,第122—123页。约瑟夫·史密斯等编,《马里兰乔治王子县法院记录,1686—1699》,第213页。(Joseph Smith, *Court Records of Prince George County, Maryland, 1686-1699*, Washington 1964.)
- (17) 参见彼得·克拉克:《英国酒店——社会史,1200—1830》,第5—15页。(Peter Clark, *The English Alehouse, A Social History, 1200-1830*, London, 1983.)
- (18) 参见沙德·特德等编著的《17世纪的切萨比克地区》。
- (19) (20) 《档案汇编》,第5卷,第23—24页;第57卷,前言(Introduction) LIX, XVIII;第53卷,XXII, L。

- (21) 参见笔者博士论文《17世纪马里兰的酒和酒店》，第三章，第103—109页。
- (22) 卡尔·勃瑞登堡：《困扰重重的英国人，1590—1642》，第365—366页(Carl Bridenbaugh, *Vexed and Troubled Englishmen, 1590-1642*, New York, 1968)。
- (23) 彼德·克拉克：《英国酒店》，第73—76页。
- (24) 《档案汇编》，第1卷，第447页；第2卷，第347页。
- (25) 参见彼德·克拉克：《英国酒店》，第126页。
- (26) 参见《马里兰乔治王子县法院记录，1686—1699》中有关酒债案例。
- (27) 见笔者博士论文《17世纪马里兰的酒和酒店》，第四章，第168—177页。
- (28) 《档案汇编》，第2卷，第407页；第38卷，第48页。

《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从《曼哈顿中转站》到《美国》三部曲

朱世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歌德说，“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1)

我们在审视多斯·帕索斯以纽约为背景的《曼哈顿中转站》(1925)和美国为背景的《美国》三部曲(1930—1936)后，会颖悟到，如果我们用歌德对于艺术、对于文学和美学的生动的概括来考察作家在这一生中关键的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会是多么贴切而富有启示性。

多斯·帕索斯所创造的这两个“完整体”——从一个世界性的大都会到美国社会，人们既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又不可能找到，因为作家笔下的纽约和美国，已充满了“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多斯·帕索斯在《曼哈顿中转站》中，把他的视野仅仅局限于纽约，他试图从一个城市和在这个城市居住、冒险和惨败的人们的命运来表达他的失败主义主题，而在《美国》三部曲中，作家无论在思想视野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在艺术创作的试验规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试图寻索作家从《曼哈顿中转站》到《美国》三部曲的思想与艺术上的发展轨迹，以期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思想和艺术的演进脉络。这种寻索对于了解美国20、30年代的文学是有裨益的。

《曼哈顿中转站》在美国文学中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中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约瑟夫·华伦·比奇认为，它是“本世纪最辉煌的最有独创性的美国小说之一。”(2)

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创造了一个拥挤不堪的、肮脏的、罪恶的却又充满神秘和魅力的城市。在小说的一开头，作家用了一段引子(我们暂且这么称呼作家的这一创造，他在每一章前均加上一段表面上与正文情节无关的意识流的散文诗，意在为小说情节提供背景或暗喻)：

三只海鸥在破败的木板墙间破碎的箱子上、桔子渣上、腐烂的白菜头上飞翔，渡轮顺着

潮流，撞击着、吞噬着河水，慢慢滑进船台时，发绿的浪头吐出一圈圈泡沫来。手绞车链条发出辘辘的响声。门向上卷起，脚踏过缝隙，男人们和女人们推搡着通过渡口发出一股股粪便味儿的木头地道，就像苹果挤轧进榨汁机一样。(3)

渡轮在小说中几乎赋有一种神秘的意味。小说主人公吉米·霍夫是7月4日随母亲乘渡轮来到曼哈顿的，长大后，穷困潦倒不堪，最后来到的地方又是这渡口。“他坐在渡口肮脏的、亮着微红灯光的候轮室里，久久地苦等渡轮。他坐着快乐地抽烟。他似乎已记不起任何事情，前程茫茫，似乎只剩下眼前这雾霭中的河流和渡轮，渡轮显得很大，一排灯光，就像黑鬼在狞笑。”渡口“突然张开大口，黑黝黝的，喉头却亮着光。”(4)渡轮就像是一个圆圈运动的起点和终点——各色人等通过渡轮进入曼哈顿，最终又乘渡轮离开曼哈顿，正如Blanche H. Gelfant所说的，是一个“逃亡点”(A point of escape)。起点与终点在圆周上相合，没有成就，没有发展，岁月就这样无谓地流逝了。

渡轮象征着一种残酷地吞噬人性的力量，所有通过它的地道而进入纽约的人们，必然会像苹果一样被榨得精干。

作家在描述了建立在砖头上的巴比伦和尼纳瓦，建立在大理石之上的雅典和耸立在瓦砾之上的罗马之后，这样描写纽约：

钢铁，玻璃，瓦，混凝土将是摩天大楼的材料。那拥有数百万扇窗户的大楼，拥挤在这湫溢的小岛上，高耸在天上闪闪发光，一座金字塔又一座金字塔，就如雷雨上空那片白晃晃的云头。(5)

这幅冷峻的图画表明一种气氛，一种生活方式，——那种机械的、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氛围中，人的爱的和自我实现的能力丧失殆尽了。于是，作家在另一引子中发出了他的激进主义的控诉：

漂亮的妞儿哪儿去了？……现在，只能在高级住宅区歌舞酒吧中去找到她们了……他们将我们榨得精干，朋友们……工人朋友们，奴隶们我应该说……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娘儿。(6)

纽约州北部山区农场青年勃特·库本宁，不堪忍受“老头”(“别人说他是我爹，我知道他不是”)的鞭打和虐待(“他总是用一根轻铁链抽打我的脊背”)，用鹤嘴锄“像砸一只腐烂的南瓜一样”砸碎了他的脑袋，逃亡了出来。他步行了15英里，脚上起了泡，来到“事物的中心”。他洗碗、打杂，在那“散发出垃圾酸腐味儿、烧汽油的味儿和污秽的人行道味儿”的纽约混迹了十年，仍然未能找到正常的工作。他丧失了一切人的尊严，在43街一个灰白头发老妇人的厨房里，见到“一盘冰冷的炖菜，半块业已腐酸的面包和一杯已经有点发酸的牛奶”，如获至宝，“吃得很快，几乎没有咀嚼，还把剩下的腐酸面包放进口袋里。”(7)他整天担心警察来逮捕他，终于一面梦想着他作为市参议员的辉煌婚礼，一面又悲叹：“我到哪儿去都无所谓；我什么地方也去不了”，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河自杀。

从勃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日后在《美国》三部曲中所描写的“生物人”的雏型。如果我们把没有文化、命运多舛的水手乔·威廉斯和勃特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他们都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醉生梦死，毫无生活希望，在糊里糊涂中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乔·威廉斯在一次酒吧斗殴中致死)。这都是些被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人们，被排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人们，在生活中屡遭不幸，屡遭失败的人们。多斯·帕索斯把他们作为纽约社会的底层来加以描写。虽然作家在《曼哈顿中转站》中还不像他在《美国》三部曲中那样详尽地、丰满地塑造这些作为成功发迹的富有的美国人对立面的“生物人”形象，但是作家对他们的同情以及他企图以此来剖析、针砭纽约社会的努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主人公吉米·霍夫的形象中包含着作家的影子。他和作家一样，和母亲一起在旅馆度过童年，对于父亲的印象，极为淡薄而渺远。霍夫和妈妈(Muddy)抵达纽约时，他有亲吻土地的冲动——这毕竟是他降生的土地。在霍夫和曼哈顿初次相遇的描述中，作家便已经埋下了

对城市末日(city doom)的一种宿命的预感:

“小家伙，你回到家似乎挺高兴，”那位南方妇人说。

“哦，是啊，我真想趴下去吻一吻那土地。”

“好一种爱国情绪……我真高兴你这么说。”

吉米浑身发烧。吻一吻那土地，吻一吻那土地，这就像一阵嘘声在他脑袋里回响。(8)

他将自己禁锢在里兹大饭店里，无疑像是禁锢在一座奢华的监狱里。他从里兹大饭店的窗户观察着外面的大千世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纷纭的现象令霍夫惊惧而又兴奋。

吉米……从门房虎视眈眈的纽扣面前溜过去，到了百老汇，百老汇上充满了丁当声和脚步声以及当人们从商场的灯光和弧光灯的斑点中走出来而显现的戴了影子面具的脸庞。……他走得更快了，中国人是可怕的绑匪。拦路抢劫的强盗。一个拎一桶煤油的人与他擦肩而过……假如他是一个纵火者。一想到纵火者，就让他浑身惊悚起来。火。火。(9)

这是对现代生存的一种恐惧。火和救火车是《曼哈顿中转站》经常使用的一种比喻，它们象征一种巨大的破坏力对人的威胁，以及人们惊惶的、毫无结果的企图躲避它的努力。

当他腋下夹着一盒巧克力奶油糖果，翻阅百科全书，正在寻索“白色奴隶皇后”(这是一种隐喻)时，睡着了。睡前，作家使用了乔依斯式的语言“Nowilaymedowntosleep Ipraythelordmysoultokeep Ifishoulddiebeforeiwake Ipraythelordmysoulto-take”(10) (我现在睡了我祈求上帝保佑我的灵魂如果我醒前死去我祈求上帝保佑我的灵魂)来显示一种可怕的死亡的预感。他醒来时，发现母亲已经死于血栓。于是，他的整个人生陷进了孤独之中，绝望之情充斥了他的心头。作家用了一个扑打苍蝇的片断来表现他的孤单：

一只苍蝇趴在窗台上在阳光下用后腿扑打它的翅翼。它勾起又伸直前腿，就像人往手上抹肥皂一样，小心翼翼地抚弄浅裂的脑袋顶部，梳理它的毛孔，将全身清洁一番。吉米的手在苍蝇上空扬起，猛地击打下去。苍蝇在他的手心中嗡嗡地乱颤。他用两根手指探将进去，抓住了它，用手指和大拇指将它挤成灰色的肉浆。(11)

《曼哈顿中转站》第一部第五章关于霍夫在她母亲墓园的描写和《一九一九年》摄影机眼(28)中关于作家在哈佛接获母亲病危电报的叙述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即使我们不能武断地说，霍夫的形象就是作家的影子，我们至少可以说，作家在霍夫的形象中描写了自己诸多的作为哈佛唯美主义者的真实的体验，揭示出一个美国青年在世纪初美国社会中所感到的孤独和失望。

在《曼哈顿中转站》中，作家这样描写霍夫在她母亲墓园的情景：

五月的虫子在他的血液中蠕动。他扒下黑领带，塞进裤兜里。一支歌在他脑袋里疯狂地回响：

紫罗兰叫我作呕

把它们统统拿走

太阳是一种辉煌，月亮是另一种光华，而星星则更是另一种光辉：因为每一颗星星的光辉和另一颗星星是不同的。死者的复活也是这样。他急匆匆地往前走，踢碎映着苍天的水塘，竭力想将这些在耳中聒噪不休的油滑的词句抛掉，将黑皱纱的感觉从手指上消去，忘却那百合的馨香。(12)

而在《一九一九年》摄影机眼(28)中，作家将五月故意改成四月：

紫罗兰叫我作呕

把它们统统拿走

拍来的电报说她正濒临死亡那时钟形玻璃罩在石笔的一片吱吱声中破裂了……她去世了杰克悲哀并不是都一个样的而且在客厅里客厅里百合花蜡般的香味(13)

对于多斯·帕索斯来说，她母亲的去世意味着哈佛象牙塔般的钟形玻璃罩破裂了。而对于霍夫，这几乎是一种圣洁的洗礼。从此，他不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而是一个独立面

对社会、面对人生的成人了。他对人生、成功、金钱和事业，有自己的、不同于叔叔杰夫的想法（“如果一个人去纽约成功，那他是真正成功了”）。叔叔杰夫希望他按家庭的传统选择自己的事业。他无法与叔叔的庸人观点直接抗衡，当他离开大都会俱乐部时，见到“旋转门将像碾压香肠肉一样碾压他的岁月”。他终于大胆地发出了“杰夫和他的办公室全见鬼去吧”。（14）

这16岁的青年拒绝因袭传统习俗，抵御了“常人做法”的巨大压力。他过去一直在里兹大饭店的象牙塔中生活，精神上是苦闷的。一旦被抛进纽约生活的漩涡，他每每是优柔寡断，无所适从。他陷进了黄色新闻的泥淖，这种记者生涯和他叔父所设计的事业是一样的毫无意义而消极。

在《曼哈顿中转站》之前的小说中，作家歌颂与传统力量相悖的浪漫主义英雄，他们最后无法取得成功时，便以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具有反叛意义的存在主义的悲剧作为结局。霍夫的形象表明作家这种浪漫主义英雄的梦想的结束，表明他作为“晚期浪漫派，温和的个人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在象牙塔里周游世界”（15）的结束。在《美国》三部曲中，哈佛唯美派诗人赛凡琪则成了一个善于在社会的阶梯上向上爬的人，为了权宜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原则。

霍夫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青年，一个怀有激进思想的“见习记者”，个人生活显得十分糟糕。他生活在一群格林威治村艺术家中间——蹩脚演员奥格尔索帕，沉湎于乱交却还在吟唱处女经的卡桑德拉·韦尔金斯，自我谴责的同性恋者托尼·亨特。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霍夫对纽约的生活渐渐感到厌倦。他说：“我去纽约丧失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他开始厌恶他的记者生涯，他的“公共的娼妇生涯”。他说：“去做石油、黄金买卖，去拦路抢劫，去做任何事情，只要不是新闻报道。”（16）

霍夫的问题在于，“我无法确定我到底最希冀什么，所以我的行动总是绕着圈儿，无助和乱糟糟地叫人丧气。”（17）这自责可以说充分揭示了霍夫性格和行为上病症。

他对美国社会的现实不满，“哦，天，一切糟透了”，“天，我真希望像马丁一样将这一切都归罪于资本主义。”（18）霍夫激进主义的主调是悲观的，被动的。他从马丁·西夫那里获得的激进观点从来没有在他思想上得到充分发展，充其量，他只是一个沙发里的革命家。

霍夫和艾琳婚姻的破裂使霍夫人格的瓦解达到了顶点。他一切希冀正直生活的愿望，都在与艾琳——一个在日益繁荣和贪婪的纽约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自己发迹的位置的女人——的冲突中，幻灭了，瓦解了。他变得冷漠，非常非常的冷漠。他辞去了报纸职务。“生活乱七八糟，他成了趴在一座乱七八糟的城市顶上的苍蝇。”（19）人们还记得霍夫在里兹大饭店窗台上将苍蝇“挤成灰色的肉浆”的情景，现在霍夫自己成了趴在纽约顶上的苍蝇，他要用自己的手将自己碾压成肉浆。作家的象征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于是，在一次超现实主义的妄想中，他自问：“在约克，我埋葬了童年，在马赛，海风吹拂着我的脸，我将我的幼犊的岁月抛进了港口里。在纽约，我将在什么地方埋葬我的二十多岁的岁月呢？”（20）

在参加一次格林威治村聚会后，霍夫乘渡轮离开了纽约。水，在小说中被赋予了一种象征主义意义。它既能带来生命，又能将生命载走。在小说的第一章里，水将勃特·库本宁载到“事物的中心”，而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水又将逃亡的霍夫送到一个未知的世界。“他走下去，呼吸着，血液在搏动，……渐渐地，雾霭消退了，一种珍珠般的苍白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21）霍夫迈向清晨的“珍珠般的苍白”，按照马尔库姆·考利的意见，是走向“象征性的自杀”（22），这种判断似乎有些武断；但认为，这是“无益的自我糟塌的行为中一次前进的行动”（23），也同样失之偏颇。事实上，霍夫并不明确知道他的目的地，只知道“非常遥远”。我觉得，从描写上看，霍夫的情景与勃特刚来纽约时的潦倒十分相像，这好像是作家在作品中故意安排的人物的轮回，也即霍夫所说的“绕着圈儿”（circular）。等待霍夫的是一个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的生涯。而他的前景在《美国》三部曲结束性的《流浪

汉》中得到了充分的注脚：“裸露在破袜子外面的脚后跟已被擦破，穿着破鞋的脚在发痛，在那仔细用手擦干净的褴褛的衣服里面，撕破的内裤使他感到齜齜……因缺吃少穿而发黑的眸子寻找着汽车司机的目光，搭个便车，沿公路捎脚一百英里。”（24）在“诗人与世界”（马尔库姆·考利语）的对峙中，霍夫从纽约逃了出来。他的绝望和逃亡将周而复始，直至他的死亡。这位唯美主义诗人（esthete-poet），和作家本人一样，作为葡萄牙移民的私生子后裔，从来就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外人”（outsider）。

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创造了一颗照亮所有的人的星星——格林威治村演员艾琳。她仿佛是一块磁石，将小说的情节结合成一个整体。在她的富有活力的个人主义光晕周围，旋转着一个又一个纽约情人——演员奥格尔索帕，律师乔治·鲍德温，记者霍夫，花花公子大学生斯坦恩·埃墨利。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一个疯狂的迷恋舞台生涯的小孩，在我有充裕理解生活之前，我便做了许多我并不理解的事情……18岁结婚，22岁离婚，好一个漂亮记录。”（25）她的上升、发迹比嘉莉妹妹更快速、更耸人听闻，她的发展就象征着纽约的发展。她一方面像金银首饰一般光彩夺目，而另一方面又像一个疯狂的娼妇，缺乏道德力量的约束（就像纽约缺乏道德力量的约束一样），造成了一起又一起情感的悲剧，就像小说中多次描写的火灾给纽约带来破坏一样。艾琳是一个典型的坏女人人类人物，她的形象在《美国》三部曲依夫琳·哈钦斯身上得到了更完全、更典型的描述。

纽约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培养了她对世界的勇气，虚伪和圆熟。她对待男性的手段是异常高超的。她说，“我不想当管理任何人的安全阀的黑鬼。”（26）她不是在“事物的中心”，她本人就是中心。她既是罗曼蒂克理想本身，又是商业性欺骗的化身，就像纽约一样，既有辉煌的一面，又有灾难、破坏的一面。

当她和奥格尔索帕之间的婚姻遇到麻烦，她决定离开逊德兰公寓去独立生活，表现了职业妇女对一切满不在乎的神情。“当他们的车驶入百老汇空荡荡的阳光下时，她心中油然而生一股喜悦之情，这股喜悦之情继而像火箭一般升腾起来。风吹拂着她的脸，新鲜而令人激动。”（27）然而，这种快乐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很久，她骨子里仍然是孤独。在勃来瓦特大旅店里，她感到“床就像一张筏，她待在上面，孤零零地被水包围了，总是那么孤单，在不断上涨的大海里飘流。”（28）她和纽约律师、地方检察官鲍德温调情，和大学生斯坦恩来往，但又不想被任何人占有。她希望自由。在“美女与野兽”式的对峙中，她就像城市瘟疫一样，出现在她的崇拜者和情人们中间。人们爱她，但又得不到她的精神，于是便恨她。她的信条是：“婚姻就那么回事，对吗？”（29）于是，在她还未与奥格尔索帕离婚时，就跟斯坦恩暗中来往，陶醉于“斯坦恩在她怀中出汗的肉体的味儿”。

多斯·帕索斯在一次戏剧性的冲突中，突出了纽约的堕落的肉欲气氛，而在这一切漩涡的中心便是艾琳。艾琳和霍夫跳舞时，胳膊轻轻颤动，脸庞凝结起来，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上的眼睛，肥胖的男人和瘦削的女人，在他们周围推挤着转来转去。她是一座复杂的雪亮的蓝亮的铜亮的锯齿钢机器（Whitebright bluebright copperbright——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使用了众多的这种乔依斯式的词汇的任意组合）。当他们停舞时，她的乳房、侧身和大腿往他身上撞去。他身上突然充溢了活血，使他浑身冒汗，像一匹狂奔的马。而就在这种安详的宁静的性感的情景中，突然出现了艾琳的另一情人鲍德温。他掏出“一件镍样的东西”，想击死艾琳。这场闹剧以鲍德温对艾琳的一句评价为结束：“你不比娼妇好多少。”对于艾琳，婚姻、成功、爱情，仅仅是词而已。她玩弄人生，在纽约城如鱼得水。她辞去了演员的职务，成为霍夫的妻子，并当上了时髦杂志《仪态》的编辑。艾琳成了上流社会的宠儿，与“布尔什维克和平主义者”和“世界工联鼓动家”的霍夫发生了感情上的裂痕。她发现自己“成长起来了”，开始腻味唯美派舞会、文学、激进主义、心理分析——格林威治村激进主义的标签。

辛克莱·刘易斯在评论《曼哈顿中转站》时，说：它“在所有方面都比葛屈露德·斯泰

因和马赛尔·普罗斯特，甚至那伟大的白种公猪乔依斯先生的《尤利西斯》还要重要。”（30）1925年创作的《曼哈顿中转站》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美国》三部曲的一个准备。尽管作家的小说都是以社会抗议为主题，尽管都是属于“集体小说”，但与《美国》三部曲相比，《曼哈顿中转站》显示了作家思想的苍白和浅薄，他的抗议是被动的，是悲观主义的，在艺术上，仍然不能说是朱勒斯·罗曼（Jules Romains）意义上的“集体小说”。在写作《曼哈顿中转站》时，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多斯·帕索斯，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热衷于一种社会革命和群众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对于这种社会模式的具体情况，是茫然的；他感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唯美派诗人式的知识分子才能和人性戕害，但是，在他的头脑中社会改革和革命仅仅停留在概念上，仅仅停留在“唱唱国际歌”上。正因为基于这种浅薄的激进思想，在《曼哈顿中转站》中作家创造了作为詹姆斯·梅里瓦尔的对立面的众多的移民、工人、流浪汉形象，如奥·基夫、安娜、马丁·西夫、勃特·库本宁，但这些人物的形象仍然称不上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显得苍白无力，没有文学的力量。富有代表性的是第二部第八章的引子，作家写了一段大都会咖啡馆外面的鼓动演说：“伙计们，人们，和我一样的工资奴隶们，……你们需要血。……你们的血管里为什么缺乏血液？……吸血鬼晚上来吮吸你们的血……这就是资本主义。”（31）拯救无政府主义者萨柯的凡塞蒂的斗争犹如一种催化剂，加深了作家对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解，他在《美国》三部曲中达到了一生思想的巅峰，比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显得成熟。在《美国》三部曲中，他提出了“我们的国家已分裂为二”的命题：

他们在街头用棍棒驱散我们他们比我们强大他们有钱他们雇用并解雇政客报纸编辑老法官有声誉的小人物大学校长拉选票的走卒们（听着商人大学校长法官们美国不会忘记出卖她的人们）他们雇用枪手军服警车和囚车

行呀你们赢了

………

好吧我们的国家已分裂为二（32）

作家意识到存在两个民族，两个处于两极的美国，虽然这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两个阶级，但他的激进主义显然比《曼哈顿中转站》前进了一大步。

在《曼哈顿中转站》中，作家主要创造了霍夫和艾琳两个人，一个最终逃离纽约社会，一个在纽约社会中升腾起来。而在《美国》三部曲中，作家描写了12个人物形象，但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他们“仅仅是象征”。（33）创作的背景已不再是纽约，而是整个美国社会，《美国》三部曲拥有“新闻短片”68篇，“人物小传”27篇，“摄影机眼”51篇，其规模之宏大，思想之深刻，是《曼哈顿中转站》所无法比拟的。

多斯·帕索斯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学试验大师。他的试验的勇气，他的唯美的文字功底，他作为作家的历史视野，是无庸置疑的。辛克莱·刘易斯说：“多斯·帕索斯先生会运用，且熟练地运用所有他们的（指斯泰因、普罗斯特和乔依斯。——作者注）试验性心理描写和风格，所有他们的反对经典小说模式的努力。但是，有不同的！多斯·帕索斯是有趣的！他们的小说是论述和谐的论文，非常学究，且混乱不堪而沉闷，而《曼哈顿中转站》本身则是演奏中的交响乐。”（34）

在研究《曼哈顿中转站》和《美国》三部曲的过程中，作者饶有趣味地发现作家运用新闻为小说故事提供一种社会历史背景和内涵这一试验方法的演进过程。多斯·帕索斯对于新闻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在《曼哈顿中转站》中，他可以说作了试验性的尝试。这种尝试是将新闻标题和人物行动揉合在一起，寄存于情节的演进之中，或提供一种背景，或揭示一种预言，或表示一种乔依斯式意识的流动。如第一部第一章在描写勃特在理发店理发时，突然用勃特自己的眼睛读报：“承认谋杀了残废的母亲……”（35）接着，在勃特与理发师的对话中，不断武断地插入新闻内容，报道一个14岁的孩子杀死亲生母亲的经过。这段背景实际

上为勃特是一个谋杀生父的逃犯埋下了伏笔，同时表现了他当时纷乱、惊惶的心理。

在第一部第三章中，年轻的生意清淡的律师鲍德温在出外用餐时，首先读到报纸的套红标题：“日本人被赶出了沈阳”，这点出了小说的时间背景。继而，他读了一连串无关紧要的新闻，诸如老兵拜访总统，俄国债券之类，接着，他读到了一段十一大道上发生的车祸。这车祸的报道为他找到了发迹的线索，并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他与车祸受害人盖斯交往的由头。新闻标题在小说情节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时，新闻在小说的演进过程中突然出现，没有任何目的，只是想表明小说人物的一种心境。如第一部第四章，勃特在海员俱乐部读报，读了一段日本工兵在鸭绿江修桥的报道。这时，勃特说，“天呀，去他妈的，让我们去喝点儿什么吧。……”（36）以表明人物找不到工作的烦闷和无奈。

而这种运用新闻的试验性的尝试在《美国》三部曲中得到了极致的发展，而成了独立的“新闻短片”（Newsreel），作家选用这世纪初30年间重要的新闻、广告、官方文件等文献，共68篇，作为整个小说部分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补充，作为文献现实主义（documentary realism）的重要试验而垂留美国文学史史册。

同样，在研究《曼哈顿中转站》和《美国》三部曲的过程中，作者饶有趣味地发现，作家在每一章前加上的表面上与情节无关的游离的“引子”（epigraph）与日后的“摄影机眼”的演进关系。引子的写作运用了许多乔依斯意识流手法，文字的风格是非常讲究的，具有散文诗的韵味。在引子中，作家主要用斑斓的色彩像印象派画家一样，描写纽约城，也有描写流浪汉、罢工、无政府主义演讲的片断。请看“蒸汽压路机”一章的引子：

暮霭柔和地磨去了弯弯扭扭的街道的棱角。黑暗重重地压在这蒸腾的柏油城之上，将窗上的细细浮雕字母符号烟囱水塔通风机电梯建筑的装饰线条图案瓦楞眼睛手和领带碾碎成蓝色和巨大的黑色的块儿。……夜晚从弧光灯中压榨出白色的乳液，将阴郁的街区挤压，直至它们将红、黄、绿洒在回响着脚步声的街上。（37）

作家连续使用了“磨去”“重重地压”“碾碎”“压榨出”这些动词造成一种冷酷、压抑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又与那光怪陆离的色交映在一起，形成一幅纽约所独有的图画。

作家在《美国》三部曲中发展了这一手法，他基本上摒弃了标题符号，形成了脍炙人口的散文诗“摄影机眼”。“摄影机眼”自成独立的一体，用意识流描写作家一生对周围环境和人物的潜意识的观察和判断。

如果说《曼哈顿中转站》的风格和技巧成就是“奇异地没有说服力而混乱”（38），那么，在《美国》三部曲中，这种风格和技巧就有了说服力而浑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多斯·帕索斯也从山脚下而走上了自己艺术的巅峰，成为美国30年代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作家。

注释：

（1）《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2）Joseph Warren Beach, *The Twentieth-Century Novel: Studies in Technique* (New York: The Century Company, 1932) p. 437.

（3）（4）（5）（6）（7）（8）（9）（10）（11）（12）（14）Dos Passos, *Manhattan Transf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p. 3, 403, 12, 255, 65, 68, 83, 86, 96, 112, 120.

（13）多斯·帕索斯：《一九一九年》，朱世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15）Malcolm Cowley, “Dos Passos: Poet Against the World,” in *After the Genteel Tradition*, ed. M. Cowley (New York: 1937), p. 168.

（16）（17）（18）（19）（20）（21）*Manhattan Transfer*, p. 177, 176, 265, 351, 353, 404.

（22）Malcolm Cowley, *After the Genteel Tradition*, p. 137.

(23) Blanche Houseman Gelfant, *The American City Novel*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51.

(24) (32) 多斯·帕索斯:《赚大钱》,姚永彩、左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第496—497页。

(25) (26) (27) (28) (29) (31) (35) (36) (37) *Manhattan Transfer*, p. 265, 141, 167, 168, 255, 17, 92, 112.

(30) Sinclair Lewis, *Manhattan At Last!*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5 Dec. 1925) p. 361.

(33) Alfred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6) p. 274.

(34) Sinclair Lewis, *Manhattan At Last!* p. 361.

(38) Alfred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p. 274.

《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

赵 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描写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北方农民生活的巨著《大地》(*The Good Earth*)三部曲的问世,使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享誉文坛。其中出版于1931年的《大地》又“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写”(1)而先后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豪厄尔斯(Howells Medal)最佳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这部小说自问世之日起,对它的批评就始终存在。在美国文学界,批评家们认为虽然赛珍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她的《大地》仅仅是部通俗小说,其审美价值根本无法与海明威、福克纳等人的文学成就相比。因此,一般的文学史专著对赛珍珠只是做简单的介绍,往往几笔带过。还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赛珍珠不能算是美国作家,因为她的作品多是以描写中国为主的。

中国知识界对赛珍珠的作品也多有批评。这些批评文章见诸当时在美国和中国出版的报刊上。最早对《大地》提出质疑的是康永喜教授1931年7月1日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的文章,以后江康湖教授也撰文批评《大地》。他们认为赛珍珠笔下的农村生活是不真实的,并指出一些细节上的失真。在国内,鲁迅、姚克也认为《大地》是不真实的。当然,中国学者中对《大地》也不乏首肯者,林语堂便是其中之一。(2)

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海峡两岸都把赛珍珠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来加以利用。台湾一些人把赛珍珠说成是反共的人士而大加赞赏,另一些由于她对国民党所持的批评态度,排斥她的作品;而大陆则把赛珍珠作为反共作家,禁止出版她的作品,以至于她的名字连同她的作品都在她热恋的土地上消失了。直到近年,大陆学术界才开始对赛珍珠进行重新

评价。

笔者认为,赛珍珠的《大地》就其审美价值而言,不能称之为优秀的或经典的文学作品,它的确是一部通俗小说。而小说中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描写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真实。但这部小说的意义在于,当世人还不甚了解中国的时候,她用英文写了这样一些中国农民。通过这部作品,使西方人懂得,中国农民不仅仅是留辫子、抽鸦片、缠小脚的“东亚病夫”,他们也是人,他们也在为生存而搏斗。和世界上所有农民一样,他们与土地也有着血与肉的关系。赛珍珠用自己的笔,架起了一座世人了解中国的桥梁,这便是小说的魅力之所在。赛珍珠是位十分复杂的作家。她不赞成共产党,同时也批评蒋介石政府;她反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主张超越阶级对立、民族矛盾的人道主义,不分是非,一笑泯恩仇。但是,她对中国的热恋和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怀,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政治立场,具有丰富的人道主义内涵。

本文无意全面评价赛珍珠其人其书,只想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

—

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一问世,立刻成为西方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它那特异的东方情调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古老中国的魅力,尽管贫穷、混乱、水深火热,但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这种超出时代、地域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使人联想起那些原始的时代和古老的神话——人由泥土做成,人的生命源于大地,最终还要归于大地。

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接触过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她所关注的首要对象是农民,这固然是受到她的丈夫、美国农业专家约翰·洛辛·巴克的影响,同时也不能不说明赛珍珠切入中国人生活的角度是独特的、准确的、深刻的。因为尽管在本世纪30年代,中国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等一系列事件,中国开始走向摆脱封闭的农业文明之路,但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仍然是农民。赛珍珠紧紧抓住农民,通过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永恒关系来表现时势的变化和命运的兴衰。过去,中国的古代文学一直给人展示那些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以至于人们只看到了中国文明中的士人文化和儒士雅兴。在现代,尽管有许多作家关注农民的命运,特别是鲁迅对农民的描写深入骨髓,但都不是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核心的。而赛珍珠则以一种朴素的、笨拙的、甚至是愚昧的农民文化来界定中国的传统,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汗水渗透着泪水的人们,祖祖辈辈生于土地、长于土地,与土地相伴而终。他们的土气、愚笨恰恰是中国人另一种高尚情怀的表现。他们“乃是实实在在的人,他们紧贴着泥土,紧贴着生与死,紧贴着乐与悲。……在他们中间,我看到的是真而又真的人。”〔3〕

围绕着王龙与土地的关系,赛珍珠从家族的兴衰和人性的变化这两个层次揭示了农民的生命源于土地这一永恒的主题。

(一) 土地与家族的兴衰

从小说的结构上看,《大地》属于传统的家世故事,一个家族的兴衰和在这个过程中的悲欢离合构成了作品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线索。但是在这个家族故事的深层,有一条主宰着人的命运的主线,那就是王龙一家与土地的关系。家族的兴盛与衰败、家庭的和谐与分裂系于人与土地的离合。赛珍珠通过两个家族的更替和一个家族的命运成功地揭示了人与土地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作品一开始,当王龙的家还一贫如洗的时候,作家描写了黄大地主家族的全盛,他们靠手中的土地独霸一方,生活在悠闲、奢华和糜烂之中。但是,由于黄家与土地的关系仅仅是

一种功利性的财产关系，土地只为他们提供生活享乐所需的财富，他们只躺在土地上坐享其成，而没有脚踏土地，把自己的血汗融入土地。在黄家，那种人与土地间的血肉关系已荡然无存。为了维持奢华，他们不得不一块块地出卖土地。每出卖一次，黄家便衰败一分。当所有的土地都出卖后，这个家族也随之消失。

黄家的衰败恰恰为王龙一家的兴盛提供了最好的契机。王龙一家靠着他们与土地的血肉关系，靠着他们在土地上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终于由普通的农民一跃而为显赫一方的地主，取黄家而代之。这种家族的更替说明谁拥有土地、珍惜土地、耕作于土地，谁就会兴盛。

王龙曾是个贫苦的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活，贫困得连娶媳妇也要靠有钱人家的开恩。小说的开篇，通过王龙简朴的婚姻、破旧的房屋以及全家那寒酸的衣食，突现了王龙的贫困。但贫困并未压垮他，更未泯灭他对土地的渴望，反而使他的生命格外昂扬，因为有一种古老而弥新的信念支撑着他——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土地。为此，他忍受贫困、饥饿和屈辱，与天灾人祸搏斗，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他购买了大量的土地，由寄人篱下的农民变成了显贵的大地主。土地对王龙来说既是生命之本，又是他走向显贵的标志。

从王龙结婚、生子到他成为大地主，是小说中最朴素、最富于诗意的部分。为买到土地所付出的艰辛，买到土地时的兴奋、丰收时的喜悦、遇灾时的悲哀、逃荒时的窘迫，都与王龙和土地之间的浑然一体息息相关。就是在被迫离开土地之时，大城市的五光十色也一刻未能泯灭王龙对土地的一往情深。那时的王龙家，夫妻间的亲密默契以土地之梦为根基，新生婴儿的欢乐被土地的温情所围绕。王龙和妻子阿兰共同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领着孩子玩耍在自己的土地上，尽管困顿、劳累，但他们的精神和亲情使简陋的茅屋熠熠生辉。一种只有扎根于土地之中才会有有的充实、和谐构成了《大地》前半部的浪漫情调。对王龙来说，土地就是诗、就是画、就是音乐、就是宗教。

然而，王龙家族的和谐因人与土地的分离而破碎。王龙富有了，不愿再下地干活，想过体面人的生活。当他脱下农装、换上丝绸长衫在城镇里四处游逛之时，当他只知道坐在土地坐享清福、不再嗅泥土的芳香时，当他抛下妻子阿兰与妓女荷花欢悦之时，他的家庭开始走向分裂。尽管他的财富足以使他的家庭成为受人尊敬、甚至嫉恨的对象，但却已开始了内在的糜烂。阿兰与荷花之间的相互仇恨笼罩着这个家，王龙与儿子之间的亲情不见了，代之以相互的不满和怨恨，他的三儿子甚至离家出走。这种不和谐和分裂在王龙死后便演变成分崩离析——分家。分家时，儿子、儿媳们之间的相互算计，分家后大儿子的游手好闲、二儿子的狡猾奸诈、三儿子的杀人嗜血，一一预示着王龙家族的衰败。随着王龙留下的土地被分割、被一块块卖掉，王龙家族也渐渐走向分裂和衰败。在《儿子们》和《分家》中，这种衰败表现得淋漓尽致。赛珍珠的这种描写从反面揭示了同一个主题：农民一旦离开土地，便失去了和谐与生命，“当人们开始卖地时……那就是一个家庭的末日。”〔4〕

（二）土地与人性的变化

赛珍珠在《大地》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有的单纯、有的复杂，特别是王龙，时而粗鲁猥琐，时而坚定执着；时而懦弱卑鄙，时而英勇善良；时而勤勤恳恳，时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但王龙的这种复杂性格始终与他与土地的关系相连，而性格中他对土地的热爱则贯穿于一生。当王龙还没有成为显赫的大地主时，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占据着人物的核心，他吃苦耐劳、富于同情心，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透露着土地给予他的信心和力量：

王龙开始踏踏实实地在土地上耕作，他甚至连回家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搭了进去。……如果白天活干得实在太累了，他就躺在垄沟里，他的肉贴着自己的土地，感到暖洋洋的。〔5〕这是肉贴着泥土的王龙，是中国农民纯朴性格的逼真写照。

但当他富有了，过上体面人的生活后，他开始用丝绸打扮自己，开始觉得阿兰很丑，开始去城里闲逛、喝酒、逛妓院，给叔叔和婶子送鸦片，强行夺走阿兰仅存的两颗珍珠，终日

和他的爱妾荷花“吃着、喝着、尽情地享乐着”。他变得油头粉面、轻浮放荡，昔日在田地里劳作的生命力消失了。他开始空虚、困乏。而他的儿子们一个个离开土地后，就再也没有人性的善良与纯朴了。老大终日沉湎于酒色，老二唯利是图，老三虽然有理想，但由于从土匪起家的军阀本性，使他成为一个杀人如麻、鱼肉百姓的刽子手。通过儿子们的所作所为，赛珍珠似乎在暗示：农民一旦离开土地，必定堕落。

但是，作家在王龙那种复杂多变的性格中始终突出着一种不变的个性——对土地执着的爱。当他没有土地时，拚命干活、攒钱，渴望有一天得到土地；当他得到土地后，他一头扎向土地，辛勤劳作，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当他被迫离开土地、逃荒在外的时候，他时时刻刻想着回归土地；当他离开土地，游手好闲的生活使他感到空虚、烦躁时，他倾听到的是土地的召唤。他脱去长袍、丝绒鞋和白色袜子，挽起裤管，重新踏上黑油油的土地。土地给他力量和充实。特别是在他不久于人世之时，他对儿子说的那番话，更突现了王龙对土地的执着：

我们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你们的土地抢走……（6）

王龙死了，但他对土地的热恋永存。

赛珍珠对这种执着于土地的赞美，还可以从小说中二位女性人物的性格中见到。首先是阿兰，这位女仆出身的农村妇女，有着不屈不挠的坚韧和近乎哑巴式的沉默，她对土地的执着体现在她言行的每一细枝末节上，怀孕不能中断她去地里干活，刚生完孩子又回到土地上劳作，即便在成为大户人家的女主人之后，她仍保持着吃苦耐劳、朴实忠诚的品质。她是一个与土地浑然一体的人，宁可自己死去也不要丈夫给她花钱治病，因为那些钱能买好大一块地。她说：我活不长，就要死了，但地在我死后还在。在这里，赛珍珠对阿兰充满着同情和赞美，特别是对阿兰那土地般纯朴的性格给予了诗意化的描绘。

另一个女性形象是王龙的二妾梨花。作家突现她性格的纯朴和忠诚是在王龙死以后。唯有她在分家时不去争夺遗产，甘愿远离王家大院，回到乡间的土屋里；唯有她抚养老王龙的傻女儿，一个人守在王龙的墓边，寄托哀思；更重要的是，这个平日与世无争、百依百顺的女人在听到王龙的儿子们要卖地的消息时，却一反常态，变得激愤、尖刻，她全身颤抖，两眼含泪，企图阻止卖地，并用鬼魂报复来威胁王老大。这种对王龙的忠诚似乎是王龙对土地的忠诚在活人身上的延续。

从以上的分析中，赛珍珠把中国农民的生活理解为人与土地的离合。他们只有扎根于土地才会有希望、和谐、幸福，他们的生命才有意义，他们的人性才会纯朴、善良。而农民一旦离开土地，他们就失落、迷茫、痛苦，他们的生命就空虚、萎缩，他们的人性就邪恶。

（三）对土地的浪漫情怀

赛珍珠还是个婴儿时就被父母带到中国，在这里她度过了珍贵的童年时代，直到1934年返回美国，她前后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她既传教又读书，广泛地接触过社会各个阶层。她几乎像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系列风云变幻。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仍然被内忧外患所威胁。军阀混战、日军进犯、经济衰败、政治腐朽，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赛珍珠目睹了这一切，便不能不在她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但是，赛珍珠的笔一直处在理智与情感、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之中，并使她对土地、对农民的偏爱化为一种理想化的浪漫情调贯穿作品始终。当她能够冷静地观察中国现实之时，她是那样真实地描绘了风云变幻、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中国，她写到了下层民众的贫困，写到了自然灾害、土匪、军阀、税赋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甚至无情地描绘了她钟爱的农民身上的各种弱点：封闭、愚昧、自私以及百依百顺的奴性，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算计、残杀、坑害。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农民与土地这一主题之时，她那种博爱式的同情、浪漫式的理想主义便为严酷的现实抹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甚至会以宽容、理解的笔调描绘农民身上的弱点，把愚昧、顺从和封

闭作为一种美德加以赞扬,把原始的农业文明视为人性完美的标志。她像法国的卢梭以及那些浪漫主义时代的文人,也像中国的老庄、陶渊明,把原始的刀耕火种和封闭、落后的农村升华到田园诗般的境界。她曾明确地表示过:“农村里的生活才是中国底真实而原来的生活。这种生活欣幸地尚未沾染上驳杂的摩登习气而能保持她纯洁健全的天真。”(7)她把这种生活视为中国的基础。

这种浪漫主义的理想也成为《大地》一书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对比的准则。在作品中,只要一触及到泥土,赛珍珠的笔就充满了温情,一涉及到城市,便冷酷、干涩、挖苦。乡间的朴素无华和大城市的灯红酒绿,耕耘于土地上的充实和逛妓院、去赌场的空泛,脚踏土地的升华和在城市闲逛中的堕落……都在暗示作家这种回归土地的理想主义。

同样,这种浪漫主义也渗透在作家对中国农民、中国农村前途的理解中。作品中,王龙后代们,老大坐吃山空,不会有任何前途;老二狡猾奸诈的商人习气只会导致世风日下;老三当上了一方军阀,军阀的本性吞噬了他的理想,其结果是国家分崩离析、百姓生灵涂炭。王龙的几个孙子曾在城市中参加革命,但作家似乎是以开玩笑的态度来描绘这些毛头小伙子的冲动,最后是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赛珍珠在以否定的笔调描绘了商业、武力、革命在现实中的失败之后,向读者献上了一个理想的光环——王龙的孙子王源留学归来,回到他祖父的土地上,知识与土地的结合便是中国农民的未来。至此,《大地》三部曲形成了一种人为封闭的循环:来自土地,归于土地。作者似乎在暗示,只有土地和脚踏土地的农民才是中国的未来。

尽管《大地》中有许多现实主义的描写,但整部小说的基调仍然是理想主义的。她似乎不愿中国走出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走出封闭愚昧的传统生活方式,不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工业化。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以农民走出土地为标志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原始的农业文明无论具有多么纯朴的田园气息,农民的生活方式无论多么率直,终将被现代文明的城市化、工业化所代替。

《大地》作为一部小说,那种田园诗般的朴素固然很美,但作为一种了解中国的资料,它的浪漫情调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国严酷的现实。所以,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是加入了作家的主观构想,而不完全是现实中的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浪漫情怀不能代替长期落后的农业文明所造就的落伍的中国和保守、愚昧的中国农民。

二

如果我们把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与同一时期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农村作一番比较,似乎更能体现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的特色。

细读中国现代作家关于农民的作品,可以发现它们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挖掘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批判传统的封建文化,其笔调是冷峻的,揭露多于同情,现实大于理想,愤怒压倒宽容。这批作家往往对中国的落伍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耻辱和忧患,对中国的现实持冷静、批判的态度,并有西方文化的背景作为他们透视中国传统的参照系。特别是鲁迅,其勇气、才华、犀利和深刻都是现代作家群中第一流的。

第二种类型是以萧红为代表的既批判封建主义传统、又对农民的苦难寄以深厚的同情,其中还夹杂着故园已逝、青春不在的怀旧情绪。其笔调是哀婉的,同情、宽容、伤感是其主要特色。这批作家对中国的现实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哀叹多于抗争,没有明确的西方文化作参照系。其中的萧红,有才华、情调,但没有力量。

第三种类型是一批左翼作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年接受西方文化,转而投入马克思主义,奔赴延安,有些人从一开始就崇尚无产阶级革命,信仰共产主义,把文学作为宣传政治革命的工具。他们往往以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苦难为背景,突出农民的革命性和反抗精神,强调

阶级压迫，其作品带有明确的政治性。像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与这三种类型相比，赛珍珠的创作更接近于前两种，与第三种截然不同。因而，我们的比较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赛珍珠与萧红、鲁迅的对比上。

（一）赛珍珠与鲁迅

众所周知，鲁迅对中国农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在作品中，“怒其不争”多于“哀其不幸”。在鲁迅看来，愚昧得近乎麻木了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鞭子，只有滴血的刺痛才能唤醒被封建文化窒息了几千年的灵魂。所以，鲁迅是以冷峻的揭露来表达他的爱、忧患和同情。在鲁迅笔下，中国农民的形象不但可怜，更可悲。要么是麻木的生命（《故乡》中的闰土），要么是死守旧梦的古董（《风波》中的九斤老太），要么是二流子造反想当皇帝（《阿Q正传》），要么是愚昧、奴性（《祝福》中的祥林嫂）。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贫困、受压迫、愚昧、麻木。他们不仅受制于外在环境的重压，更受制于自己的灵魂。善良、纯朴因长期的封闭而退化为愚昧、奴性和软弱。他们不仅是封建制度和传统观念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最广泛的基础。鲁迅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只有绝望，对中国前途的渺茫。

然而，赛珍珠笔下的农民基本是被同情、赞美的形象，虽然她也写了农民身上的种种弱点，但只要农民能回归土地，以土地为根，他们就变得纯朴可爱。阿兰的沉默是一种典型的奴性，但赛珍珠不但没有鲁迅的鞭挞，反而以同情、赞美的笔调进行描述。王龙对土地的怀恋和只要离开土地便失去生命根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小农式的保守、封闭，是对陌生世界和新奇事物的本能的恐惧，赛珍珠却给予全面肯定。王龙的孙子王源的土地的回归，虽然看起来不免牵强，但却表达了赛珍珠对中国农民、中国社会的前途的理想。

尽管赛珍珠的《大地》遭到海内外许多华人的指责，认为她把中国农民写得过于贫困、丑陋，但如果把她与鲁迅相比就能发现，赛珍珠笔下的农民似乎比鲁迅笔下的农民更可爱。

（二）赛珍珠与萧红

也许是由于女人的共性，赛珍珠和萧红在描写中国农民时，都没有鲁迅的冷酷和辛辣，即便是揭露黑暗、厌恶农民的弱点，也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但萧红和赛珍珠笔下的农民形象以及两人的态度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萧红笔下的中国农民不是作为某一人物或某一家族出现的，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以及其他一些散文、短篇小说，所写的大都是中国农民的群像，她更关注人物的命运而不是性格。在她的作品中，给人强烈感受的不是鲜明的人物，而是某种情调和气氛，更像抒情散文或浪漫、伤感的乡村音乐。她的作品没有精心的安排，像是随笔写来。她的笔触更细腻、更女性化。

而赛珍珠的《大地》显然是以人物性格和家族命运为基础，她全力塑造一个家庭，对性格的关注胜过对人的命运的描写。而且为了突出作家的主观判断，不惜把复杂的人物抽象成单一性格。她的作品像是一幅有背景的人物画，那种精心设计的结构，说明赛珍珠决不是随兴落笔。与萧红相比，赛珍珠更加条理化，她的审美与敏感不如萧红，但对人物的把握却胜萧红一筹。

萧红出身于富足的地主家庭，受过教育。后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她本身是封建主义的受害者，更目睹了封建主义和战乱为农村带来的苦难，加上她天性的敏感，使她的作品染上一层浓重的悲伤情调。金枝、团圆媳妇、王阿嫂等人的悲惨命运，激起了萧红的愤怒，但在作品中这种愤怒却很柔和，让读者慢慢流泪。对农民的弱点，萧红非常厌恶，但她不是一针见血，而是姐姐向犯了错误的弟弟的规劝。她的作品中也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它不是关于社会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而是对人性纯洁的呼唤。

赛珍珠不同于萧红。她的作品有悲伤、死亡和痛苦，但没有伤感。与萧红相比，赛珍珠的笔更为男性化。她笔下的人物死亡，都不是外界的摧残，而是自然规律使然。这便削弱了

作品的批判力量。她写农民的弱点是以与土地的关系为标准的，而没有深入到特定的农民身上。她的浪漫情调是基于对人类的信心、对未来的向往，对人与土地这个主题的关注。因而，她对农民的弱点揭示不深。她很少从批判农民本身来批判封建主义，而是从环境的丑恶来为农民的人性堕落寻找理由。

因而，萧红对农民的爱是贴近血肉的，既可怜又同情、既爱又恨。而赛珍珠只有爱和同情。

(三) 赛珍珠和鲁迅、萧红的这种差别，除了他们的审美与写作风格不同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鲁迅和萧红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小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尽管两人都出身于较富足的家庭，不必为衣食发愁，但封建主义、军阀混战及半殖民统治，给他们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是深入骨髓的。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有一种切身的感受。中国社会的变化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是他们的家。因而他们的爱和恨都是那样具体、真切。而赛珍珠是美国人，无论她在中国呆多长时间，也无论她怎样了解和热爱中国下层民众，但她始终是客居于此。中国的社会变化不会根本改变她的命运，中国永远只是她的第二故乡。她对中国现实的感受缺乏中国知识分子们特有的实感和责任心。因而，她对中国农民弱点的揭露没有鲁迅的深切、冷酷、激愤，对中国农民的爱和同情也没有萧红的亲情。她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理解，只看到其和谐、富有生机的一面，却看不到土地对中国人的窒息。

再进一步讲，赛珍珠是美国人，她的祖国比中国强大、富足、稳定。来自故乡的优越感使她对中国的感受有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角度。不管她怎样全力反对掠夺式的殖民主义，提倡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但她摆脱不了优越的异邦人这一背景。她可以爱中国、同情中国，但不可能有中国人在落伍时的屈辱。而鲁迅和萧红生在一个被人类的先进文明远远抛下的民族之中，落伍的耻辱使他们无法心平气和地去爱、去同情、去宽容。当务之急不是同情，而是拯救自身。因而，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感受更多是来自异邦的自上而下的怜悯，而鲁迅和萧红的同情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包括自己在内）的亲情。近日，偶读冯亦代先生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文章，他亦持此观点。文章说：“我以为赛氏的悲哀在于她满心扑向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却不以她的热诚为贵，归根结蒂在于她的是非观上。固然她也不同意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过这只是由于基督教徒悲天悯人、慈悲为怀的正义感，她没有站在中国人民立场来看问题，她只要求不分是非，一笑泯恩仇而已。同时她只看到而且过分重视或强调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施舍。而这些款项正是出于中国人民屈辱的所谓庚子赔款。试问美国人在华所办的几所教堂及其慈善事业，几个医院，几处大学能减轻中国人民所受美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祸吗？”（8）当然，赛珍珠作为一个异邦人，能以如此深厚的爱与同情来面对中国，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她在主观上想与中国人平等的努力是真实感人的，但是客观上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是赛珍珠或鲁迅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弥合的。

从文化背景上看，赛珍珠是一个传教士的女儿，在西方接受教育，来到中国以后既传教又教书。基督教所特有的博爱精神，使她观察任何事物都有一种超越种族界限的视野。因而，她的写作总有从整个人类的共性和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出发的角度。《大地》中的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已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特定生活，升华为一种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鲁迅和萧红生活在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土地上，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加上中国的贫困、落伍，使中国人只关心自己家里的事而无暇他顾。因而鲁迅和萧红的作品虽在揭示中国现实的方面有震撼力，但却无法成为有世界意义的作品。当然，也还有语言、民族隔阂等方面的原因。

正是由赛珍珠的这种宗教情怀，她笔下的像王龙那样的中国农民，他们的情与爱、痛苦与欢乐以及那种生生死死都要回归土地的情怀，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也正是由于此，《大地》

激起了世界上更多的主持正义的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因为“小说使他们懂得了，遭受日本军轰炸的是王龙的土地。”（9）

注释：

（1）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转引自王逢振的《大地》中译本前言。见赛珍珠著，王逢振等译：《大地》，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2）对《大地》的批评，参见Kiang Kang-Hu, “A Chinese Scholar’s View of Mrs. Buck’s Novel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1933;

姚克：“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申报·自由谈》，1933年11月11日；鲁迅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273页。赛珍珠对江康湖教授的反驳，见Pearl S. Buck, “Mrs. Buck Replies to Her Chinese Critic,”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1939; Pearl S. Buck, *My Several World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5, pp.320-325。林语堂对《大地》的评价，见Pearl S. Buck, *A Woman in Conflict*, New Jersey, 1983, p.109。

（3）Pearl S. Buck, *My Several Worlds*, p.164.

（4）（5）（6）前引《大地》中译本，第321页。本文小说中的引文均引自该版本，并参阅

Pearl S. Buck, *The Good Earth*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31)。

（7）见赛珍珠为1935年出版的林语堂所著《吾国吾民》所作的序。林语堂：《吾国吾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8）冯亦代：“赛珍珠的中国世界”，《文汇读书周报》1992年9月26日。

（9）Mary M. Paterson, “Pearl Buck’s Return to the Good Earth,” *Washington Post*, April 5, 1992.

《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

——读邓蜀生著《美国与移民》

杨玉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美国这部波澜壮阔、蔚为奇观的移民史中，有宽容大度、振顽立懦的光辉篇章，也有使民族汗颜的种族迫害丑闻。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邪恶交织而成的美国移民历史，是十分值得回顾和研究的。”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前言》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其典型性，恐怕在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者。正是形形色色的移民——“老移民”、“新移民”、“非自愿移民”、“非法移民”等等——造就和发展了美国。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我们了解历史上的美国、理解现实中的美国的锁钥所在。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自十数年前即致力于此，孜孜求索，除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发表了系列拓荒性论文外，旋又推出其专著——《美国与移民》，试图揭示“美利坚民族与外来移民的关系”这一深刻主题。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这在晚清迄今的中国美国学发展史上，邓著是破天荒第一部。它的问世和成功，对于丰富、深化和发展我国的美国史研究，极堪裨益。

从历史的渊源说，如今的美国是从不列颠美洲殖民帝国的一部分衍生、发展而来的。它奠基于一六〇七年拓殖的詹姆士敦，随着愈来愈多的以英国移民为主的外来移民的积聚，遂不断扩展，渐成沿大西洋岸的十三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虽说当时无论官或民尚未有独立于母邦之念，如同人所共知的，仍依附于不列颠、效忠于英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的经济愈益成长、民主政治意识愈趋浓重，其综合运动的历史成果，就是旧世界的移民先驱孕育了一个新的民族。邓蜀生概括道：“北美殖民地人民本来就是为了逃避英国专横的统治才来到异土定居的。来自英国以外的欧洲人，也决不是要来北美投身在英国统治下讨生活的。自我奋斗，不愿受约束，成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特质”（第112页）。托马斯·杰斐逊宣称：“上帝给了我们生命，同时也给了我们自由”；帕特里克·亨利疾呼：“不自由，毋宁死！”正是庄严宣告“一切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不仅照亮了北美的独立之路，而且也加速了新的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期为合众国留下了一笔极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美国独立后，一个以欧洲白人移民为主的，由多民族、多种族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国家已经初具规模”（第8页），并由此大致确定了美国的进化模式。

《美国与移民》论证的基本结论之一是，“移民对美国不是负债，而是可贵的资产。昨天是如此，今天是如此，明天也会是如此”（第411页）。据统计，从1815年到1914年，有3300万移民涌入美国。就美国政府来说，其移民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882年以前，它奉行的是自由移民政策，此后，则可以归纳为限制和选择移民的政策。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移民限制松动时期。总的说来，吸引外部人才以促进自身建设，是美国的基本国策。它所拒绝或排斥的无非是其不需要或不迫切需要的。对此，作者的议论恰如其分：“美国移民政策经过了多次修改，从开门到限制到半开门，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吸引和借助外部人才来促进美国发展。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对人才的选择性更强、标准更高、手段更多种多样”（第52页）。

美国政府的鼓励外来移民政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工业化初期，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涉及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表现在经济生活上”（第25页）。作者把这种作用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并作了具体分析，即：第一、增加了美国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第二、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第三、输入了美国工业化的技术基础；第四、为在南北战争中拯救联邦、废除奴隶制作出了贡献；第五、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该书指出，西进运动以其势不可挡之势，使美国的地域大面积扩展，这一前所未有的地理革命，使美国真正成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美洲第一大国。最重要的是，推动这一历史运动的主要动力，恰恰就是移民。“粗犷的拓殖生活加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使西部成了美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地区。从世界各地来的移民在美国西部找到了远比东部开阔的新天地”（第119页）。

西进当然有其消极面、扩张性，但它既促进了美国物质文明的大发展，也改变了其早期政治格局和社会面貌，还深刻地影响了美利坚民族精神。概言之，“在美利坚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没有当日的西进运动，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第129页）。移民的作用，于此即可略窥一斑。

二

印第安人是迄今所知北美最早的居民。它创造了其独特的古文明。可是，进入17世纪后，用邓蜀生的形象说法，来了欧洲人，从此不太平。印第安文 鸮卮徊綬发展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被搅得七零八落。两个世界文明相遇的剧烈冲击，使其生存受到种族灭绝式的摧残。作为美利坚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作者认为，说印第安人是北美移民的先驱或北美最早的居民或北美土地的最初主人，均未尝不可，但是，他们不是今天美国人的祖先。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今天美国文化不是北美印第安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不是美国的古代史。美国没有古代史”（第61页）。关于美国历史的开端，或者说印第安人原始社会是不是美国古代史，这在学术界是一个不无争议的问题。从移民的视角来探索这个重大命题，肯定将会增进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认识。该书还论述了合众国诞生后印第安人的坎坷遭遇。无论如何，对印第安人而言，“美国梦”是一场大恶梦。

《独立宣言》说：“一切人生而平等”；然而，这“一切人”中却堂而皇之地排除了印第安人，自然也把当时身为奴隶的黑人摒弃在外。历史有情，亦无情。

黑人是带着锁链、辛酸和屈辱被抛到北美的。黑人是奴隶，不是人，这一蔓延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血迹斑斑的悲剧，恐怕也是美国人最为汗颜的污点。清算奴隶制的是南北战争。这场持续四载的大决战，不仅摆正了美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速度。邓蜀生以他特有的笔法写道，“如果不打这场内战，美国的发展不可能像它后来那样快。如果这场内战不是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美国也将是另一种面貌”（第157页）。黑人改变了命运，从奴隶到公民，从非人到人。当然，路不可能平坦。“对大多数黑人来说，‘美国梦’还是在令人困扰、担心受害的梦境中”（第202页）。失望和无望，仍然缠绕其身，种族歧视的阴影不散。最要命的是，要想让种族歧视观念从美国白人内心中完全消除，“恐怕要比人类登上火星还要遥远”（第205页）。其实，不仅仅是黑人，所有一切有色人种在美国都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邓氏痛陈道：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压迫，“使美国历史蒙受耻辱”，迄今仍是“美国社会的顽症”（“前言”）。

三

吉米·卡特说，“华裔人数之少，与其对这个国家贡献之大，不成比例”；作者说，“实际上，华人对美国发展所作的贡献之大，与他们所享有的地位，更不成比例”（第208页）。《美国与移民》以两章、约占全书1/4的篇幅，专门讨论了美国华人历史。读此书，对这两章不能不格外垂青。

中国人远涉重洋、大规模赴美，主要是加州淘金热所致。这之后，华人用血汗甚至生命参与美国西部的拓殖，筑路、垦荒、采矿等等，含辛茹苦，与世无争。白人不屑为者我为之，白人不敢为者我亦为之。“整个加州都洒有华工血泪”（第219页）。但是，谁能想到，这些华夏子孙所遭遇的却是过河拆桥、以怨报德、种族迫害。“美国讲究‘公平竞争’和‘机会均等’，可是‘不给华人一个机会’却成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国流行的口号”（第220页）。还有什么话好说？

美国排斥华人，不仅限于立法规定，也不限于行动上的歧视，更有暴行之肆虐，如焚烧、

爆炸、抢劫、杀害。从1882年到1943年，排华竟成为美国的国家政策，不仅排除了华人入境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规定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不准移居美国。这种丑恶的种族歧视，“是对美国向来自诩的立国精神‘一切人生来平等’的讽刺，是美国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第262页）。

中国移民较之欧洲各国为数少得多，从任何方面看，都构不成对其他人的威胁。然而，排华之从地方到全国，何以一浪高过一浪？作者提供的主要历史背景之一是，美国主要工会组织在排华活动中“充当了受人鄙夷的角色”；在排华暴行中，“许多白种工人成了打手和凶手”（第238页）。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排华的主要力量是一些主要工会的头头”（同上）。劳联是美国当时最大的工会组织，其领导人龚伯斯“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他大言不惭地以“全人类的托管人”自居，到处诬称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说什么黄种人是“天生的善于说谎、欺诈和谋杀的种族”、唐人街是“性欲和罪恶的中心”，还无视美国当局不许华人携妻赴美的禁令，硬说这是中国人故意把妻子留在中国、以便“玩弄美国姑娘”；容许中国移民自由入境，“等于是听任亚洲的野蛮人大举入侵”云云。美国另一个重要的工会组织劳动骑士团，“在排华问题上所起的恶劣作用比劳联还早，其影响甚至不比劳联逊色”（第238页）。它曾经参与屠杀华工的暴乱、多次组织排华活动，其主要负责人鲍德利甚至号召“整个劳动骑士团必须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行动起来”，对付华工。历史就是历史。很可惜，我们的一些论著以往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似乎排华丑行仅仅是美国两党政客煽动的，似乎复杂的历史纯然清一色。有的虽有所涉及，但亦不免遮遮掩掩，所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著作中，据我阅读的范围，能像邓著这样直面历史者，尚不多见。作者的思考悲恸而沉重，笔者亦有同感：“在美国工人阶级组织及其领导人中，排华的主张是占绝对优势的。这是历史的错误？还是时代的悲剧？或者是一个年轻民族在走向成熟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第239页）

四

《美国与移民》一书的突出特点是，妙笔生花，夹叙夹议。它之令人捧读不释，其原因在此。事实上，这也正是记者出身、后兼编辑家、历史学家双重身份的邓蜀生先生的风格之所在。

不过，对邓先生的一个议论，我倒不无微词。这里涉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插曲。作者在叙述珍珠港事变之后，曾说明当时美国对居住在西海岸的12万日本人和日裔公民实行强制迁移的情况。要研究美国的日本移民，这个问题是不能弃而不谈的，它毕竟属于“日本移民遭罪”之列。实际上，本书亦对其前前后后作了相当完整的归纳：这一强制迁移，是当初由美国军方建议、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2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批准的。从1942年3月开始，大约3个月内，西海岸的12万日本人（64%是日裔美国公民）全部迁移到加利福尼亚等8个州的11处拘留营。作者写道，“珍珠港被炸后美国人民作出激烈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决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日本竟然真敢对美国动手，对美国的打击又是那样的沉重——不仅是军事上的，更主要的是心理上的”；罗斯福之采取这一激烈措施，并非当时军方强大压力所致。邓先生曾专门研究过罗斯福，对这位美国政治家是吃透了的：“罗斯福不会屈从军方压力，但是他十分重视舆论动向。当时美国舆情激愤，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强烈的仇日情绪，如果罗斯福不作出反应，在西海岸的日本人（不论是否美国公民）的安全恐难得到切实保障，而且国内战线可能因这一问题发生争执甚至麻烦。因此，不能说罗斯福在这一问题上感情冲动，犯了错误”（第308页）。对此，作者还作了如下分析，亦属情理兼具：“在战争期间，根据法律为预防某些敌国侨民可能发生的破坏活动而采取驱逐或监管措施，这本是通例，但是对整个敌国侨民，甚至已经不是敌侨而是在本国出生的敌国

族裔公民，全体加以强迫迁徙、拘留管制，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第306页）。问题是：作者在引用黑濑安吉、黑濑纯夫妇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搜查其家的对话时，偏偏插进了这样一段话：“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红卫兵’抄家的情景，不禁暗自庆幸起来，擅入民宅胡乱抄家，美国比我们还早20多年，这并不是我们的独有之秘”（第309页）。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觉得，插进如此一番议论，总有些不对劲儿，说重一点，似乎不伦不类。其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搜查黑濑家，与中国的“红卫兵”“革文化的命”抄家，完全没有什么相通之处；其二，如果真的这样议论，中国人因为总归有些直接或间接的体味、尚可有所知晓，那么，让美国人来领会，恐怕就只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其三，如果我抬杠的话，恐怕秦始皇帝当初“焚书坑儒”时就不免已开“擅入民宅胡乱抄家”的恶例了，这岂只是“早20年”的问题？这样一来，说不定中国又落个“第一”。我这是题外话了，聊供作者、读者一笑。